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以色列] 本雅明·塔木兹 著

米诺托之恋

秘密特工的诡秘情恋
人性与兽性的心理搏击
离奇、浪漫的悲剧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米诺托之恋

[以色列] 本雅明·塔木兹　著
郑雅兰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字：01－98－12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诺托之恋/（以色列）塔木兹（Tammuz，B.）著；郑雅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书名原文：Minotaur
ISBN 7-5004-2337-3

Ⅰ．米… Ⅱ．①塔… ②郑… Ⅲ．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②言情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45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08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10.00 元

内 容 提 要

亚历山大·阿浦拉莫夫是以色列的一名秘密特工人员，一次在伦敦郊外的公共汽车上偶然看到了希娅。希娅的美丽是亚历山大一生所求。希娅是一位聪颖、有教养、家境殷实而不乏浪漫的姑娘。在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里，他时而天天写信或寄唱片给她，时而又数月杳无音信。希娅的全部身心都被这位匿名人的信件及热情所吸引，她带着无比的渴盼等待着他的到来，然而亚历山大永不相见的请求令她费解。在极度失落痛苦中，希娅曾与追求她的富家子基·阿订婚，然而基·阿却死于一场奇怪的车祸。其后，她又遇到与匿名人外貌极其相像的尼科斯·特里安达，然而，就在她打算嫁给他时，窗外突然传来两声枪响，希娅心中燃烧着的渴望随之永远地熄灭了。

米诺托，又译弥诺陶洛斯（英文名 Minotaur），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之妻与白毛公牛所生的半人半牛怪物。后弥诺斯将其囚禁于迷宫，每年送去童男童女给他吞食。作者以此表达本书主题的深刻寓意。

作者简介

本雅明·塔木兹于一九一九年生于俄罗斯，五岁时来到巴勒斯坦，曾就读于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和巴黎大学。他曾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并在伦敦的以色列使馆担任过四年文化参赞，后曾在牛津大学任教，此外，他还是一位雕刻家。他的许多长篇及短篇小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长篇小说《西班牙城堡》于一九七三年在美国发行。《米诺托之恋》曾两次在英国被评为当年最畅销小说。本雅明·塔木兹于一九八九年去世。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米诺托之恋

Minota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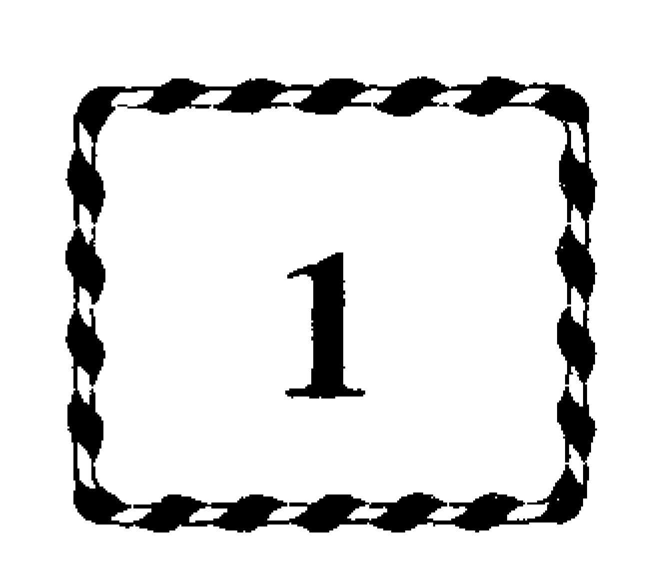
by Benjamin Tammuz

本书由以色列希伯莱文学翻译所授权出版

献　给

佛奥·松

第一章　特工人员



一个身为特工的人，将他租来的汽车停在被雨水淋湿的广场上，换乘巴士进城。

那一天他刚满四十一岁。当他一屁股跌坐在他来到的第一个空座位上后，便闭上眼睛，心情忧郁地思考如何过他的生日。汽车在下一站一停车，就将他颠醒了，这时，他看到两个姑娘在他前面的空座上坐了下来。左边的姑娘头发呈红棕色——闪着金光的深红棕色。她柔滑的秀发用一条黑丝绒发带拢在颈背后，并将发带打成一个十字形的蝴蝶结。那条丝绒发带，也像她的秀发一样，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一股只有在未经人手触摸过的物体上才能感受得到的纯洁的清新之气。如此精心打此发结的人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四十一岁的男人在心中老犯琢磨。因此，他要等她转脸对着她的朋友

时瞧一瞧。及至她转身对着她的朋友，他看清她的面庞时，他张开嘴巴，几乎叫出了声。这一声是不是已经脱口叫了出来呢？好在不管怎么说，车上的乘客并没有发现。



今天我满四十一岁了。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在宾馆里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庆祝我的生日了。明天，我将到使馆去取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发来的生日贺电，另外还有一封我儿子从寄宿学校发来的特别电报。他也离家在外，如果他喜欢过那种生活的话，这无疑说明他将来也会步我的后尘。果真如此，我就更有理由尽早结束我干的这一行。可是，今天黄昏时分，竟碰上了这么一件事，所以我现在还想继续干下去。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见到她之前，我就有某种预感，而我自己怎么也没想到它会这样突如其来地发生。所以我的确是大吃了一惊。我在公共汽车上，忽然间看到她在我前面坐下，我一眼就注意上了她。她下车，我也跟着下了车。我已经弄清了她的住址。明天，我还要弄清她姓什么，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连她的名字也要打听清楚。她住在一幢漂亮的楼房里，是那种有钱人住的房子。我听到她对她的朋友们说话。听她的声音就能猜得出她是什么人。她很可能是歌唱队的一员。她的谈吐表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衣着看似简朴，实则料子和做工都很考究。她身上除了那条黑色天鹅绒丝带以外，便别无其他饰物：那条朴朴素素的丝带给人的印象是打得恰到好处——看起来很帅。她的头发的颜色如我想象的样子，还有她的眼睛——深褐色但却不显得太暗。她的

下巴微微前翘，这下巴刚好体现出她的个性：做事干脆利落，凡事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尤其在感情上，她敢去爱，敢全身心地去爱。她的脸儿长得很端庄，跟我母亲的脸庞一个样：很美，像一朵粉红色的花朵，那么均匀地逐渐由淡而深，白中透红。那红晕如此自然，实在辨不清究竟从哪里由白变了红；而她的两唇却一片鲜红；还有那副牙齿，天啊，长得又白又整齐！这么一副漂亮的牙齿，当然不光是用来吃东西的了。如果只是用来吃东西的话，我敢说，上帝就不会花那么多功夫把它们造得又白又整齐了。

我今天四十一岁，她也许只有十七岁，差二十四岁呢。



希娅：

这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没有署名，而且我敢说我们将永远不会见面。可是，我见过你，也确信你也看到了我。那是一个半月以前的事儿了。我从你身边走过，你向我看了一眼，就像你在街上看那些对面走过的人一样。你没有注意我。不管你有没有注意我，你仍然是属于我的。

你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向我提出什么问题，但我的声音会通过这些信传递给你。我知道你会读这些信。我怎么知道呢？我不能解释，只能告诉你如下的情况：自我记事时起，我便一直在找你。我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但不知你究竟身在何处。我所做的工作将我带到你居住的城市。我的工作是由一系列推测、假设和冒险构成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职业，是因为除了你，我从未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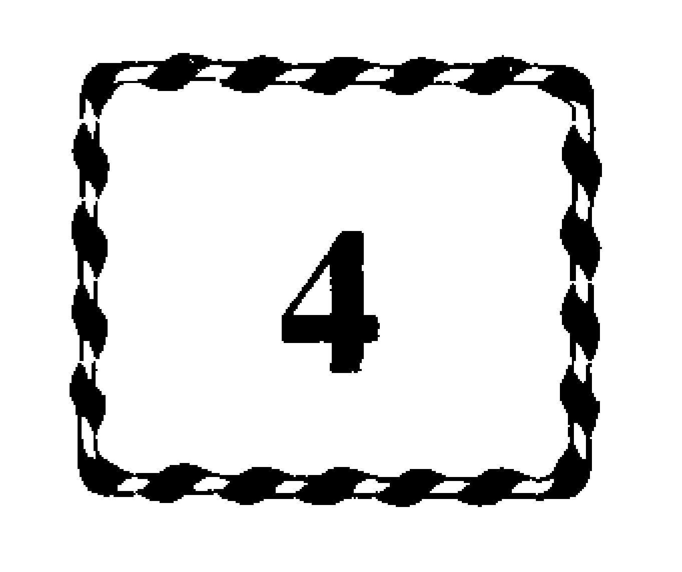
正爱过其他任何人，虽然我在一生中一直试着去爱——换句话说，一直在对你不忠。我将自己的生命投入极其艰险的工作，因为我需要去爱。因此我深爱我为之效命的国家，她那绵延的群峰，幽深的山谷，她的飞尘弥漫和愁苦绝望，她的大街和小巷。我不加选择，我不知是否终有一天和你相会。现在，我们终于相会了，可是相会得太晚了。这当中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我们生错了时间，生在了不同的国家。天上竟也如此混乱，就像人们的办公室那样乱糟糟的。不管怎样，现在我们相见太晚了，要结婚是不可能了。

我有你寄宿学校的地址，也知道你明年将入哪所大学。我知道你喜欢音乐，将来我还会知道得更多。

随信寄去一个包裹，里面装有一个录音机和一张唱片。希望你在下周六下午五时播放那张唱片。那时候，我会在离你家不远的旅馆一个房间里听同一段音乐。这将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我会知道你是否做得如我所愿。其实，我早已知道，你会答应我的请求的。

我爱你，我一生都在爱你。我怎么也不相信，你在街上遇见我却不注意看我。但这并不是你的错，大错早已铸成：我们出生的年代、出生的地点，还有一切的一切都错过了。我相信，上帝做如此安排是为了惩罚我，而不是你。

让我脱下你的鞋子，亲吻你的脚。我对它们如此熟悉，正如我熟谙你身体的每个线条。请别生气，也别说我可怜。在我见到你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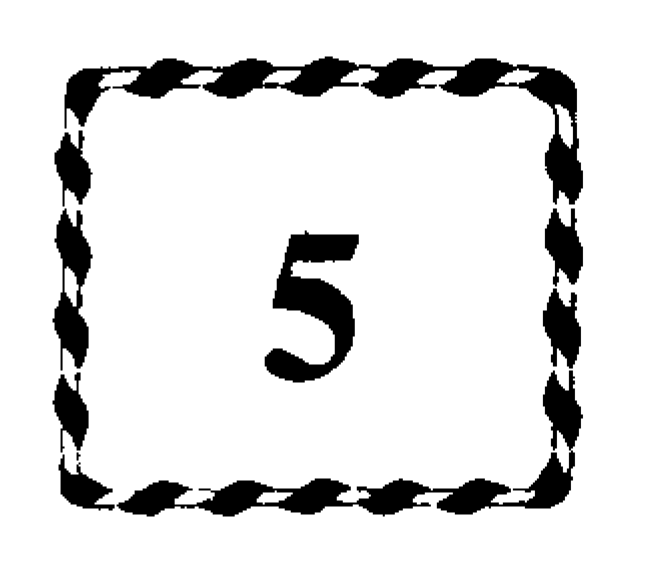
可笑的人儿：

我按你的要求，在下午五点准时听了你寄来的唱片。你怎么知道我会准时放这首曲子呢？还有，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呢？我一直在猜测你是谁，我想我已经猜出来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该乖乖地承认并站出来见我。你就是基·阿，我们在N的晚会上见过面，对吗？你一直在用眼睛瞧着我，他们已经告诉了我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这封信往哪里寄，但我仍要写，因为我希望如果我们能相见的话，我能把它拿给你看。我给你写信，因为不回你这样充满善意的信就有些失礼了。（顺便提一句，我几乎看不懂你的信，你实在太神秘了。）同时，我现在把我的回信放到一个特别信箱里，上面写上“给无名氏先生的信”，直到我们相见再打开。让一个女孩子老这么被悬念困扰着总不太好吧。

你的，

希娅



我的无名氏朋友：

我想你可能知道我马上要面临考试，不能每信必复，特别当你每日一封甚至有时候一天两封时。我现在总地回复一下我目前已收到的你的所有来信。考试过了以后才能再写信，希望你能谅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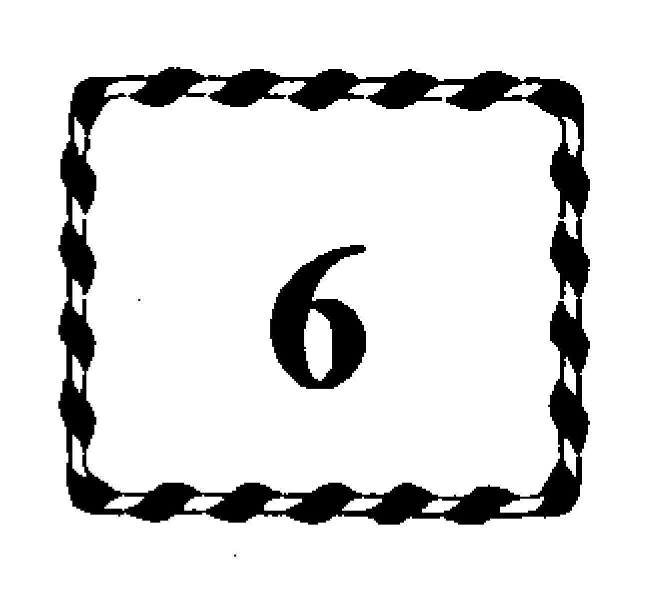
现在我已确信你并不是基·阿，因为就在我收到你来信的同时，他已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对我大献殷勤。我仍不知你是谁。我很不高兴，因为从你的信中我读得出你越来越伤感。我想告诉你，你不必这么患得患失。近来我常常对着镜子端详自己，试图找出你眼中的我。知道我发现什么吗？我本该不好意思说出口，可这是真的——我发现我也许真的比自己想的要漂亮，这都是你的错。现在，朋友们对我的赞美已很难令我陶醉了，因为与你的信相比，他们的赞美只显得粗俗。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我确信你比我的朋友们聪明。不过，我有时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还有，你为什么那么伤感呢？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当个作家或者诗人，即使你所写的并不完全是你的心里话。

你为什么总谈到要去死呢？如果你真的像你信中写的那样爱我的话，你就该让我见见你。也许我会喜欢你呢，为什么要这样神秘兮兮的呢？你好像在讲明发生的一切，可我一点都不懂。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聪明。

谢谢你寄来的另外两张唱片。你似乎对这位作曲家很着迷，因为你送给我的唱片全是他的作品。我承认他的确很棒。我每周六下午五时准时倾听这些唱片。这种安排真有些像是发了疯才能做出来的事，可是我全都依了你。你瞧，我是一个多么听话的女孩子，现在也该轮到你表现得像个听话的男人的时候了，送给我一张照片，这总做得到吧。

你的朋友，希娅

附言：这封信又要被投入“给无名氏先生”的信箱了。你这样隐姓埋名要隐瞒到什么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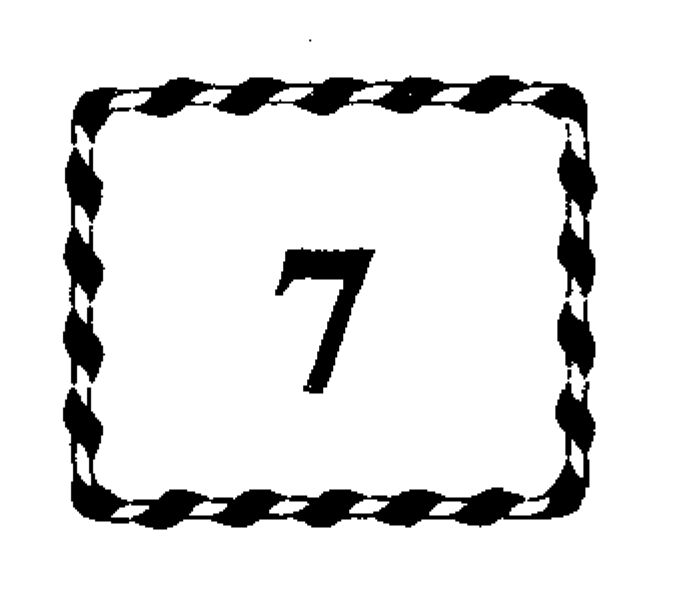
最亲爱的无名氏先生：

考试已结束，现在我可以坐下来听听这一大堆唱片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很无礼？这已是我今年以来写的第三封信，可它仍无处投递。

时至今日我对你的了解与第一次收到你的信时没增加多少，但意义却不同：你如果从此不再来信，我会想你。也许这正是你所希望的？你使我觉得像个女王，我也习惯了，可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呢？除你之外，没人能看到我身上那些优秀的品质，你正使我变得依赖你，因为你所赋予我的，别人无法赋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除非你来见我，向我自我介绍，否则我就不给你写信了。这将是我投到“给无名氏先生的信”的信箱里的最后一封信。现在，我在放一张唱片，希望你也会同时放上这么一张，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多想见到你，我这样做绝不是出于对你的感激。无论你对我怎样做，我都觉得你是那么可爱。

你的朋友，

希娅



希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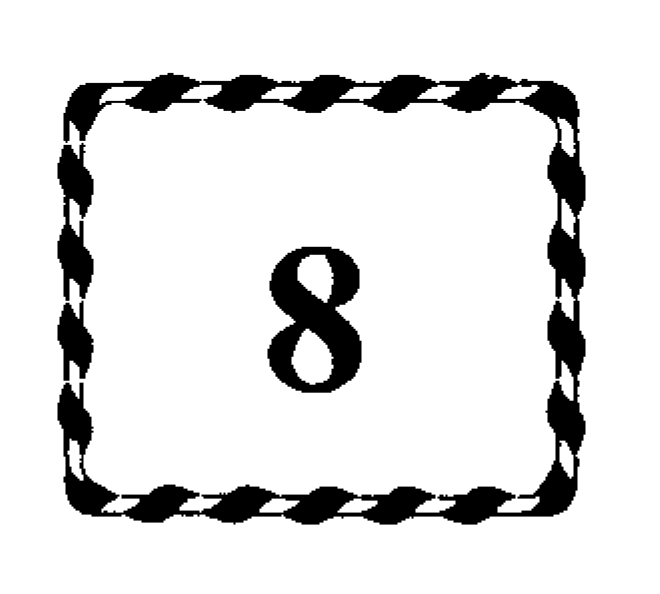
恳求你原谅我前两封信中说的话不甚妥当。我无权让你跟我一起哭泣，一起叹息。我深感羞愧，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昨夜梦见了你。我正独自站在阳台上，这时你出现在门口，注视着我，面带微笑。然后你向我走来，噢，那不像是走，倒像是从空中飘到我的身边。你既没拥抱我，也没伸手碰一碰我，只是身体微微前倾，亲吻我的双唇；我泪如泉涌，你却笑着说："我是属于你的，来娶我吧。"我说："让我如何娶你呢？"你说："在空中，就在空中娶我。"

希娅，你说在空中娶你是什么意思呢？两星期前，我观看了你们的毕业典礼。我坐在第三排，右侧，离你父母不远。当你望着他们时，你的目光曾在我脸上稍做停留。谢谢你，我亲爱的人儿。我在空中吻你，正如你在我梦中提示我去做的。你没认出我就是那位无名氏先生，又一次没能认出我就是这个给你写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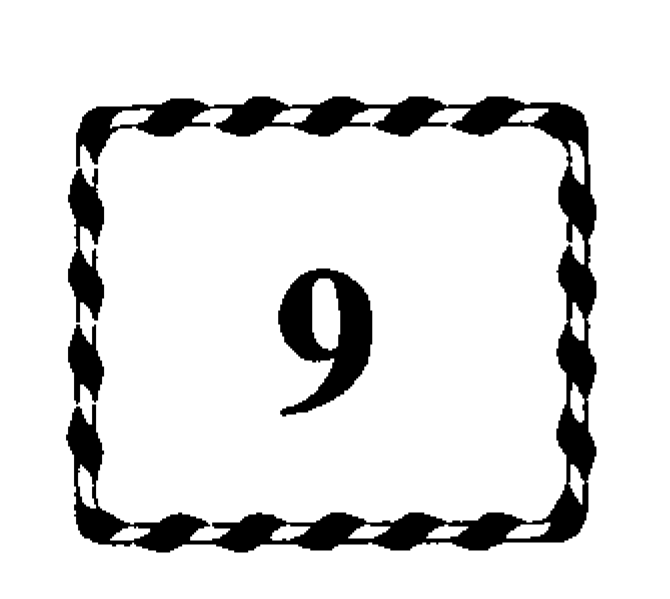
这几个月我会回城里，我不想去你们那所大学，因为陌生人在那儿太显眼。那可恶的校园会让你从我生活中消失，我将很长时间见不到你，只有等你假期回家度假时才能再见到你。我知道你不会因为我这般近乎荒唐的行踪诡秘而嗔怪于我。我这样做绝非故弄玄虚，只是没有别的办法。请相信我。

我爱你。



希娅：

从认识你到现在已整整三年了。今生没得到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损失。我终于遇到了你，可一切都太晚了。直至今日我才想到你或许还想给我写信。我现在建议如下：在封面上写“法朗兹·卡夫卡，邮局留交”，然后送到你家附近的邮局。我将于十二月五日下午五时去邮局取信。为保险起见，请勿来相认。望你届时坐在你父母家对面的咖啡屋里。我的一个朋友会去证实你确实在那儿。他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才会去邮局取你的信。你若不在咖啡屋，我便不去邮局。如果我的猜疑纯属无中生有，恳请你原谅。



希娅：

被你派往邮局辨认我的那位女孩看到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朋友。在邮局我们看到一个女孩总在神色警觉地东张西望，便断定这是你耍的小把戏。你如此迫切地想见我一面，并为此颇费苦心，殊不知我心中有多感激。这使我这个处在痛苦深渊的人，感到自己又是最最幸福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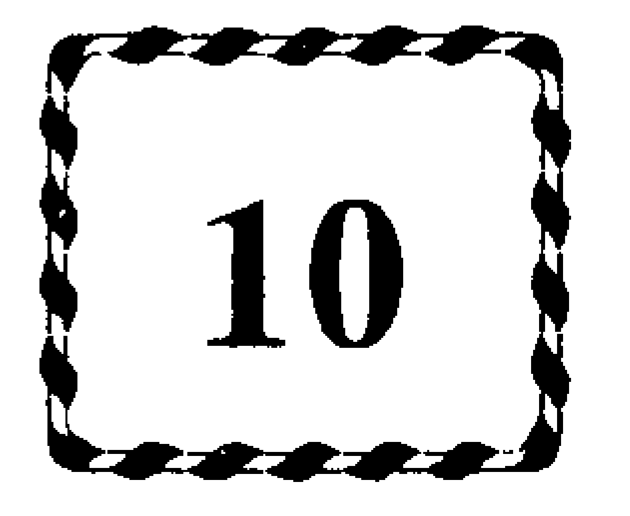
你的信我读过了。你正像我想象的那样，是个善良、可爱的女孩。我的判断一点不错，希娅。在我的工作中，判断人的性格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因为一旦出错，就可能为此断送性命。如果当初对你判断有误，我也许很久以前就已不在人世了。

我会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不见得以你提的方式。我不得不这样对你讲：就我所知，世间除了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观察、分析和利用的事情以外，还有一股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或在我们生活之外的力量。这种力量用我们现有的智慧无法控制。我每天与这种力量相伴，特别是在工作时。如果我们能活下去，那就意味着这种力量绝非想象，它很可能导致我毁灭。然而，它又可说是我的最佳向导，它将最终把你送到我的面前。你不仅存在，而且就是我脑海中的模样。你的存在足以证明这种力量绝非凭空想象。

与此同时，我们的命运却被安排得阴差阳错。这像是一个无意中出的差错，又像是一种存心的惩罚。所以不管怎样做，我们都无法随心所欲；既不能相见，也不能结合，其原因既简单、世俗、让人感到屈辱，却又不能对你讲出来，因为如果讲了，你会认为我很懦弱，还会怀疑我对你的爱。好了，我讲得够多了。

我爱你，希娅。上帝若真的存在，早在你出生之前他就该让我们相会在我第一次梦到你的地方。如果他为我俩着想而不去这样做，那就说明他不是上帝，他并不存在，或者他只是一个办公室——效率很高却冷漠无情。

你无所不在，每天我都亲吻你的手，你的脚，以后，我还会斗胆抚摸你的双颊，用我的双手，而后用我的双唇。我期待着今夜梦中与你相见。



这位神秘特工与希娅相遇四年后，基·阿恳求希娅嫁给他。她的父母同意了这桩婚事。婚礼就定在冬天来临的时候。

就在婚礼前一个月左右，基·阿死于车祸。希娅将她的毕业论文交给学校，在她的未婚夫遇难不久，便与父母去了格施塔特。他们刚到那里，希娅便收到一束鲜花、一盒巧克力和一封信。

希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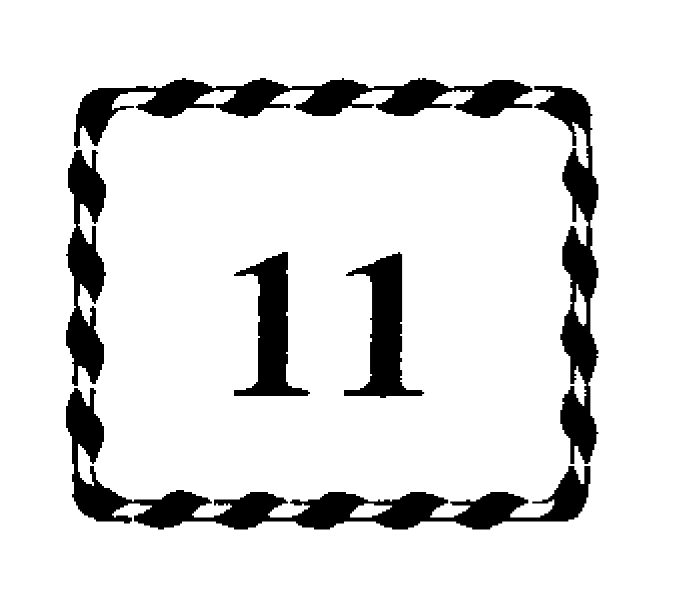
上帝希望你幸福快乐，所以你要挺过去。在四周散散步，你会找到心中的宁静。你还年轻，又聪明，无疑，你一定能挺过去。

我无权对你喋喋不休，更无权让你感到迷惑不解，就说这些。愿你心情能平静下来。你可能会奇怪这束在宾馆里等待着你的鲜花是从何而来。这很简单，从你身边的人那里。我能知晓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计划和安排。他们为此所付出的辛苦也能得到报偿。为了讲得更清楚明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在你家对面的咖啡屋曾有一位老侍者，他后来死了，也就不怕我把他的身世暴露出来了。他曾经经常性地定期收受酬金，为我提供任何他能搜集的情报。他这种人到处都有，而我这种人利用他们时从来毫不犹豫。

请别生气，这是对我来说惟一行得通的办法。我总在旅行，在你们国家也并非永久居住。如果只凭运气的话，也许我早已失去了你。我找到你该是我的运气好，我对此已觉得满足了。

笑一笑吧，我的天使。笑一笑，即使在悲痛的时候，对我，对你自己，对发生在我们之间的这一切的不幸和美好。

附言：下周日我会去你住的那个区。如果你需要什么，或想写信给我的话，就请将信放到邮局，下午五时我会去取。届时你还是坐到旅馆下面的咖啡屋里，就像以往安排的一样。



我的不知名的朋友，我目前惟一的朋友：

谢谢你的鲜花和巧克力。我告诉父母说这些礼物是我大学的朋友送的。你瞧，因为你我向父母撒了谎，而且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世上无人能够理解我俩之间发生的一切，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可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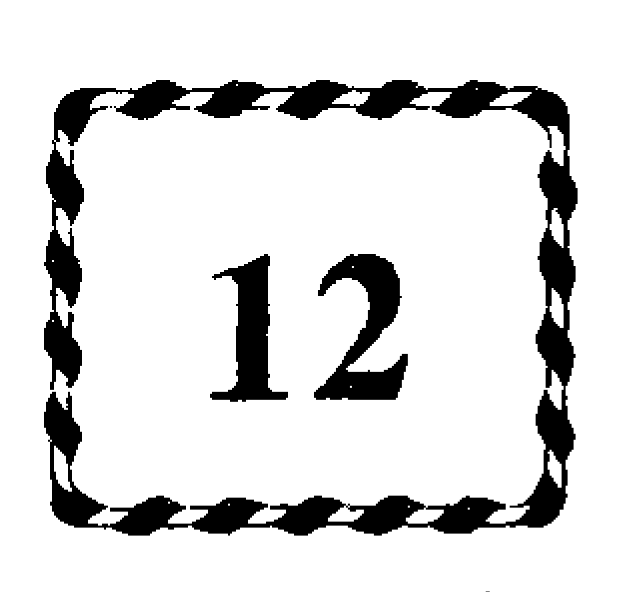
基·阿的惨死看起来更像是上天的报应，因而让人加倍痛心。真不明白为何上帝不惩罚我，却让基·阿来顶罪。是我有负于他，而非他负于我。是我在还没有真心爱上他之前就准备跟他结婚。我很喜欢他，这我曾在信中告诉过你。但我对他的爱不足以让我嫁给他。那个被你叫做办公室的上帝大概是弄错了地址，为什么要让可怜的基·阿用他的生命来避免我要犯的错呢？我不知名的朋友，我不像你想象的那般可爱。现在你该知道我有多么渺小、多么可怜，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丑陋了。我如何能笑得出来？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路易·德·贡戈拉

的，这你知道。当我看到基·阿死时那苍白的面容，我记起了这样几句：

躯体血流尽
逝去两颗心

同时我竟厚着脸皮对自己说贡戈拉写下这么美妙的诗句与基·阿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意识到了基·阿是用双倍的真心来爱我的话，我也许会全心全意爱他的。

我现在坐在星期六下午五时应该坐的咖啡屋里写这封信，心里正侥幸地想你也许就在这里，坐在人群中，或正从窗外向里张望。你竟如此控制着我的生活，我不知名的朋友，你竟如此忍心看着这一切的一切。最糟糕的是我并不相信你的话，我相信我们终会相见。如果你让我感到失望，我将永不原谅你。



当希娅被南方一省立大学聘为西班牙文学教师时，她那未知名的朋友的西班牙语也已学得可以在信中写上几句西班牙文了。他的旅行包里总是带着字典，为的是不犯拼写错误。

啊，远方孤独的希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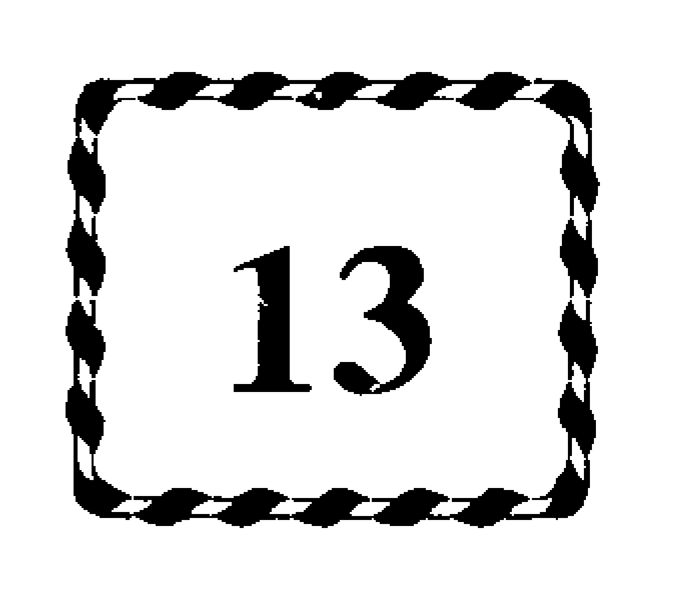
我不知死神是否在科尔多瓦等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在你的怀抱中守候着我。我死时会离你千山万水之遥，但那时我会比生命中任何时候都距你更近。也许那时我们即将相聚。你是我的天使，我生命中的天

使，我死亡的天使。

我并非悲观，希娅。我很幸福，只有恶棍或者傻瓜才会既爱你同时又不快乐。

昆卡的姑娘
去了森林
或采松果
或去舞蹈

当你昨日在榆树林独自漫步时，我想你可能会在林间跳起舞来呢。可你却靠近一棵树旁，点燃了一支烟。请戒掉烟吧，希娅。为了做出榜样，我从现在起不再吸烟了。



我神圣的圣希娅：

我已经有十个月没给你写信了。你在做些什么？你那聪明的小脑瓜里在想些什么？我现在将你列入圣人之列，而你现在无疑在另外某个什么疯狂情人的脑海里打转儿了。

十个月前，他们向我开了两枪，两枪皆中。我敢肯定那时我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一个傻气的微笑。我清楚地记得我那时在想：我们要相见了吗？但其他的反应立刻袭来——震惊和全身的一阵强烈的骚动不安，这种骚动往往是由于做了什么错事或受人讥笑或嘲弄以后才会产生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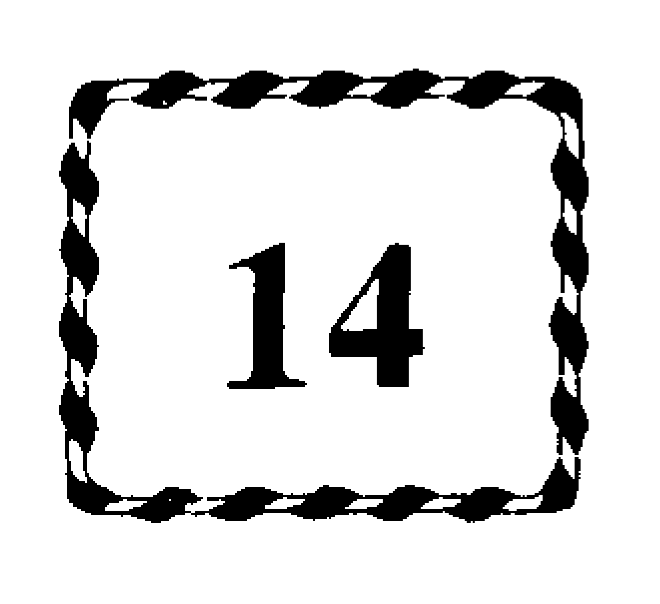
如果我还活着，那就证明你是神圣的。请接受这一点吧，它是你所有性格特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有医术高超的医生，他们为我缝合了伤口，但从职业的角度讲，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上级问我是否愿意就此隐退，很显然，我要继续干下去，因为隐退就等于将我距你于千里之外。而为了能继续从事我的工作，我就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永远改变我以前的面容。当然，也不能说永远，因为人死后皆为尘埃。但现在看来，我已被重塑了一副新面孔，余生从此将被遮掩在这副新面孔后面了。

所有这一切将带来一个好处——现在我能答应你几年以前的请求了。此信中的照片是我约一年前的模样。你瞧，你向我要照片，现在得到了。照片上的我与你不止一次在街上或在其他场合见到的我大同小异。

我现在更爱你了，可从前我却不知道这一切竟是可能的。

本月最后一天我会去你的家乡，你可以经邮局将信转给我。和以前一样，你在那天下午五时仍是呆在省城的大学里。



我亲爱的人，你也许是我惟一亲爱的人：

七年过去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你的面容，而现在的你却已面目全非。你可曾理智地想过，正如别人讲的那样，你让我受了多大的痛苦。

可当我一想到你已经经受的一切，我又为自己的自

私而羞愧。近一年来，你一直销声匿迹，这时我才意识到你的封封来信，以及你本人对我意味着什么，当然如果你真地存在的话。今年以来，我不止一次地在想，也许是某个办公室在一直写信给我，也许这个办公室已关张大吉，这种事常有发生。我还想起了你用过的那个词。可上帝不是办公室，亲爱的。上帝又将你送了回来，我几乎要写出“送还给我”了。这是多大的嘲弄啊！想想在我房间里发生的事吧！你的照片就摆在我面前的写字台上。我已二十五岁了，正凝神望着你的照片。你多大呢？三十五岁？四十岁？你非常英俊，亲爱的。如果你也像其他男人追求女人那样，我也许开始时会不知所措，会感到害怕，但我将无法拒绝。我知道我早晚会投入你的怀抱的。你属于那种人们常说的“让女人着迷的男人”。反正照片中你就是这种样子，遗憾的是你的手没照上去，不过我想我能猜出你那双手的形状。但你的眼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你知道自己长着一双怎样的眼睛吗？电视里出现的豹子常令我生畏，可又让我心怀敬意，大概豹子也能给它的配偶投以脉脉温情，眼神中也会充满爱意并含着微笑。除了这种时候，那双眼睛便成了掠夺者、谋杀者的眼睛。说这话也许有点危言耸听、自相矛盾。我想你的眼睛大概是像蜂蜜般的褐色，我猜的对吗？从照片上很难看出你的头发是花白了呢，还是浅棕色，但你确实很帅，这一点我想你是知道的。我能想象出那些女孩儿们会多么乐意投入你的怀抱。你为什么还要不快乐呢？我确信即使我现在是第一百次地告诉你，你也不会生气的，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无法接受你所做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解释：什么你一生都在等我呀，什么你从来都在回绝送到你面前的机会呀。如果你真地那么做了的话，那你就是真的疯了。

但你没疯，亲爱的，我知道这都不是真的。若是那样的话，那你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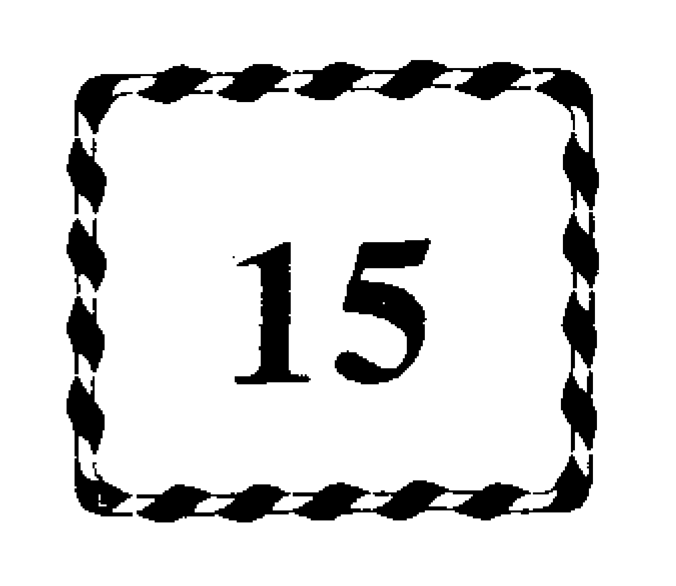
你现在换了张面孔，但我确信他们没动你的眼睛——你不会让他们毁掉你的眼睛的——我便能通过你的双眼辨认出哪位是你。求你再次在街上与我擦肩而过吧，就像你说你多次做过的那样。我会叫住你，让你相信我真能毫不犹豫地认出你，我将趁你不备扑到你的怀里。我希望你会大吃一惊，但你必须答应我，那时你不要装得像个陌路人，而是抱住我，说“你疯了，希娅”。

然后一切将顺其自然。别怕，我不会把你交给当局的。我们会一起去某家餐馆聊聊。你曾送给我那么多的唱片，却从没送过你自己说话的录音，尽管我几年前就几次三番地请求过。你现在既然打破了戒律，就请把你的声音也寄来吧。

近八年来，我一直读着你的信，但却时时希望你从未写过信给我。可现在我祈求你的信将永不间断。我毫不怀疑，我们会相见，尽管有各种可以预料或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那时你要向我解释你为什么喜欢法兰兹·卡夫卡，为什么所有那些你送给我的唱片里的音乐都出自同一位作曲家。

像豹子的猎物一样，我是属于你的，

希娅



我的爱：

你的来信向我展示出你性格的另一面，对此我从未怀疑过。然而，这更使我感到惭愧。我现在意识到，我并不是像自己认为的那样深谙特工这一行。我以前是不是常常向你夸耀自己在对别人性格加以判断时从不出差错，并且独具慧眼，因为若非如此，一旦出错将以生命为代价。现在看来，我对你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却全然不知。

你对我送你的照片所做的注脚和从我眼睛里得出的结论如此准确，使我在心中深深地向你致敬，你该为此得个文凭呢。你了解了我的性格，这使我心里惴惴不安。我本不想让人看出我的性格，现在看来太迟了。你对我的认识相当准确。所幸的是你还没有作出更进一步的结论，而更令我感到幸运的是，你喜欢我的那副面容。看来那个办公室给我造的文件使我逃脱出了你的检查，因为你还算不上训练有素。

同时，我毫不怀疑，如果你和我在一起工作，我俩会创造出国际间谍史上的奇迹。哈哈，开个玩笑，一个无所谓的玩笑！

希娅，我的希娅，近来我愈来愈感到难以承受他们迫使我们所接受的一切。我几乎在意志不坚定或在伤心时，和你一样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得以相见，正如你想象的那样。但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的话，那将证明我不值得你爱，这一切只是一个错误，因为你我若是我所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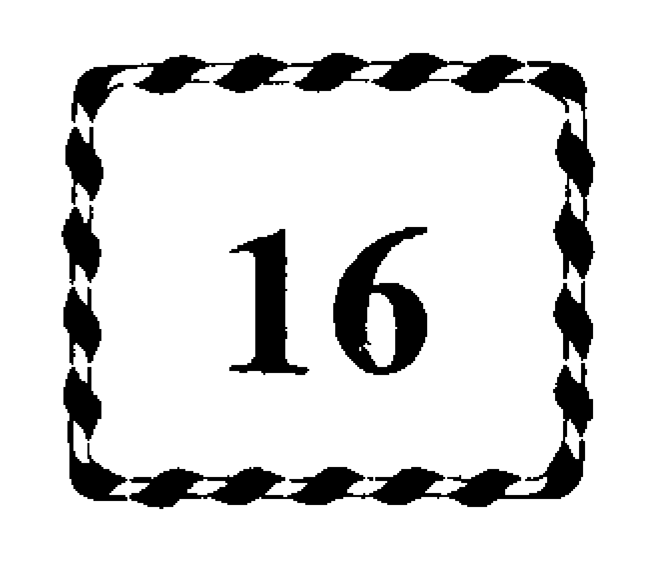
为的那样，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促成此次相见，那个办公室该安排好一切。如果说从没有过什么办公室的话——那你和我又如何能存在呢？

应你的请求，我这次寄去一盒录音，上面录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是我在祈求；还有五重奏的第三乐章，这一乐章表示我已明白祈求毫无意义。这就是我的声音在向你倾诉。

至于为什么喜欢卡夫卡？我来向你解释。我总希望卡夫卡能成为我的朋友，并且还愚蠢地相信他也许同意了。他宽容无比、爱他人，甚至愿和傻瓜交朋友。与他交上朋友应不是什么难事。当然你有权问我为什么不选我们的作曲家做朋友，回答是他已不需要朋友了，他玩弹子球的朋友已足够多，而我又不玩弹子球。另外，他会像嘲弄他的那些朋友们一样地嘲弄我的。你知道，希娅，他并不真是那些乐曲的作曲者，那些曲子都是“办公室”口授给他的，他不过是凭记忆记录下来而已。我无意与“办公室”交什么朋友，它已将你授意于我，这已使我心满意足了，它的旨意本身就已是暗示，告诉我这个不知深浅的男人将来可能会怎样。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提到法朗兹·卡夫卡的原因了。

我已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碰过西班牙语了，所以此信中总是词不达意，除了最后一行：

我爱你。



我的朋友：

如果我有什么地方不对，请原谅我，原谅我接下来要提的这件可怕的事，我只想问问而已，况且是你把我引到这个问题上来的。

我已读过你的来信，也听过了459和519号磁带，但我现在并不想谈这些。我不知从何讲起。

你的上封信中只字未提如何回复你的信。已近两个月了，你却抛下我，让我与上次的来信为伴。我一直在琢磨你对我洞察能力的赞赏。你夸我把你的眼神分析得很在行，同时，你又说感到幸运的是我没因此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

起初，我把这话当成了直截了当的夸奖。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开始将你的话在脑子里反复思量，一次次，一遍遍，一年年，甚至在梦中我都在不断地将你信中的那些话回味着，思忖着。

我的这封信又将像八年来其他那些信一样被放入写着“给无名氏先生的信”的信箱里。但是，我希望你能指示我如何回复你的信，也希望我有勇气发出这封信。

告诉我，请老实告诉我，因为我总是虔诚地相信你信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告诉我，你是不是与基·阿的死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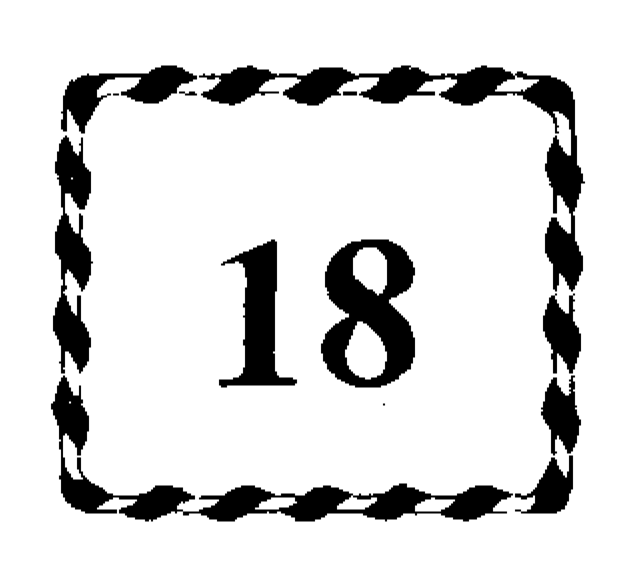
希娅



不幸的人，我可怜的受尽煎熬的人：

我情愿永远不把这封信放到信箱里，只要你给我来信。六个月很快过去了，你为什么仍杳无音信？请你不要消失，我求你。让我了解你内心在想些什么，也许我能跟你走；也许我会离开你，把你的信撕个粉碎。你不该这样对待我，我不是什么办公室，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将要度过她第二十六个春秋的女人，你为什么要我付出如此多的代价？

我从不怀疑你的爱，但这种爱对我太不公平。我倒像是你的遗孀。你无权去死，也无权保持沉默，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



一个月后，一位西班牙的访问讲师来到这个坐落在南方省份的城镇。他被介绍给教西班牙文学的讲师。在教师餐厅里，当希娅看到这位客人的面孔时，她变得脸色苍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位西班牙人倒是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他看着面前这位女士那可爱的面庞，询问这位女士是不是不舒服。希娅嘴里说了些什么，请求对方原谅后，转身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这位西班牙来访者与她书桌上摆着的照片里的那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将照片中的人面部曾做过整形手术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就越发会这样想。她端详着照片，觉得整容师似乎主要在他眼部做了手术，尽管过去她曾相信并且希望整容师不会在这些部位做过手术。他们的眼睛不一样，这

一点毫无疑问。至于肤色——通过黑白照片无法辨别得清楚。这位西班牙来客看上去已近不惑之年，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她对他一无所知。

希娅照了照镜子，当抬手整理头发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她取来安定药，吃了一片，点了一支烟，坐到沙发上，一直坐到吃晚饭的时候。那位来客要在晚饭后作一个讲座。不可能是他，希娅对自己说，不会是他。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

就在晚饭前，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两位都是希娅的朋友，来到她的住处，带来许多好消息：那个英俊的西班牙人不住地打听她的消息，而且和典型的西班牙人一样，总是将自己的感情讲给任何愿听他说话的人。下面就是他对别人讲的话："你们邀我来这儿会后悔的，因为我会把你们的西班牙文学讲师拐走。看到她第一眼我的心就已经被她俘虏了。"还有一条消息让希娅听了后背直冒冷汗：这个男人实际上不是西班牙人，他只不过是六个月前才开始在马德里讲学的一名外国人，他那带有口音的西班牙语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她步入餐厅，看到他坐的桌子离她有一段距离时，心中松了一口气。这段距离可以让她有时间对他进行观察而不致引起不必要的尴尬。

那种令她在第一眼见到他时所强烈感到的与照片中如此相似的面容现在已不像先前那般让人震撼了，然而要完全忽视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他们看来绝不会被搞错。

当他站起身开始讲话的时候，目光竟毫不掩饰地朝她注视了片刻，然后才将眼睛转回到自己手里的讲稿。他实际上

是宣读自己写出的内容。他虽然是在用西班牙文讲课，别人却能听出他带有外国口音。希娅心里清楚，大学教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机智的话语作为开场白，另一种常常引用某个诗人的诗句，将诗句融入科学的内容，即使讲座是关于经济学或医学什么的也不例外。因此，当她意识到他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时候，心里一点不感到奇怪，这位讲师来自西班牙，他在引用霍希斯和凯恩斯的话时插入贡戈拉的诗句也就无须大惊小怪了。尽管如此，当她听到那首诗，特别是他在引用贡戈拉诗句时抬眼注视着她时，希娅还是感到自己的心头一震。可是她发现他只要从讲稿纸上抬起头来就会将目光投向她，而且自始至终都如此。

讲座内容生动有趣，适合于任何一种听众，属于那种头脑聪明、机智的大学二、三级的学生也能作出来的讲座。这位讲师讲得既流畅自然又兴高采烈，好像总是有些让人意外惊喜的东西会恰到好处地从袖筒里抖出来。希娅那根紧张得几乎有些麻木的神经松弛了一些。也许是由于那片安定的作用，她在讲座结束时走上前去，对他笑笑说：“我听说您逢人就讲一见钟情，像您这么大的孩子该更懂事些。”

他嘴边的微笑没有了。

“我原以为我的出现让您感到了不快，我很高兴我当时搞错了。”他说。

希娅感到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什么，便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她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说：“我要问您一个男人们经常在酒馆里向女孩儿们问的问题——我以前见过您吗？”

她感觉他像被她的话问得不大高兴，一片阴云笼罩在他的脸上，但即刻又烟消云散了。他很镇定地、一字一顿地回

答说：

“我可爱的年轻女士，我感觉似乎我早就认识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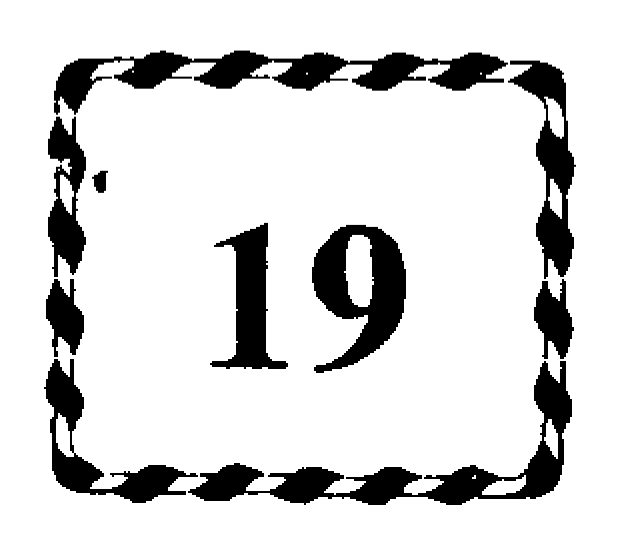
希娅仔细地打量着他的脸，目光中毫无客气或礼貌可言。她没找到一点疤痕，下巴上没有，脖子上也没有，嘴边没有，耳边也没有；眼睛四周的皮肤鲜活生动，眼角边能看到些许皱纹，而这在四十左右的男人中是司空见惯的。这时照片中与他的相似之处对希娅说来实际上已微不足道了。

一股愤怒的情绪在她心中升腾。这股怒火来自于她自己被自己的想象所欺骗后的感觉，她觉得自己成了自己胡思乱想的牺牲品，自己八年来发疯般的恋情到头来仍是一场空。是啊，或许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对一个女孩儿说：“我觉得好像早就认识你了。”这只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她面前的这个男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其他什么人，而非是她那不知名的朋友。然而，她仍不愿放弃任何在此次会面中可能发现的蛛丝马迹。

她对他说：“听着，您现在先跟大家聊聊，答谢一下你的主人，约过一小时后到我房里来，但我要提醒你，我要问你一些个人问题，而且是一些令人不快的个人问题，如果你不愿回答，你可以不来，但请不要有任何幻想。”

“我接受。”他说，然后欠了欠身，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从他的步履里她感到他心中充满悲伤，无可奈何，甚至还有一点生气，好像他突然之间精疲力尽了。



希娅为客人准备了一把椅子，它就放在那张照片的对面。他来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希娅到厨房取咖啡。她从窗帘缝里望过去，来客并没看那张照片，而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耐心地等着她回来。

“你认为这人怎么样？”她指着那张照片问。

他看看照片里那张脸，又转头看了看希娅，问她那是不是她父亲。

“你不觉得他长得像你吗？”她问。

“我真希望有他那样一张脸，”客人说，“他真是个美男子。”

“听着，”希娅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看他，又看看照片。这是她第一次能将他俩，也许是同一个人，进行比较。“听着，你是不是为某个国家工作的秘密特工人员？是不是有人在大约一年以前向你开了两枪？他们有没有为你面部做过整容手术？回答是或者不是。”

那人受到这样一番连珠炮式的盘问后，既没有笑，也不开口。

也许他认为我一定是疯了，希娅想，也许他认为我是一名秘密特工。很快就会知道的，也许就是他。上帝，真的是他吗？

“不，”那人终于说话了。一丝笑容挂在他的脸上，但转眼又消失了。

“我不必向你做什么解释，我曾提醒过你，”希娅话说得很快，“来杯咖啡吗？”

“请来一杯。这儿有架钢琴，你弹钢琴吗？”

"你呢——你弹吗?"

"是的,"他说。

"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吧。你是谁?"

"你知道我的名字,但我很愿意告诉你更多的情况,甚至可以说我喜欢这样做;我知道我无权提问,是吗?"

"你可以随便问。"

"我会的,只要你同意。嗯,我生在亚历山大,父母是希腊人。我还在孩提时,我们全家搬到了贝鲁特,我在那儿上了中学和音乐学院。家父要我进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学法律,我遵从父命学了法律。大约二十年前,我家又迁到欧洲,而我现在在马德里工作。如果我讲的这些情况对你已经足够了的话,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

希娅点头应允。

"你问我的那些问题——是你从收到的有关我的情况中了解的呢,还是想通过确定我的身份,以此来查找你正在寻找的什么人?"

"你自己解释吧,"希娅答道。

"我只能猜测。你是否与某位在暗中未公开身份的什么人有什么关系,而你想看看我是不是那个人?"

"你也许愿意为我弹一首你喜欢的曲子,"希娅说。

客人叹了口气,笑笑,从椅子上站起身,坐到钢琴旁。他弹起了莫扎特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弹了四分之一后又绝望地停住了,转过身来。

"有些年轻时掌握的技巧现在都拾不起来了。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常为钢琴和管弦乐队弹协奏曲。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你知道法朗兹·卡夫卡吗?”希娅感到万分疲惫，心中暗想，第一个夜晚这些已经足够了。

“谁都知道卡夫卡,”客人说，“当然也包括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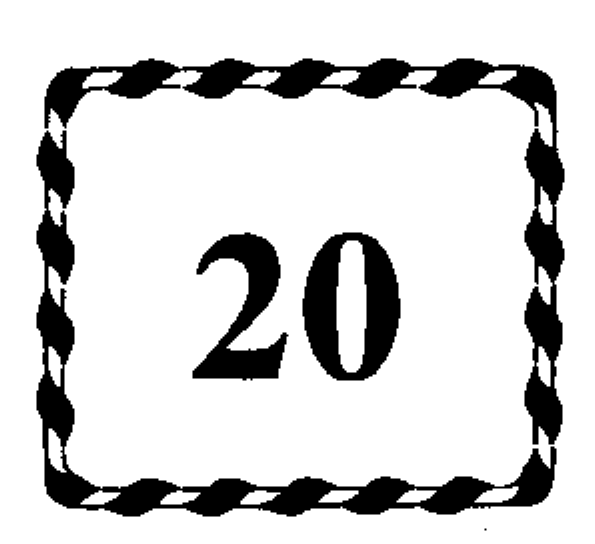
“请别生气，不过你必须得走了,”她说。

“当然,”他说，“我一直在做你让我做的事，现在就更该服从了。在走之前我只要求让我讲一件事，而且你必须保证不回答。”

“讲吧。”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人。这话对你来说已毫不新鲜，我知道你不止一次地听别人这样说过。我要说的只是——让我每天都能见到你，晚安。”

这个男人说完走出了房间，默默地带上了房门。



两个月后，暑假开始了，希娅与那个马德里来客回到她的家乡。他住在她父母公寓里的一个房间，并被邀请在他回家前与她家人一起度过两个星期的时光。

他们到家的第三天，希娅、她父母和来客正坐在起居室里喝茶。夏季的午后漫长，北方的夏夜更是姗姗来迟，临街的窗子开着，楼底下街道上人流车流熙熙攘攘，正是下班高峰期，人们正急着往家里赶。

车辆行人拥挤忙碌的嘈杂声中突然惊起一声枪响，紧接着便是第二枪。四人听到急刹车声，还有从街面上传来的尖叫声，过了不久又听到警车的警笛声。

他们赶紧放下茶杯，站起身来朝窗外望去。

在街对面那家咖啡屋门口站着两个警察，他们正尽力拦

住涌动的人流，不准人们进入店门，另有两名警察走了进去。一辆救护车好不容易才挤过人群停在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司机和他的助手，俩人抬了一副担架也进了咖啡屋。很快他们就抬出了一具用毯子遮掩着的尸体。

希娅全身都剧烈地狂抖起来，竟因此而卧床不起。她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家人只好请来一位医生，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她这才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她还是不想出门，而且说什么也不让人进来看她，只让他们把晨报拿到她床上来。从报纸上，希娅看到一个满脸胡须的男子的照片，那人双眼紧闭。

报道中说被害者身上无任何证件，请公众帮助确认死者身份。报上还说这名男子是被一名现已逃脱的袭击者连开两枪所杀，被害者当时一直坐在咖啡屋的窗边。咖啡屋的主人称死者三天来每天都在同一个位置坐上大半天，他以前没在这儿见过他。调查中发现几年前另一名男人也偶尔来此，也常坐在窗边的同一座位上，一坐就是数小时。人们背地里传说那位几年前的常客常付钱给一名侍者，要他搜集某方面的情报，那名侍者后来就死了。在咖啡店主看来——他虽不敢肯定——那笔钱与女人有关。



希娅病了好一段时间，高烧不退，神志不清，但最后还是恢复过来了。马德里来的客人推迟了回马德里的归程，与她的家人又多呆了一周。她父母相信他在希娅身边或许可以使她更快恢复。

她下床的第一天就和客人一起出去散步了。他们在附近

一座公园里散步，然后在和暖的阳光下静静地坐在公园长椅上。过了一会儿，希娅说有点儿冷，两个人便起身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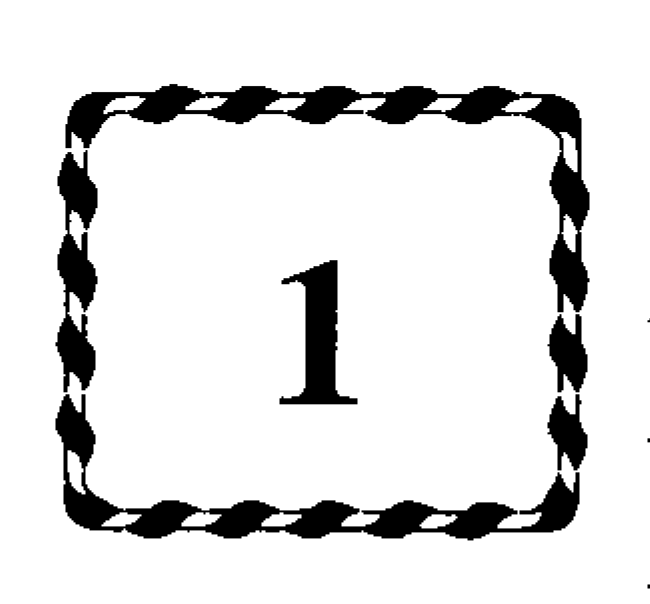
在路过药店的时候，希娅请她的同伴等她一会儿，她去买些药。

当她告诉药剂师她所要的药时，药剂师训斥了她一顿，并斥责年轻一代的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

“如果不是从小看你长大，”药剂师说，“我是不会在没有拿到医生处方的情况下让你买走这种药的。”他手里捧着袋子里的药盒，笑哈哈地说道：“卖给你这药完全出于贫穷而非意愿。”

希娅回到客人身边，挽着他的胳膊，微笑着说：“现在该回家了。我好累，该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第二章　基·阿



基·阿大约十二岁时，他父亲离开了家，与另一个女人住到了一起。他的母亲以前从无戒心，现在事态竟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对她来说打击实在太大。基·阿起初只是朦朦胧胧觉出点什么，但当他父亲出走后，他将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粘连在一起，就开始憎恨起他的父亲来。这种憎恨很快便转变成一种渴望和痛苦。

他母亲出院后还与从前一样美丽，但眼神中再无好奇，有的只是愤怒和说不出的惊诧，基·阿觉得好像从前生活中的妈妈已经死去，现在的母亲变成了一位一眼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原来妈妈的一个替身。

殷实富有的商人家庭里原来的严格有序的日常生活习惯：准时的三餐、周末宴请宾客、假日乡间旅行、每年两次的出国

旅游——瑞士或西班牙——所有这些都在一夜之间戛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孤寂。床上整日无人整理，厨房里东一块面包西一只盘子；过道尽头的收音机也无人去关掉，乏味地响个不停；起居室里的一只灯泡烧断了，夜幕降临时，半个房间便永远黯然无光；每个屋门都敞开着，无论母亲在哪儿，她的受了惊吓后发出的呜咽声随时会传出来，她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两眼茫茫地直视着前方，两只手耷拉在两旁——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有一年，基·阿几乎天天要面对这一切。

起初，每当他听到母亲的哽咽声时，便会飞快地跑到母亲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恳求妈妈不要哭泣。但她对他的抚慰从无反应，两手还是垂在两旁，不住地拨弄着衣边，直到哭泣声渐渐小下来，她从他的双臂中抽出身，无声地转向一旁，开始忙起她脑子里能够想起的任何一件急着要做的事情：叠起脏餐巾，然后放进抽屉，或者将一只空花瓶从桌子上放到墙边的架子上。基·阿默默地跟着母亲，不敢哭出来。这阵子过去之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卧室，坐下来完成作业。以前她会督促他刻苦学习，而现在他却是在努力地去做她以前要他做的事，尽管他知道她再也不关心这些事了。

一年后，他母亲加入了一个宗教团体，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了：访贫问苦，或深夜向睡在桥下的流浪汉分发食物。在家时，她的脸上也有了淡淡的笑容，双手又在不停地忙碌一些家庭琐事了，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正常景象。可这一切使基·阿不仅仍有孤寂之感，反而又凭添了一种隐隐的恐惧：在这幢大房子里料理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再无人要用客厅

和带十二把椅子的餐桌；为客人和亲戚们准备的两套卧室永远都空着没人用，床上清洁的亚麻布散发着一股死亡的气息。母亲的卧室又恢复了原样；半个双人床整齐地理好，床单头上叠成个小三角；他父亲的拖鞋摆在地毯上，像在等着主人从浴室里走出来；床边皱巴巴的枕头斜愣着躺在那儿，像是被愤怒和希望揉碎的一丝狞笑。

母亲又开始关心起他的每个需求了。而他从母亲那里听到的都是些被生活压垮的人们的疾苦啊，上帝的怜悯啊，还有什么需要用爱去接受上帝的裁决呀之类的话。基·阿默默地听着她讲述这一切。

在他十四岁左右的时候，父亲把他叫到城里的一座饭店，跟他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并告诉他自己对基·阿未来的设想。下个秋季，父亲说，基·阿要去寄宿学校上中学。在他十八岁生日的时候，父亲会给他买一辆高级轿车作为生日礼物，他还将被送到他父亲为他选好的大学学习，他将在大学里学习四年的法律和经济。此后他就要进他父亲的商行做学徒，再以后的事他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那次在那个饭店，他父亲还送给他一件礼物，往常每次圣诞节或生日时他父亲也会送礼物给他。这次的礼物是一只手表。这只表是由一个又大又厚的金币一切为二，分别做成底盘和外壳，里面是瑞士的一种名表，至少也是最贵的。基·阿犹犹豫豫，不敢碰一下。他父亲拉起他的手，把他的外衣袖子卷起来，将表戴在他的手腕上。戴上之后，他在儿子的手掌上轻轻地拍了拍，鼓励地说：“好啦，就这样。”

一天夜里，他正在自己房间做功课，听到楼里一阵赤脚走路的声响。他抬起头，看到是母亲。她刚刚从浴室里出

来，很显然她在进浴室时没有穿睡衣。反正他看到她的背影赤裸着，两脚拍打着地面急匆匆地进了自己的卧室。她的身体显鲜嫩的粉红色，两瓣丰臀随着髋骨的运动从左向右、从上往下地抖动着。她的手像是在托着两个乳房，两腿很肥却又很灵巧，好像要被甩出来一般。基·阿全身直抖，他闭上了双眼。当他再睁开的时候，楼道里已空空如也，只听到父母房间的门砰地被关上了。

很快，母亲又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她已穿戴整齐，准备进城了。她在他房间的镜子里照了照，提醒他别忘了把她留在厨房的饭吃了，道了声再见，就出门去了。她刚一离开，基·阿就凑到卧室的窗边，撩起窗帘向街上窥视。他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在下面等她，她又是从哪条路走的。她走得很急，简直可以说是在一路小跑。如果她不穿戴的话，谁都能看到他刚才在他们家楼道里所亲眼见到的那一幕了。

他上了床，可睡不着。深夜里他听到前门开了，然后是他母亲的脚步声，马桶的冲水声，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又打开，又关上，然后是一片静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几个小时就这样清醒地躺在这里，心里充满妒嫉、伤心和恐惧。现在他放松了下来，进入了梦乡。梦里他离开自己的床，将她的床单掀起，爬进她的床里。让他吃惊的是，她并不害怕，脸上反而露出祈求的表情，好像她在请求他不要做她实际上想叫他做的事情，尽管天知道，这是不能允许的。“别怕，”他对她说，“我会比父亲还棒。”然后她竟屈从了，他抱着她，尴尬、内疚感与野蛮交织在一起，起初她脸上挂着的那副祈求怜悯的表情逐渐地变成了心甘情愿和一脸顺从的微笑。他从梦中醒来，全身都湿了，心中很怕，但又为只

是一个梦而感到失望。如果我现在起床去找她，该会怎样呢？他问自己。清晨，在饭桌上吃早点时，他侧目看了她一眼，心里很沮丧，真希望能忘掉所发生的一切。

2

基·阿到了去寄宿学校的年龄，终于盼来了离开家的这一刻。夏末时节，家里的窗子中午打开着，直到日落才关上。就在这时候，他发现了街对面同一层楼里住着的一个女孩。他看到她站在窗边，她的妈妈正在将她的头发系上一条黑色丝带。她的头发是红棕色的，基·阿觉得她简直美极了。很快她便进入了他的梦乡，常和他的母亲互相交替出现。

当他从窗子里望出去的时候，偶尔还能看到她在穿衣服。那时候，他就会冲到街上，看着她从房中出来，然后消失在去主要街道的方向。最后他终于弄清了她的行踪。为了不再火急火燎地冲到街道上，他养成了每次提前坐到楼下咖啡屋的习惯。从大玻璃窗里，他能注视到她的出出进进。

到他去寄宿学校的时候，他已记下了一本写满对那位戴丝带的女孩的爱慕之情。笔记本里还写着几首诗呢，尽管它们不是那么押韵。在他走的前一天他写道："我没有离开你，我的爱，有一天我会回来娶你。"

一到寄宿学校，他的过去便像是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大幕。新鲜事物、呆板的教规带来的刺激，体育比赛和赛前让人精疲力尽的训练，与众不同的校服，还有那种由于属于某种学校而滋生的骄傲——所有这些都使他飘飘然，他变得热心于各种活动，并且为拥有这一切而心中充满感激之情。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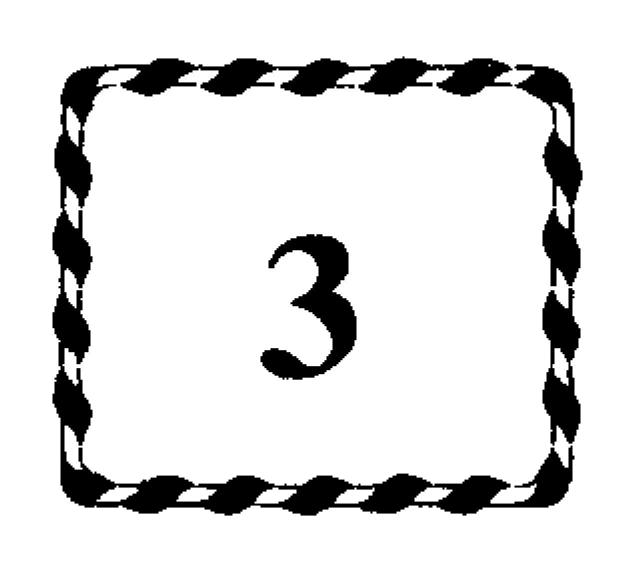
年级的学生欺负了他，也被他认为是件很自然的事，他也会通过欺负比他还小的那些孩子作为补偿。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位很相投的朋友。这个男孩有一头红棕色头发，眼睛呈淡褐色，像他笔记本中的女主角一样。他们的寝室里共四张床，他俩的床挨着。其他两个男孩从各方面讲早已是情人模样了。那年第一个落霜的冬夜，他的朋友钻进了基·阿的床里，并说像这样的冬夜他们应该互相取暖，否则他们就会被冻死的。他俩便这样快乐地相拥而眠了。

第二天，基·阿收到他母亲写来的一封信，说她春天里要嫁给一位令人尊敬、品质优秀的男子。她还补充说他父亲为此感到很气恼，尽管他并不拒绝跟她离婚——因为她自己不同意离婚才一直拖到现在——他向她讲明他不会再给她任何经济上的支持，但基·阿不必为此担心什么，因为他理所当然会继续赡养他的儿子。对于她来说，他也不必担心，她的未婚夫是个生活有保障的男人。

基·阿将信读了两三遍，一股痛苦和厌恶的情绪使他紧闭双眼，脑子里浮现出一幕幕那位具有“优秀品质”又有“生活保障”的男人在清醒时对他母亲所干的那种事的详细的画面，正像他在梦中或在冥冥中对她所做的一样。基·阿试图找到任何可以使他摆脱这种既让人愤怒而又无能为力的办法。但除了他的屋友兼床友，他别无良药可医内心的痛楚，而他的床友却与此事毫无干系，帮不上什么忙。忽然他想起那个头戴黑丝带的女孩。显然，自从来到寄宿学校，他几乎完全把她忘了。女孩是心甘情愿来到他的面前，脸上的微笑充满抚慰，双手温柔地将他眉上的冷汗抹去，将自己的脸颊贴着他的脸颊，轻声地安慰着他，虽然他不能马上理解

她说了些什么，但那些话让他感到听着很顺耳，很合情合理，好像一阵微风吹来，先是给他以希望和内心的安宁，继而使他那绝望的情绪化为一种无比的快乐。此时此刻他暗暗地作出了一个正式的决定。

夜里，当他的朋友抱着他躺在床上时，他便试着向他的朋友说出了他的决定。他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基·阿发誓今后再也不会爱上别的男孩，他会将他永远留在自己美好的记忆中。那一夜，两个男孩相互拥抱着，都哭了。第二天一早，基·阿就去请求调到另一个寝室去住了。



在寄宿学校的最后一年，他已近十八岁了。基·阿回家度一个短假，他被邀请去参加N家举行的宴会。一进房门，他便看到自己的心上人正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和另一个女孩交谈。他赶紧将头转到一旁，走到饮料桌前，一口气喝了几杯白酒，然后找了个位子坐下，以便能不被打搅地静静地看着她，那天他就在那儿坐了整整一夜。他向别人打听她的名字；他自己心里已经想到过几个名字，希望其中的一个是她。当知道她叫希娅时，他却非常高兴自己的猜测全是错的，因为实际上这个女孩的名字要比他想象的要好听得多。N主动提出将他介绍给女孩，他急忙说不必了。“我自己会认识她的，”他说，可马上他又后悔拒绝了他的好意，同时心里生出一股自豪感，这让他感到很新奇，因为自己能断然处事了。

在他回寄宿学校完成最后一个学年的最后一学期的那天，基·阿靠在她家楼口等希娅。他知道希娅也要回校参加

终考了。她从家里出来了，他朝她笑笑，虽然双膝在发抖，可他还是用强作镇定的声音说：

“在N的宴会上，你看到我一直在盯着你，我看见你看我了，请别否认，希娅小姐。我叫基·阿，这你知道，你问过他们，他们告诉你了，说那个一直盯着你的白痴叫基·阿。噢，不错。现在你肯定会告诉我，说你很忙，没时间陪我到街对面咖啡屋喝点什么，一分钟也没有，对吗？”

“你观察得很细，也很健谈，”希娅说，“晚会上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巴呢。看在你恢复了嗓音的份儿上，我可以和你喝杯热巧克力，但只限十五分钟，因为我真的很忙。”

他们走进就在她父母公寓对面的咖啡屋，也就是基·阿住的那幢楼的楼下。桌子全都坐满了人，在他们四处找位子的时候，有个人注意到了他们，挥挥手建议他们坐到他的桌上，他自己端起杯子，问另外一个人是否可以坐到他桌边的空椅子上。基·阿谢过那位男士的美意，拉着希娅来到这张空桌上。希娅并没有注意到这是什么人的善举。

“现在我要充分利用你为我匀出的这十五分钟的每一秒钟，”基·阿说，“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整个夏天我都一直从你家对面的窗子里关注着你？我就住在这儿，住在这幢楼里，楼上……你看到我注意你了吗？”

希娅告诉他她确实从未注意过他，如果她注意过他的话，她说，她会立刻关上窗子。探头探脑、举止粗俗的邻居向来招人讨厌。

“但我是满心敬仰地望着你啊，”基·阿辩解道，“难道崇敬也那么令人讨厌吗？”

“你本应征得允许，”希娅答道。她笑了起来，舌头尖伸

到巧克力杯里试了试温度。

“那么现在我就请求你的准许。”

“透过窗子——感觉好点，”希娅说。

“那你不会关上它们了吧?”

“我明天就走了，剩下的问题就由我母亲来处理了，我想有你这样一位崇拜者，她一定还巴不得呢。”

“你太残酷了，”基·阿说着，脸上显得既悲伤，又绝望，这种表情来得如此之快让希娅吓了一跳，她连忙挽救对他所造成的伤害。

“请别把脸拉那么长好吗，难道你看不出我是在自卫，为的是免受你的攻击吗？现在轮到我问个问题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痛快就和你来这儿小坐吗？让我告诉你吧，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曾给我写了那封傻气十足的信的人。你还是承认了，向我解释解释吧。”

“信?”基·阿愣住了，“我从来没给你写过什么信呀，我是说，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整个笔记本里写的都是你，可我没寄给你呀。在见到你之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个。你那封信里说些什么?”

希娅看着基·阿那张痛苦的脸，心里感到很有趣，但仍显出一脸的严肃，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说：“我相信你的话，那就不是你啦。”

“那你现在是不是为同意跟我一起来这儿而感到后悔了?”他问道，声音里充满绝望，当初将她拦在街上时鼓起的勇气已一扫而光，心想自己做得太迟了，她已将心许给了别人，那个写信给他的人。

“那现在呢?”他祈求地对她说，“现在会怎么样呢?”他

已无法冷静集中地思考什么了。明天他俩就都要离开这儿，即使有可能的话，也要三个月以后才能相见。他无法想象他们的第一次相会竟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他清楚自己现在离相遇之初时定下的那个万无一失、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相去甚远了。

“我的上帝，”希娅突然大笑起来，“怎么我周围尽是些疯子?”

“我没发疯，希娅，”基·阿说，“已经三年了——三年多了——自从我看到你那天起——不止是看到过你，希娅。我不该用某些我想用的词，但我确是很认真的。”

“别那么认真好不好，”希娅说，“在我们说再见之前，讲点什么高兴的事儿吧。我其实早该走了。”

“那我告诉你，”基·阿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说，“那我告诉你——听着，再过三个月我就离校了，那时候我会拥有一辆小汽车，一辆最棒的小轿车，也许会是辆豹牌……你能答应我带你一起去兜风，来庆祝我俩毕业吗？……答应吗?”

“真的?”希娅嘴里打了个响舌，“你是说豹牌车吗？祝贺你，司机先生。你的意思是我能坐在后排，你坐在前排，你带我到乡下去吗?”

“豹牌车没后排座，只有前排两个座位，是赛车，”基·阿解释道。

“噢，赛车又当别论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还是将这一提议先放一放，现在请别生气，我已经迟了。”

他们握手道别。当希娅离去后，基·阿吻了吻自己的手心，心中无比快慰。

到了寄宿学校后，他每天都给希娅写信，为自己的愚

蠢、莽撞、过分认真和不够果断表示道歉。("请忘了豹牌车那件事儿吧，我每次回想起自己上次的粗俗表现就感到脸红。")他只请求她一件事——不要禁止他给她写信，并答应在毕业时见他，在同一地点，那个他一生中经历过最幸福时刻，也是他整个生命中第一次经历如此幸福时刻的地方。

希娅大约每十天写一封回信，请他不要那样毫无道理地贬低自己，并说她能理解，他不比其他任何男孩差。最后她求他考试结束前不要再写信了，并答应他如果他按她说的做，她就同意考试结束后还到那个咖啡屋与他相见，并再喝杯巧克力以庆祝离校。

基·阿遵从了，不再写信给她。能得到她的允诺并能再次见到她是他至今为止得到的不小的收获。自此以后，他又开始将自己投入到另一项任务中去了。这项任务在他看来能大大促进他俩之间的关系。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在终考中取得高分。他认为高分儿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夜里学累了，他便用毯子蒙上头，心里呼唤着希娅，与她交谈。开始时，他先让她戏弄自己一下，但很快他就能让她严肃地对待他的爱，并允许他抚摸她的面颊。他的手会从她的鬓角慢慢地滑到她的脸上，然后到她的嘴唇，就像一个盲人那样摸索着。他希望她会忽然张开双唇，咬住他的手指，但她并没那样做。不过他安慰自己说她的双唇已使他感到温暖和脉脉柔情，他的手指因此而颤抖起来。当他开始自慰时，他便从脑海里抹掉希娅的影像，幻想着他母亲的裸体，这样就可以保住希娅的荣誉，直到那一刻来临之前，她的身体都能保持冰清玉洁。



基·阿考试成绩非常出色。他父亲看过他的证书后显得很高兴，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为儿子感到骄傲，并立刻宣布，虽然他原来准备给他买一辆豹牌车，但现在看来他俩应该一起去展卖厅看看，这样他儿子就可以自己选了。基·阿选了一辆樱桃红的兰波瑰尼小轿车。这种车的轮子很宽，车尾低平，尾部翘起，能在车速达到 165 英里/小时的时候防止汽车发飘。

当他打电话同她约会时，内心的束缚一扫而光，他对希娅说："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我就发誓要考取好成绩，这是那时我能做到并要向你证明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希娅。"

"祝贺你，"她说。他能听出来她的嘴里挤出一声笑，"我肯定我俩见面时你会把你的证书一同带来的。"

他站在他们那幢楼的大门后面，看到希娅走出来，穿过了马路。他走了出去，在通往咖啡屋的路上等着她，还将手里的证书卷成了一个硬纸卷儿向她挥动着。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很蠢。但尽管如此，他仍认为如果她看了他的成绩单，不对他另眼相看那才怪呢。他们找了张桌子坐下，要了两杯热巧克力，希娅指着那个纸卷儿，意思是他该打开给她看了。

希娅慢慢地读着那份证书，基·阿观察着她脸上的表情。她的美貌让他陶醉，所以他简直说不清她的笑是嘲弄还是赞赏。终于，希娅放下那份证书，抬起眼看着他。

"太棒了！"希娅说，"我原来还以为你大概不大会说话呢！"

"我知道你原来以为我是个大傻瓜，"基·阿说，心情又变得像他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时那么自信了，"现在你明白了，

魏即使是个傻瓜，至少也是个有些天分的傻瓜。也许有一天，我还能成为一位满腹学问的大傻瓜呢。”

“我没带自己的证书真是做对了，”希娅说，“如果带了，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比我棒多了。你当受一吻。”

当希娅向他探过身去时，他急忙起身相迎。恰巧他迎上去的不是自己的额头，她吻到了他的嘴唇，俩人都被这一吻弹回了各自的座位上。

“希娅，”基·阿几乎是喊了起来，“希娅，是你要这样做的，记住了，你走的第一步；现在我用不着负什么责任了。”他想笑，可眼睛里分明浸满泪水。他眨眨眼睛想把这泪水收回去，但笑声却走了调。他捧起希娅的两只手，将自己的脸埋了进去。

“天才先生，”希娅轻轻地说，“周围的人并没看到你的成绩单，他们会认为你在发疯呢。”她没抽出双手，而是探过身去，请求地说：“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不可能的吗？”

基·阿坐直身子，放开她的手，端起自己那杯巧克力。

“为未来干杯，希娅……你会为这一吻付出高昂的代价的。”

“你是头猪，”希娅微笑着说道，手里也捧起自己的杯子。

“现在呢，”基·阿说，“我向你引见一位女士，跟我来吧。”

“什么女士？”希娅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下巴微微地翘着。基·阿以前从没见过她这副样子，也从未想到她的脸竟变得如此严厉，但他仍不愿因此而退缩。

“一位意大利女士，”他平静地说，“一位高贵的女士，她已经等了你一个多星期了。”

“意大利人？”

“兰波瑰尼公主，”基·阿说道。

“她在哪儿？”

“在院子里，”基·阿说，“就在这幢楼下的车库里。”

“你吓了我一跳，”希娅说着，脸色又转回到寻常的模样。

他们绕过房子，来到院里。基·阿很快打开了车库的门。这部汽车的车头像是一个红色怪兽的大鼻子，几乎算得上其他部分的两倍；一个大大的字母“T”镶在车头，金灿灿的，用黑线勾勒出来。

“女士，”基·阿这样称呼着这辆车，“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位年轻的小姐，您是以她的名字而命名的呢。”

他打开车门，对希娅说：“公主请我们上车。”

“她丑得像条蛤蟆，”希娅说，“难道这就是你那老爸给他天才的儿子的……你老爸可真够慷慨的。”

“他那么有钱，这点算不了什么，”基·阿说着，又立刻后悔说走了嘴，便试图弥补道，“他答应过的……不能反悔……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本该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唉，还是别提它了，希娅，我们开车去兜风吧。”

车开上大路，基·阿开着车，默不作声。他们离开了城市，在高速路上向北行驶。他瞧了一眼希娅，说道：“坐稳了。”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不到一分钟的工夫，车子便已升到了最快速度，飞快地开向超车道。他一边按着喇叭，一边风驰电掣般超过了几十辆车。

他们的车就这样像一阵狂风一样冲了一刻钟左右，希娅开口说了些什么，但基·阿听不见。一辆又一辆车被甩在他们的车后，忽然他听到车里响起刺耳的口哨声。

“你说什么?”基·阿喊道。

她倾过身，对着他的耳朵喊道：“我们去哪儿?”

“你怕了吗?”基·阿叫道，两眼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

“我没怕,”希娅喊道，“我喜欢开快车。”

“真可惜,”基·阿大声叫着，“我希望你会吓得紧紧抱着我。”

“我被你套在安全带里呢，你这个傻瓜!”

他把脸伸给她，双手仍握着方向盘。

希娅用手背蹭蹭他的脸颊，说道：“你的优秀成绩已经得到大大的报偿了。有你父亲给你的，也有我的。我们去哪儿?”

“去你那儿!”基·阿叫着。“去你在天堂的住所，希娅。天上也属于上帝；但上帝把地球给了人类的子孙。我们现在就从地球去天堂，过不了一会儿，我们就要起飞了，希娅，我们就要飞、飞、飞起来了。”

前面的路穿过一个山丘，迎面的岩石石面像一堵墙，这块岩石的后面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一英里外有一个饭店。

“在我们飞起来之前,”希娅喊，“我能吃点什么吗?”

“我们到别处去吃,”基·阿大叫道，“不去那个可怕的山洞。”

“你想去哪儿从来没跟别人打过招呼,”希娅喊，“别忘了我们一会儿还要回城里呢。”

“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在庆祝毕业，半小时后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你疯了，”希娅朝他叫喊，“你这叫非法拐骗，我不想跟罪犯在一起。你再不停下来我就不跟你说话了。”

基·阿将车开到路牌上写着的那个停车场停了下来，解下安全带，将头夹到她的脖子和肩膀之间，吻着她的脖颈，嘴里喃喃着：“希娅，希娅。”

她抚摸着他的头，说道：“这就对了，这才是乖孩子。你这只癞蛤蟆，快直起身来吧，我们好一起去吃点东西。”

“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说你今晚才回去……或者如果你愿意，今天下午也行，但要下午晚些时候，希娅，我——”

“行啊，”她说，“这次就听你的，但这次我得提防着你，你是个凶恶的罪犯。”

她出去打电话，基·阿闭上双眼，头枕到座枕上，嘴里咕哝着：“上帝，上帝，这不可能；上帝，这不是真的，我真不敢相信。”



希娅夏季里大部分时间都和父母一起度假。基·阿收到过她儿封明信片，但上面没有回信地址，因为她家是开着车沿路旅行。他们先到了法国，然后又去了意大利，直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俩人才聚到一起。他们保证互相通信；希娅劝他不要“忘乎所以”。她说他们开头的几步（她是这样描述他俩之间的关系的）走得太快了点儿。他们还要上几年大学，这期间各自应乘这个机会好好反省自己，学会克制和“检查自己”。

"我考试从来所向披靡，大获全胜！"基·阿不乐意地说。

"我可不能与你这个天才比呀！"希娅答道。

基·阿心情沉重地来到大学的校园，心里总是担心这事儿会吹。

他们每年见三次面，每次都是在假期里。头一年希娅与他见面的条件是不再写信。她认为书面的东西会歪曲了事实，并会让人想入非非，甚至变得疯疯癫癫的。基·阿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了这个条件。第二年，希娅自己也意识到禁止书信往来是多么荒唐。第三年，他们又开始经常通信了。也是在第三年的时候，基·阿终于鼓起了勇气，告诉了希娅她原本也知道一二的事——他父母的离异；他对他父亲的怨恨，还有他母亲，用他的话说，她的"神经质""造成了他不必要的精神负担"，他说这话时却向来不提任何具体细节。

同年，在他毕业前的那个假期，他们开着他的新兰波瑰尼车（一辆白色轿车——那辆"癞蛤蟆"早已被他卖掉了）去了法国。那天来到诺曼底的一个叫拉·高特瓦的渔村，他们将东西放到宾馆后，便来到海滩。低潮时海水退出海滩近一公里，他们随着人群捡着牡蛎，默默地瞟一眼放到篮中的东西。俩人手拉着手，手指还不时深深握在一起，好像是想要从步步逼近的夜色里逃脱出来。希娅从他茫然和毫无准备的神情中隐隐感到今晚可能会不尽如人意，基·阿也明白她已经猜到了这一点。

让俩人惊喜的是，他们的初夜竟安然度过了。希娅以为，他们的笨手笨脚完全是由于她男友对她深深的爱；基·阿也暗暗安慰自己：虽然她没有感到完全满足，但她希望今后会更和谐。正当他要祈求她宽恕的时候，希娅制止了他，

一边叫着“我可爱的小傻瓜”，一边对他完美的身材和结实的肌肉发出赞叹，甚至还责怪说是自己让他毫无道理地等了太长时间；如果他的信心受到了影响的话，那么要受责怪的应该是她，他只需记住她是个愚蠢的小女孩儿。

基·阿因此心中充满感激，几乎要哭出来，但他理智地忍住了泪水。那一夜，他对自己发誓，他要把为父亲工作后赚来的第一笔钱为希娅买一份能让她喜出望外的礼物。他不清楚究竟该买件什么礼物，也不想现在就考虑得很清楚；同时，他想，也许没有什么礼物能让她喜出望外，倒是她那不受外界影响而且清晰的头脑却成了他刚刚得到的一份厚礼。

他们在法国旅行了大约三周，最后一夜是在爱克斯·普鲁旺斯度过的。这一夜俩人激情荡漾。希娅为自己的成功而自豪。她从浴室的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身体，心中充满女性特有的柔情。她忽然忆起四年来收到的那位既聪明又可怜的怪人信中写的几句话。“这不是我的错，”她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说，“我从没见过你呀，远方的人儿。”

她回到卧室，看到基·阿侧着身睡着了，他的面庞英俊又安详。她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他睁开了双眼。

“我的妻子，”基·阿喃喃道，“我亲爱的小妻子。”

“你得跟我父母见见面，”希娅说，“我家可不许你诱骗女孩，你得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行。”

6

大约是在希娅和基·阿举行婚礼前的一个月左右，一天，基·阿坐在他家楼下的咖啡屋里拨弄着手里的计算器，结算着一天来的帐目，希娅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到。

“请原谅，先生，”他听到有个声音在他桌边响起，“我能坐在这儿跟您说几句话吗？”

基·阿正准备道歉并想解释他在等人时，那人却显得和颜悦色，说话时声音低沉却很悦耳，还带着一股外国口音。基·阿抬起头。

他面前站着一位大约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穿褐色羊绒套装，头戴一顶软毡帽，这套装束使他全身上下在整洁、优雅之中又显得很随意。此人看上去修饰得体，身体强壮有力，同时又快乐友好。一时间基·阿觉得好像自己在银屏上，或在大街上，也许就在这座咖啡屋里见过这人。反正他感到无法拒绝他。不仅如此，就在基·阿抬眼打量站在他面前这个人的一刹那，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但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想，如果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那么等我成熟起来，也会成为他这样的一位出色的男子呢！

“请坐吧，”基·阿说道，“但我约好了人，大约二十分钟后到。”

陌生人谢过后，介绍说自己叫吉奥·米兰，然后在桌边坐下，摘掉礼帽，解释说他只占他几分钟时间，不过随便问问；他在附近做生意，所以有好几次都看到基·阿开的那辆白色兰波瑰尼小轿车，他本人也想买一辆新车，也买这种兰波瑰尼车，只是没碰到机会跟这种车的车主聊过。他想了解

有关这种车的性能如何。此车价钱昂贵，不知值不值得买；如果需要时，当地能提供些什么服务项目；问这么多问题会不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

基·阿对此车大加赞赏，并真心实意地推荐这辆车，还补充说如果这位绅士第二天同一时间有空儿的话，他们可以在此楼下的车库见面，他将非常乐意让他试试，体验一下；这种车现在没货，要想去展卖厅去试，不等上几个月，也得等数周之久。

米兰先生说他真不知该如何答谢他的好意，他自己决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然而，如果真的方便的话，第二天同一时间他会准时在院里等候，然后又一次向他表示感谢。

基·阿从咖啡屋的窗子里看到了希娅，朝她招招手。米兰先生急忙起身，戴上帽子，再次为自己的打搅道过歉后，转身离开了。他为希娅开了门，并说："小姐，您请。"

"谢谢，"她一边说着，一边从他身旁走过，来到未婚夫的桌前。

第二天，当基·阿下楼去院里车库的时候，心里仍感到自己以前曾经见过此人，但却想不起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过他了。他的脑海中闪过这人在咖啡屋的桌边就坐的镜头，但立刻又觉得自己的记忆在开他的玩笑，因为他总在不住地回忆起前一天在同一地点见到他的情景。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基·阿心里很纳闷，是不是因为这人太惹人喜爱了呢？猛然间，他的脊梁骨直冒冷汗，全身一阵颤抖，并且头昏目眩。可我不怕他，他几乎喊出了声。

陌生人已站在院子里，朝基·阿微笑着。

他们坐进车里，基·阿开车，陌生人头戴礼帽坐在他旁

边。汽车驶出车库，来到街上，然后开向主道，驶出城区。

"开到公路以后，"基·阿说，"就请你来开，你就能了解这车的性能如何了。你一边开，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的情况。"

他俩系紧安全带朝北驶去。基·阿演示了一遍五个档如何操作，仪器板和各刻度表彩灯的含义。他很骄傲地说，这车只用十二秒就可以从零提到飞快的速度。米兰先生仔细地听着。车开到转向公路的斜坡时，基·阿停下车，他们换了位置。米兰先生从一开始就能自信地驾驶，这让基·阿毫不掩饰地大大称羡一番。车子急驶前进，基·阿目不转睛，盯着米兰紧握方向盘，平稳准确、镇定自若地调整着方向。车开到一个酒吧，米兰开进停车场，问可否请他喝一杯。他们从车里出来，他请求看一眼引擎。车盖打开了，基·阿看到米兰检查着电路线，又打开油罐，这里拧开一个螺丝，那里又拧紧一个螺丝，这些动作都做得既娴熟又专业，令基·阿佩服的五体投地。汽车技师也不过如此，可要买兰波瑰尼的人却绝不仅是个修车的技师啊。

坐在酒吧，米兰先生啜着酒，默不作声，两眼盯着手里的杯子。基·阿心里奇怪，为什么他忽然显得那么忧郁呢？这时心里又闪过当初的那个念头，这人已不再年轻，为什么要买双座赛车呢？也许他还没有结婚，喜欢年轻女郎的陪伴，但这对他这种年纪的人来说，这种事不会产生什么巨大持久的魅力呀。或许他忽然产生了什么别的想法，正考虑这值不值得他去做。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嘛，基·阿心想。再过几年，我也许会卖掉兰波瑰尼，买一辆家庭型轿车，带着孩子一起出游

呢。我可以把这车卖给他，他就不必等几个月的时间了，可看上去他好像又改变了主意。

“我年轻的朋友，”米兰先生忽然开口了，“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又占用你如此宝贵的时间，请别生气。我真的不该来，这种自私的行为既可耻又不可原谅，请告诉我你不讨厌我。”

基·阿急忙请他放心，说自己从未烦过他，上帝不允许他这样做，相反，他很高兴认识他，而且他现在的时间并不那么宝贵，因为这些天他反正也没什么正经事儿。事实上，他忍不住说了出来，实际上他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结婚了。他现在非常幸福，如果他能对他有所帮助，他将感到很高兴。

“请原谅，”米兰先生说，他看了看手表，“我得去打个电话。我忘记了，可能还有个约会。请别见怪，我去打个电话，就一会儿工夫。”

基·阿也看了看表，为能很快回城而感到高兴。

米兰先生回来了，说事情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应该一小时前就与某个人见面，结果他竟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基·阿想立刻送他去，但米兰先生说他再不能给他添什么麻烦了，他已经叫了出租车，况且他们的约会地点还很远。基·阿执意相送也不起作用。他们便握手道别，这时俩人的客套已不似刚见面时那么充满轻松欢乐的气氛了。

基·阿坐到车里，朝南开去。大约十五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开到了酒吧，将米兰先生驶向同一个方向。回城的半路上，出租车不得不停了下来，道路被警车、救护车和其他由于交通事故堵在半路的车挤得水泄不通。

一辆白色兰波瑰尼底朝天跌到了沟里。米兰先生从远处张望着，他看到路边淌着一滩鲜血，担架上躺着一个人，脸色惨白。

验尸报告中称这人死于失血过多。

第三章 尼科斯·特里安达



尼科斯是特里安达菲罗一家在亚历山大生的第一个孩子。本世纪初，他父亲在孩提时就从希腊迁居到亚历山大，他母亲也是希腊人，他出生一年后又生了他妹妹。他妹妹后来成了一名民歌手。多年以后，在她约十八岁在贝鲁特一家夜总会开始她的演唱生涯时，她父亲与她断绝了关系。不过在她成名后，唱片店的橱窗里全都贴满了她的玉照时，她父亲却又送给她一只钻戒，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字："Chapeau, ma petite"（佩服你，我的小女儿），其余既不解释，也不道歉。

在亚历山大这个国际大都市里，老特里安达菲罗的金钱、名誉和沉默寡言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地位。而尼科斯脑海中铭记着一句话，一句幼时得自父亲的训诫。他父亲总是反反复复地说："亚历山大真正

的主人不是那些愚蠢透顶的埃及人，而是希腊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

尼科斯童年里最早的小伙伴是邻里那些犹太小孩，他从他们那儿学会了拉迪诺语。这对他来说并不难，因为他在学校已学会讲法语和意大利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尼科斯举家从埃及迁到贝鲁特，在那儿他有个经营金融、外汇业的叔叔。从此他与那些犹太孩子们的交往就中断了。但他很快就发现，原来在贝鲁特，他家附近也有许多讲拉迪诺语的犹太孩子。

老特里安达菲罗的长远打算是要让女儿嫁给自己的一个侄子，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产业。他把儿女两人都送到贝鲁特最好的学校去读书；还送他们到一位年迈的犹太小提琴家开办的音乐学院去学习，他认为这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可他错了。当他女儿开始醉心于歌唱艺术时，他让儿女俩人都从那所音乐学院退了学。他还告诫尼科斯说瞎混日子是毫无益处的，要他攻读法律和经济学。不过，无论发生什么，尼科斯始终没有放弃音乐，在家里偷偷地弹钢琴。

在妹妹被家庭彻底抛弃的那一年，尼科斯开始了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的学习生活。对特里安达菲罗家庭来说，大战的结果便是他们一家与维希政府的军官们成了亲密知交。在战火纷飞中，他们迎来了黎巴嫩的征服者：阿拉伯人、法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家族在不断聚敛财富。

在尼科斯父母的床头摆着一座古旧的圣像，平静而安详。每逢礼拜日，全家人都到教堂去，客客气气地对一个蓄着花白辫子的牧师以礼相待。老特里安达菲罗总是在募捐箱中塞进一枚钱币，那牧师则报以殷勤的致谢和吹捧。

表面上看，尼科斯在大学里学习十分用功。但当他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时，却背地里拟定了自己的计划。他学了古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收藏了大量的古典文学著作。在几年的学习期间，他经常坐在床上读荷马，读但丁。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妹妹的遭遇教会了他不能把自己的想法泄露给任何人，只有他母亲私下里知道他的想法。每当他父亲外出，他便坐在钢琴边弹起来，这时母亲总是坐在扶椅上端详着，聆听着，眼睛湿润润的，闪着亮晶晶的泪花。母子间不用言谈便能意会做父亲的是个讨厌鬼，家里惟一公然举起反叛大旗的只有那个爱唱歌的女儿，真可谓勇气可嘉。母子二人都知道，在那个暴君背后偷弹几下钢琴算不上什么勇敢，但这至少是绝望时的一种倾诉，或许借此表达对前途的希望。

毕业后，尼科斯申请到一份留校教职。他告诉父亲说教上一两年书可以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还可以使自己将来做商人做得更好。其实他是要偷偷地攒钱，然后去欧洲。

尼科斯很幸运。当时他父亲正忙于准备将家搬到日内瓦去，所以没机会把儿子卷入到商界的漩涡中去。因此尼科斯暂时还是服从父亲。但瑞士当局拒绝向特里安达菲罗签发永久居留许可证，所以他只好另作选择，决定把家搬往巴黎。这其中辗转一年，当老特里安达菲罗夫妇和儿子尼科斯一家人搬到巴黎，在新家安顿下来后，尼科斯才住了几天，便留下一封信给父母，从此离家，扬长而去。

2

他动身去了西柏林，他妹妹在那儿。这回，她该可以实践曾在信中向他许下的种种诺言了。在他刚到的那个晚上，她便把他介绍给一位餐厅经理，她在那个餐厅里当歌手。尼科斯有意想做她的钢琴伴奏，在通过考核之后，他便得到了这份工作，每周工作六个晚上，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

他妹妹住的公寓里为他腾出了一个房间。他知道自己晚上一定睡不着觉，于是干脆合衣而卧。他伸了伸懒腰，回想着自己如何得到这次新生，想着自己既年轻又快活，甚至奇怪为什么一时间竟忘了怀恨父亲。为了庆祝这次新生，他觉得无论如何得改一下自己的姓氏，从此就叫：尼科斯·特里安达。

第二天一早，他离开位于嘉罗顿堡的公寓进了城，独自漫步在林荫道上。春天马上就要过去，路旁一座座庭院里的樱桃树、苹果树上的花儿已经开败了，片片飘零，落在灰黑的泥地上。灰黑的泥地正等着要吞噬它们，却并不急在一时，于是，凋零地花瓣在树下片片聚集，看起来就像一朵朵大叶野茉莉。真是好一幅北国美景①，他着迷了好一阵儿。不知不觉中，他已来到柯夫斯登丹大街，凯宾斯基饭店的大招牌就在眼前了。他已约好与妹妹在这儿吃午饭。

他四周的人们都在讲德语，他惊异地发现这些人的说话声是那么耳熟，简直和反纳粹影片中那些大腹便便的纳粹们在密谋时的情形一模一样，从肥腻的喉咙中挤出乱哄哄的怪

① 西柏林位于贝鲁特以北。

腔怪调。尼科斯知道过不多久自己也会发出那样的怪腔怪调了。他风趣地想：对于我们利凡特人来说，学一门新语言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无论如何，德语毕竟总会引起许多人的警惕。而尼科斯后来却无法适应，于是决定永远离开北欧，踏上漫漫的南行之路，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回家”。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时，他漫步在春意盎然的柏林街头，陶醉在平生初享的自由之中，感到无比自豪——这份自由简直值得夸耀一番，这是反叛的成果，一切都如此顺利，简直太棒了、太快了！

在饭店里，他妹妹和一对年轻男女一起走上阳台。那位男士是他妹妹的情人，一个广告代理公司的老板，又是他妹妹所在的那个餐厅的合作伙伴。那位年轻小姐便是他妹妹的情人的妹妹。

尼科斯的妹妹把他介绍给这两个人，然后说她可以权当翻译。她跟尼科斯讲希腊语，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了。

尼科斯告诉他妹妹说这个德国女孩模样像头母猪；尽管眼珠是蓝色的，可看着更像一双牛眼睛；一头枯发就像夹杂在一罐腌黄瓜里的枯草！

“他正夸赞你妹妹很漂亮呢！”他妹妹告诉自己的情人，又用希腊语对尼科斯说：“你一定会惊奇地发现这头母猪在床上是多能干！”

“这一点是不是从她哥哥身上推断出来的呢？”尼科斯用希腊语问道。

他妹妹在他脸上狠狠掐了一把，然后对另两人说她哥哥刚说的话翻译不过来，因为他是从东方来的，不开化，他们

只能原谅他。当他们三人继续用德语交谈时，尼科斯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便用英语说道："我突然想到我们毕竟还是有一门共同语言的，不是吗？"

发现了这一点大家都很高兴，接着他们便开始谈论商务。尼科斯了解到妹妹已签约，要在好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举行巡回演出，正开始她崭新的前程似锦的舞台生涯。他妹妹的情人建议说或许尼科斯可以同行做伴奏。对此尼科斯答道他还是想呆在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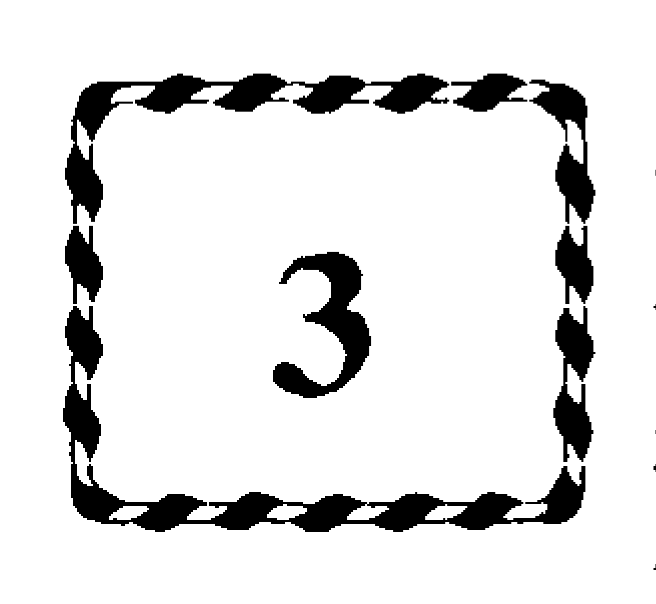
"他想上大学，"他妹妹补充说。

"太棒啦！"经理情人的妹妹夸道。

"为什么要上大学？"经理情人问。

尼科斯注视着这德国女孩丰满的胸脯，对于这个年纪的女孩来说，她的胸脯未免太大了；他又打量着她的一双蓝眼睛，无疑定是德国诗人曾吟咏的格雷琴的那双眼睛；她的白皮肤上布满了粉红色的斑块，看起来像被人打了一顿似的。他真希望这顿饭赶快结束。

尼科斯眼光扫过在座各位的脸，一边对妹妹笑笑，一边在想：天哪，她多像父亲呀！他们父女俩人怎么会合不来呢？



从三月底到九月初，尼科斯一直致力于学德语，极少出门。一早儿起来，他就开始忙碌，学语法，做练习，给自己出测验题，还给自己打分，看着自己取得了很大进步，便自得其乐。七月份的时候，他能答对九成。到了八月，那些自测卷子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满分了。

白天，他没看过城市景色，倒是每晚有两次这样的闲

暇——每晚九点半时他要去餐厅上班，口里嚼着加芥末的黑啤酒渥斯特香肠，在拥挤的街道上艰难穿行；凌晨两点时，他又大步流星地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往回赶，渴望着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沉湎于昔日时光，神游地中海温暖的海滨沙滩。

直到那年秋天他到自由大学报到，并为自己找到一位古代历史学的博士生导师时，他才开始重新观察起这个他不得不面对的新世界。每天他都会站在学校图书馆的四层，极目远眺着远处地平线上成排的树林，默默地看着萧瑟的秋意在树梢丛中蔓延开来，吞去茂密的绿叶，只剩下孤零零的枝丫。透过稀疏的枝梢，便可以看见东欧那灰暗的山山水水了。他知道那地平线下的某个地方便是波兰，还有俄罗斯，还有便是无边无际的斯拉夫民族聚居的国家。尼科斯总爱打开窗，深深吸一口从东方飘来的凉凉的空气，相信自己能嗅出从遥远的烟囱飘过来的缕缕炊烟味。他忽然听到一阵生命的嗫嚅，是那么陌生，那么诱人，又那么令人不安。几个月来，日复一日，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亮，开始时只是在他耳边悄声细语，到后来简直是朝着他呐喊、呼唤，要将他连根拔起，带他离开这个地方。

有几个德国同学，他现在已经和她们很亲密了。但她们并不像妹妹说的那样，她们在床上并不见得如何能干、出色。她们没有一丝一毫贝鲁特少女的羞怯和内心的激情，也没有贝鲁特的那种代代相承的虔诚而纯粹的宗教信仰，以及令人怜爱的性畏怯和传统古朴的价值观，因此根本没有那种私定终身时神秘而热切的情趣，或是偷食禁果时的甜密。这些德国女孩的粗俗、例行公事般的亲近让他觉得十分扫兴，

因为她们显出一副不加掩饰、随时待命的饥渴，这使他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征服的快乐和武士之勇。每晚完事后，他竟感到奇怪，她们为什么不干脆标出价码呢？

一个深冬的一天正午时分，他正从学校往住处走，突然一股狂飚袭向这座城市。好一阵恐怖的咆哮怒吼，持续了两三秒钟，袭向措手不及的行人。只见树木被连根拔起，标语牌满天乱飞，人行道上的人们被刮得东跌西撞，市政垃圾筒和破碎的报纸架就像落叶一样在空中狂舞。尼科斯被卷起来摔向一堵墙，幸好那堵墙上有一扇门，他奋力抓住门环才免于被甩向地面。他手上的皮肤剥裂开来，肩上也受了伤，但万幸没被刮上天去。

一切很快又平息下来，恢复正常。晚间电台报道说整个北欧有几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在房间里，尼科斯自己包扎了伤口，冲了一杯热饮，然后拿起一本书就躺到床上。他一想到自己在这遥远的国度险些一命呜呼而竟能得以幸免，脸上就不禁溢出笑容。可遥远对何而言呢？他又自问。远离了什么东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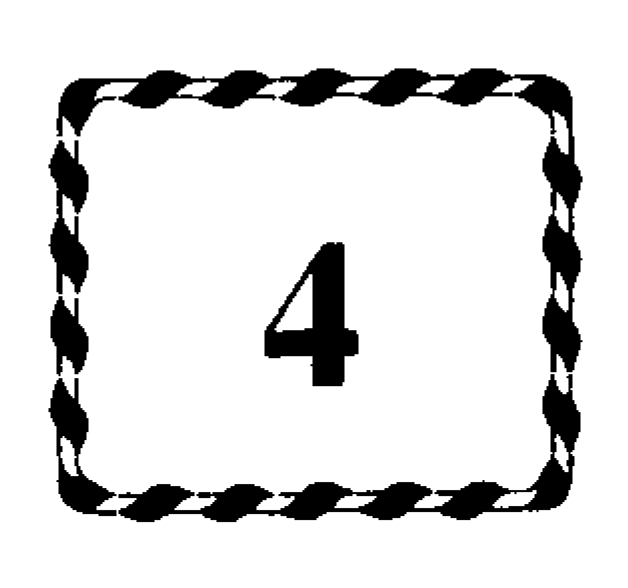
夏日灼热的阳光尽情地照耀着童年时居住的那座城市的海堤，似乎熔化了跃动的空气。空气中充斥着浮躁的喧嚣，那是街上成千的小贩们的叫卖吆喝声、咖啡馆里不知多少台录音机发出的嘈杂声，还有数不清的人放声高唱时拥挤、紊乱而极不和谐的喧闹声。小咖啡杯中豆蔻的清香、水烟筒噗噜噗噜地散发出的烟雾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马上又被油光光的烤乳羊在火炭上翻转、嗞嗞作响时飘散出的浓香盖得一干二净。又饥又渴的人们大口大口地喝着罗旺果茶，喉结一上一下滑动着；盛茶的器皿是汉志出产的黄铜色平底玻璃杯，

上面刻着银白色的圣诗字句：“别无真主，惟有阿拉。”邻里那些犹太小伙伴们在用拉迪诺语喊他的名字，催他快点到海边去。他冲出房门，大家一起在窄小而无一丝阴凉的街道上跑呀跑，像一群放出笼的小精灵一样手拉手，排成一排。大家纷纷把凉鞋挂在肩上，一起朝暖暖的、蓝蓝的海水冲过去。这一群小家伙，在热辣辣的太阳下脱得精光，在烈日炎炎中叽叽喳喳地拌嘴；也有的连衣服都不脱就跳进水里；有的用手从岩缝中捧起一捧小虾，又扯起海草你丢我、我丢你，海草中的豆荚剥裂开来，散发出咸盐的气味；还有的在倾听着海浪汹涌的撞击声，然后又快活地仰面潜入浅水中。

是夜，晚餐过后，躺在床上（是在亚历山大？还是在贝鲁特？反正都一样），父亲跟朋友一起上夜总会去了，只剩下三个人——母亲、妹妹和他自己。他总是听妹妹唱歌，一首关于爱与死的希腊歌，没完没了的吟唱由没完没了的反复句构成，其中完美地融合了犹太的康提来森曲调、西班牙的佛来哥曼舞曲、那不勒斯民歌和她记忆中的古希腊悲剧里轻柔的合唱片断。他后来知道（其实当时已经知道了）这些歌曲正风靡于整个地中海地区。这些歌曲其实发源于那些描写腓尼基水手的民歌。这些先民在数千年前曾扬帆张桨，从这儿轰轰烈烈地启程去闯荡、去远航。而几千年后，在这同一片海滩上已难觅古风，惟有滚滚浪花一如既往地拍打着他们凭海的花园，真可谓星转斗移，千年沧桑。犹太人、希腊人、穆斯林、基督徒，总是在分分合合中一会儿互相屠戮，一会儿又和睦修好，陆陆续续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一切因果冤业因循不息，他们走了，又回来，每每带来毁灭的喧嚣和战火纷飞的烈焰，伴着惊恐万状的亡命的人群，还有母亲

们失去骨肉后悲痛彻骨的号啕与悲泣。而接着一切又归于漫长的死寂，仿佛这一切都是从地狱中偷偷爬出来，然后又倏地全都又缩了回去，只留下死牛死羊的焦糊味、留声机的哀唱和一曲曲冗长、疲惫而绝望的悲歌。

这个希腊少年正躺在北欧东界的某个角落里，耳旁萦绕飘荡着那些语言学家——泰尔、西登、陶劳斯、陶伦、马修斯和卡萨其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当他回想起童年时的灿烂阳光时，他闭上双眼向神灵祈求，祈求把那些先民遗裔的少女的精魂召唤到他跟前来，这样的少女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啊！我的好妹妹，我的新娘，你在哪儿？你现在一定就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正站在你的窗边，默不作声地鄙视那些新民族中泛滥的软弱无能，望穿秋水地在等我。你长得什么模样？你的声音是怎样的？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你的眼睛一定不是蓝色的，蓝眼睛的是母鹿，你不是，你的肌肤是那么白皙圣洁；你的头发不会是乱麻般的浅黄色，而一定是如大马士革出产的铜那般晶莹的古铜色。亲爱的，别从你的房间走开，因为我就来了，我已经在半路上了。



在柏林读了一年大学后，他得到了一笔助学金，然后辞去餐厅里的工作，去了意大利。在罗马他呆了约一年，继续写他的论文；然后又到了雅典，在那儿完成了论文。他把论文提交到柏林，不久便获得博士学位。

尼科斯回到柏林一看见他妹妹，就发现她异常激动。她刚收到父亲送来的一枚钻戒和一张法语写的纸条：Chapeau,

ma petite（佩服你，我的小女儿）她热泪盈眶，把戒指给他看。

“我想你最好回赠一句话，”尼科斯说，“就这么写：Je ténmerde，papa（我讨厌你，爸爸）。”

然而这位举世闻名的歌星（这时她的艺名为克里斯蒂娜·瓦茜拉蒂丝）告诉他说那个老顽固是头蠢驴。那天，她找到一家珠宝行，作价卖掉了那只戒指。

尼科斯又回到巴黎，偷偷见了母亲一面，告诉母亲说他很快还会回来。从巴黎出发，他又开始了漫长的飘泊，先到北非重游了童年时呆的地方——亚历山大，然后经塞浦路斯到了以色列，拿着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一位希腊牧师，在他家呆了几天。这牧师是尼科斯母亲的亲戚，住在耶路撒冷的老城。

到傍晚，尼科斯外出逛游回来后，便坐下来同那个牧师一起吃饭，听他反复唠叨犹太人对阿拉伯人是多么残忍，必须马上推翻犹太复国运动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政权；又说所有基督信徒，尤其是希腊人，都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应该投身到这场神圣的反抗运动中去。尼科斯总是静静地恭听，但心里却十分厌烦。

在他打算返回欧洲的前一天，有两个陌生人来到他在特拉维夫住的旅店房间，要他跟他们走一趟。他们保证说这只是个手续问题，一定可以让他当天就自由离开。

他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在一张书桌后坐着一个男子，戴着墨镜，下巴和上唇都粘着假胡须。尼科斯真想发笑，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举止最好礼貌些，可以少些麻烦。那男子让尼科斯和他面对面坐下，他的开场白令尼科斯着实吃了一

惊：

“先生，您的眼光很准。我戴着墨镜，粘着胡须，的确像剧场里的滑稽演员一样。可无论如何，您最好严肃回答我的问话。”

“谢谢你的坦率，”尼科斯说。

“这可不是坦率，”那男子说，“只不过是一条简单的安全须知，虽然不免过于粗鲁。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您什么时候来以色列的？”那男子递还护照后继续发问。他的声音低沉而悦耳，听起来像是有些疲乏；他看上去身材匀称，肌肉发达，强壮剽悍，而且全身轻松自如。从他说的英语来看，他的英语完全合乎语法，选词谨慎、准确，而且十分口语化。尼科斯尽力揣度，断定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尼科斯同时也清楚，如果自己说是像绝大多数观光客一样只是为了到圣地来朝拜的话，他的讯问官是绝不会罢休的，所以必须谨慎而完满地解释来以色列的原因。

他讲述了他感兴趣的领域，他的大学学习，还有想到欧洲某所大学里任教的愿望。他说以色列是他环地中海之行的必经一站，因为他正致力于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复兴，而且在寻找足够的迹象来证明，这种复兴已经叩响了历史的大门。

“例如？”讯问官问道。

“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你们这儿的饭馆里，用橄榄油混上腐殖物或是扁豆，用火炭烤乳羊，用葡萄叶卷米饭和肉。所有这些，我都曾在雅典、亚历山大、利马索、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见过。而且据我所知，在大马士革、康斯坦丁堡、突尼斯照样可以看见这些东西。我说的还算清楚吧？”

"很棒。还有呢?"

"于是我明白了我并不只是从希腊分离出的一个小民族的一员，而是像一棵古老的苍天大树结出的满树硕果中的一颗，我并不孤单。那棵古树在久久的沉寂后终于又萌发出文明的新芽。"

"很棒。那么请问，您刚才说的这些和您在耶路撒冷时与那位牧师呆在一起时的种种活动又有什么联系呢?"

"活动? 什么活动?"尼科斯十分惊骇，但马上就猜到他母亲那个亲戚一定在实践他所鼓吹宣扬的那些东西。最后他终于醒悟为什么自己会被带到这儿来了。他深吸了口气便笑了起来。

"那牧师只是个远亲，我猜你们一定在怀疑他。对此我很遗憾。可我自己无法解释清楚这件事。我只能尽力忘却那方面的不幸。那和我没有任何干系。"

"他曾想说动您下水，而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可他没能说动我。不过他的确曾谈到阿拉伯人的不幸。我说的可全是真话。"

"还有呢?"

"没有了。"

"如果您以为我会就此罢休的话，那么您只是在给您的朋友添麻烦。我们现在不能对您怎么样，因为您是外国人，我们也还没有足够证据指控您。但我们可以给他点颜色看看。如果您早些跟我们说实话，我们或许可以把他引渡回希腊。但既然您如此执迷不悟，他就只好吃些苦头了。您可以帮他一把的。告诉我们他都说了哪些我们想听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再拘禁他了，他就可以被引渡回他的祖国去。一切就

这么简单。”

尼科斯脚下的陷阱竟是如此粗陋直白，但如果他真的知道些什么的话，恐怕早已被诱逼得全都说了出来。现在他得硬着头皮向这位讯问官表白说，其实他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话可提供。

“我平生第一回与他打交道，”他说，“而这也只是因为我要去耶路撒冷。很可能我这辈子再也碰不上他。我甚至不清楚我和他是怎样连成亲戚的。你这般威吓我，就好像他是我父兄一样。其实就算他真是我父亲或兄弟，我也还是无法让你满意。我压根就没有任何你所想知道的东西！”

讯问官叹了口气，然后微笑着站起身。尼科斯马上也站了起来。但令他吃惊的是虽然这番讯问终于结束，自己却并不觉得很高兴。他觉得还想多呆一会儿呢。尼科斯注视着那副墨镜，觉得镜片后藏着的那一双眼睛也正凝视着他，而且觉得就算自己从这位置上挪开，那双眼睛也还会继续盯着老地方，就好像要把他逼迫得一动不动。他全身上下好一阵莫名的颤抖——既不是厌烦，也不是恐惧。

这个陌生人伸出手来和尼科斯告别。他握着尼科斯的手说：“我们这次会面的所有谈话内容都属于绝对机密。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多余的。如果给您添了麻烦，我深表歉意，请您别生气。干我们这行可真是不容易，一切并不总是很顺利。无论如何，请接受我的歉意。您谈起的地中海的话题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之间要是能够卸下伪装坦诚地谈一谈，那一定会融洽得多。不过鬼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机缘。很高兴认识您，很抱歉在这儿以这种方式与您交谈。以后若有缘再相逢，我一定能认出您来，或许到那时我们会有机会

再聊……对了，您在这儿的最后一晚打算怎么过？”

“我要去听音乐会。”

“哪一场？”

“莫扎特四重奏。”

“噢，我知道了。对了，祝您玩得开心，同时再次致歉！”

这时讯问官才松开尼科斯的手，送他走到门口。

尼科斯走出来，心下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失之交臂。

受害者竟迷上了谋杀犯，甚至还爱上了他，尼科斯心里想道。忽然又记起希腊悲剧《奥瑞斯提亚》中的诗句，很懊悔刚才竟忘了把这些诗句背诵给那位讯问官听听。



他流浪的热情丝毫不减。又是十二年过去了，他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从这个城市飘泊到另一个城市，偶尔也在某个地方呆上一两年当教师，然后又开始飘泊。他母亲没见他最后一面就死了。几年后他又得知父亲的死讯。他时不时总能在报纸上读到关于他妹妹的报道。兄妹二人已通过信件协商好，由律师安排分了父母的遗产。他请了一年的长假，在爱克斯·普鲁旺斯租了套房子，然后着手写一本书。他买了台钢琴，但很快就发现琴弹得再也没有以前那般得心应手。但无论如何，他坚持每天都弹。长假期满后，他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并在他的每一处住所里都添置了一架钢琴。

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向世人阐述了地中海民族复兴的

观点。但这本书在学术圈里没什么反响。评论这本书的短评说这“算不上什么严谨的学术思想，只不过是一番浪漫主义的梦幻罢了，难登大雅之堂。”

当他三十八岁时，他在马德里获得了一个讲师职位。那一年，他应邀到南英格兰的一个省会城市去参加一个系列研讨会。在工作人员室里，他看见了一位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小姐。

“啊，不正是她吗?”他暗想着，心里竟止不住狂跳起来。他顿时变得神情恍惚，甚至也顾不上什么礼仪规矩，不假思索便向身旁一位男士打听那位女士是已婚还是独身。那位英国绅士对这样一个浪荡不羁的南方人的莽撞举动颇感吃惊，不过还是回答了他，并且表示愿意代为引见。当尼科斯终于握住了那双令他魂牵梦绕的人儿的那双手时，他感到自己脸上洋溢着傻笑，嘴唇微微颤动，连一双脚竟也不住地发抖。上帝啊，他心里暗想，真的就是她！是谁这么精明竟把她的名字叫做希娅呢？她还可能叫别的名字吗？

这时，希娅的脸色刷地变得惨白，然后找了个托辞匆匆离开众人出了房门。此情使尼科斯觉得惊诧，同时几乎捺不住要高兴得叫出声来。

“你把她搞糊涂了，”那位绅士对尼科斯说，“你并不是总能看到这么美的人儿的。”

“你会后悔把我邀到这儿来的，”尼科斯只是喃喃自语，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因为除非你把我连同那些西班牙文学的讲座一起撤掉，否则你就无法摆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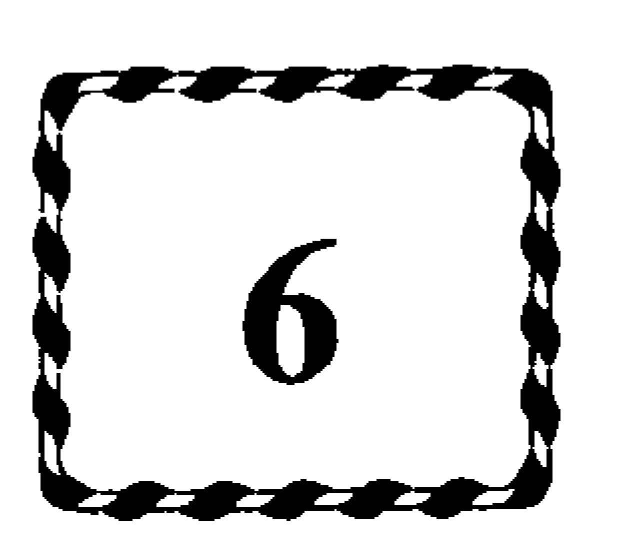
在场没有人对他的这一段拉丁语的自言自语表示惊异。他的举动正该是这样的，因为这才符合英国人心目中环地中

海利凡特人的形象。

晚饭过后，在高级公共休息室里，当尼科斯作研讨会首场发言演讲时，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那张脸。那个晚上，他再一次认定就是她，一点儿不差。

演讲完毕，希娅邀请他到她房间去。尼科斯开始时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她也把他当成了令她魂牵梦绕的那一位。但当她接连向他质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你是个特工吗？是不是有人朝你开了两枪？你脸上是不是做过整容手术？你懂法朗兹·卡夫卡吗?”）时，他并没有以为她出了什么毛病，而是意识到她把他错认成了别人，而或许那个人才是她的梦中情人，正如她是自己的梦中情人。这样看来，他从一开始便没指望了。最后，她甚至还逼着他坐到钢琴边，要他弹支曲子。他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他弹得真是十分生涩，尽管所弹的小曲在技术上并不太难，但他弹得太差了，简直让人觉得丢面子。

在离开她房间时，他征得了她的允许，每天都来看她。



他们后来的相会再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希娅再也没有提特工和枪击的事。尼科斯给她讲亚历山大的故事，还给她唱阿拉伯歌曲，总是把她逗得乐不可支。有一天，他从菜市上买回了豆子、羊羔肉和调味品，在她的小厨房里忙乎着做所谓的“地中海菜”。其实在英格兰，到处都有各种东方风味的饭馆，所以尼科斯的“地中海菜”在菜式上也翻不出新花样，但他仍充分显示了高超的手艺。于是她让他每周末都披挂下厨，这样在她和所有的朋友聚会

时，大家就可以尽情享用丰盛的美味佳肴了。

在享用完那些饭菜后，尼科斯就坐到钢琴边，然后整个房间便回荡起悠扬的旋律。那都是在柏林时他和他妹妹排练的一些常备曲目。另外他还凭借童年时在贝鲁特、亚历山大留下的记忆弹奏些小曲。当众人得知他就是那位巨星克里斯蒂娜·瓦茜拉蒂丝的哥哥时，他们简直高兴坏了。有个人甚至还带来了他收藏的一张她的唱片。尼科斯静静地听着她在歌里对歌迷们的欺骗——她只不过是把童年时的一些歌曲剥去其原有的灵魂，然后将歌谱改成西化的旋律罢了。他尽力想向屋子里的人们解释清楚这一点，但马上意识到，如果要让人们理解他所谈论的这一整件事，他就不得不从头讲起。好几个晚上他都曾千方百计解释地中海那越来越璀璨的光芒，但他从他们眼神中却读出了他以前在那篇书评里看到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具有拉丁式浪漫情怀的狂人，一个南方佬，一个分析能力残缺不全，满脑子尽是些令人腻烦的东方式的多愁善感的人。

希娅觉察到他的沮丧。当两人独处时，她觉得应该安慰安慰他，但别无他法，只能傻傻地告诉他，在她基督徒的血脉中除了混着其他复杂的血统外，其实也有犹太的血脉——那些在十七世纪从西班牙被驱逐到英格兰来的犹太人。她说至少在她父亲身上是这样的，这就意味着她比一般人更能理解他的思想，虽然只是模模糊糊地靠单纯猜测来理解。

她所始料不及的是，她正好给了尼科斯最重要的认同和他所曾渴盼的最好的慰藉。他伸出手去，轻轻地抓起她的手，亲了一下，然后把那双温柔的小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这是他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如此亲近。他喃喃地向她致谢，就

像病人对神医一般感激至深。

“为什么要谢我呢?”希娅说，“你也疯了吗? 上帝啊，为什么尽让我结识些疯子?”

那一天，她对他极概略含糊地说出了她八年来不间断地收到一个匿名人来信的事情。那人无疑像个疯子，但也算得上是个十分迷人、聪明过人的疯子。“他十分英俊,”她又补了一句，骄傲之情溢于言表，“真的很英俊。”

“那回你一定是把我错认成他了吧,”尼科斯说，满脸的气馁和失望，就像一个小孩在期盼得到礼物时却挨了一顿惩罚。

“你没必要为此难过的,”希娅看到他脸上一副绝望的苦相时不禁莞尔一笑，“我以前不也说过他很英俊吗?”

尼科斯转过身，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她书桌上摆着的那个匿名人的照片，就是他第一次到她房间时曾见过的那张照片。看来，一切正如原先所料，希娅已经心有所属。这时他又看着照片说：“我和他一点儿也不相像。希娅，你怎会以为他像我呢?”

“这件事很复杂,”希娅说。

“可你并不复杂,”尼科斯几乎嚷着说，“希娅，你就像一尊女神一样圣洁而清纯! 你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希娅只答应说过两天或许会再告诉他点儿别的。

研讨会结束后，尼科斯写了一封信回马德里，告诉校方说他打算暂时推迟归期。他在希娅的那所大学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告诉希娅他不会搬往别处。

每逢周六他们就开着她的车一起去兜风，而在平日她要呆在房间里忙着备课，每逢周日傍晚，又要忙着给那帮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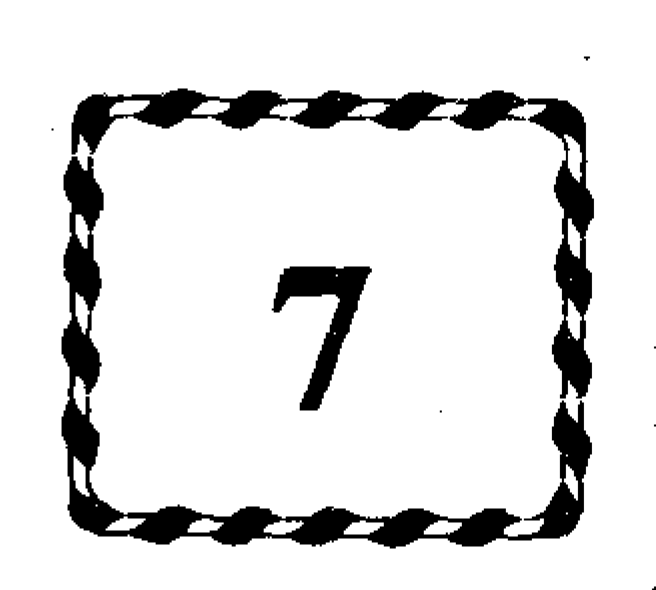
准备“地中海菜”。这些人高兴地发现尼科斯总算是死了心，不再念叨什么地中海的复兴。不过，他们还是很乐意听他那些动人的歌曲，有希腊的、阿拉伯的、西班牙的，还有那不勒斯的。

暑假临近了，尼科斯问希娅是否想跟他一起南游——他管这叫“回家”。他坚持说从她的血缘来看，她本应属他那个民族。他说：“我要把北国温室里的这株樱草移植回她故乡的田野里去，栽到黎巴嫩的山坡上去。”

“可要是这株樱草不想，你又能怎样？还有，要是她也想把你移植过来，又会怎样呢？”希娅一边说着一边伸出舌头冲他扮了个鬼脸。

“如果你还这么固执的话，”尼科斯模仿着她的腔调，“我可要独自走开，让你饱受相思之苦，你可就惨了！”

希娅又伸了伸舌头。心花怒放的尼科斯觉得自己在这梦幻般美妙的世界里是那么傻，那么犹豫。他觉得不应该就这么错过幸福与美丽。他一把把她揽入怀中，狂热地亲吻着那张秀丽的脸庞。



他们并没有启程南行，而是约定一起去伦敦，回她父母家，因为她曾答应双亲说在暑假里会回家看望他们的。她还劝他说，过两个星期他该回马德里一趟，去和他学校的头头儿们解释解释，联络一下，免得被解聘；之后他们便可以把自己的事情整出些头绪来。他们把整个暑假都安排了一遍。

在按计划呆在省城的那几天里，希娅把那个匿名特工的

事详尽地告诉了他，当然还有她与基·阿定婚的事。

后来，她干脆决定把所有那些信件都给他看。她想过了，如果他看完那些信后便不再理会她的话，就正应了长痛不如短痛的古训；如果他会下定决心和她长相厮守的话，他起码应该知道俩人现在的处境，而不是相互遮遮掩掩。这一举动决不仅是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和表现她的坦诚，而是对将来种种不测的预防——这实在是一种为前途而投的特殊保险。

希娅交给尼科斯一只大箱子，满满装着四百多封信，全都是打字机打出来的，没有署名，也不附回邮地址，只在每封信的开头注着写信日期。堆在箱子里的是一千多页信纸，那么死寂，溢出无尽的诡异。尼科斯紧张地看着这样一只大箱子，觉得要是不读完每一封信中的每一句每一字，他是不愿眨一下眼睛的。当他扛着箱子回自己的房间时，一种恐惧笼罩着全身，仿佛扛着的是一具僵尸，或是一颗炸弹；这枚暗藏在棺柩中的炸弹，在顷刻间便能毁尽他至珍至爱的东西。他头脑中已开始飞速旋转，拼命搜集着那些特工传奇中一丝一缕的情境。

当他开始读第一封信时读到这样的句子："……因此我深爱我所效命的国家，她那绵延的群峰，幽深的山谷，她的尘雾弥漫和愁苦绝望……"他闭上眼，心想到，这样的"群峰"、"山谷"和尘雾、绝望，倒挺像是巴勒斯坦——就是现在叫以色列的那个国家，十二年前他正是在那儿被人传讯，受一名特工或什么人的审讯。

他的神思奇想使他很快就理解了这些信是如何笼罩着希娅的生活的，理解了她读着这些信时该是多么热切地期盼着

让这一切变成永恒的现实。他心中一片狂乱，胡思乱想，甚至自信能想象出希娅的心被俘虏的那一时那一刻。从那儿起，他开始在头脑中猜想着希娅可能写的一封封回信。而他以希娅的名义设想出的一封封回信，甚至比那个专横、无形的痴人所说的甜言蜜语更令他痛楚。

整个晚上和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读那些信。第二天傍晚，他把那些信都放回箱子里，然后到学校去。这回他感到怀里抱的不再是僵尸，也不再是暗藏炸弹的棺柩，而是一纸不得上诉的终审判决。

从这些信以及他狂乱玄想中的那些回信中，尼科斯体会到没有人能够取代这些信中的幽灵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要是匿名人现出血肉之躯以真面目示人的话，尼科斯或许能击败他，希娅自己也或许会鄙弃他。但没有人能抹去时间和文字编织成的幽魂幻象，就像没人能摧毁尼科斯自己做的地中海的复兴梦一样。现实无法驱散梦幻，有血有肉的活人也无法战胜无形无影的幽灵。可怜的基·阿就曾尝试过，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卷入这样的一场较量中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尼科斯想，他应该做好一切准备。到后来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为希娅而死，比让她活在那个幽灵的日夜纠缠折磨中，会好得多，容易得多，他心底默默地说。

近半年来，那人没有再写信来，只言片语都没有。尼科斯心想：或许他已被人枪杀？或是正躲在某个角落里深思熟虑？或是在紧紧地跟踪着我们？

对希娅，他毫不隐瞒心中的想法。之后俩人面对面，久久静静地端坐良久，谁也不说一句话，任凭夜幕笼罩，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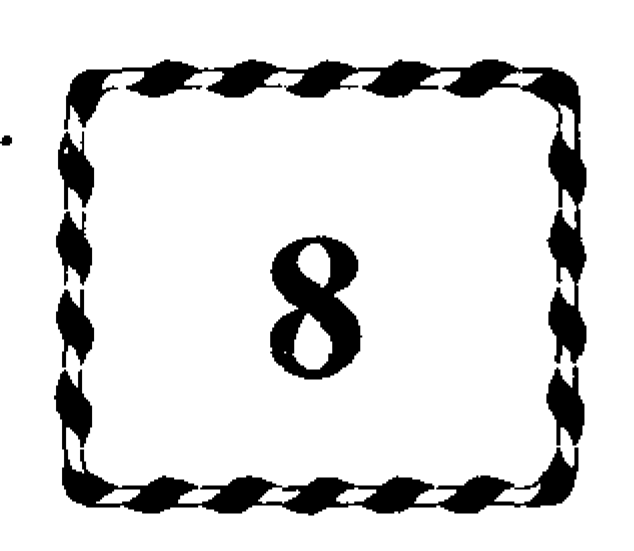
里变得漆黑一片。

“你饿了吗?”希娅终于轻轻地问了一句。

尼科斯从椅子上站起来，把希娅挽到沙发上，然后两人合衣而卧，在黑暗中紧紧地相拥。一切都是那么静谧。

“把手放在我脸上,”尼科斯说，“两只手，希娅，我亲爱的。”

在她怀中，他很快就睡着了。她听着他一呼一吸的气息声，喃喃自语道：“耶稣基督，仁慈的主啊，请别把他也杀了……也许你并不想让我死，可要是你杀了他，那我也不活了……给我点启示吧……请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可以让他一个人呆着，我可以让他永远地走开，让他回家去……给我个暗示吧，我的上帝。”



很久以前，上帝的确曾启示人类，但只启示那些先知，而不是启示单纯的少女，就算她们在爱人眼里就像女神一样清纯而圣洁。女神般清纯的少女所遵从的启示，便是她们血脉幽深处漫溢出的青春朝气。青春年华让她们欢心雀跃，但无情的岁月沧桑终究要让她们人老珠黄。

“Olé, torero!（嘿，太棒了）”希娅总是对着古希腊斗士般的尼科斯窃窃私语道。现在他们已经陷入迷茫，在省城的几天中，完全迷失在这趟没有结局的爱情苦旅中。尼科斯不同于那个抑郁的少年——那个死去的基·阿。基·阿的大丈夫气概在伊顿公学时就已消失殆尽，只是在牛津大学时才多少恢复了几分自信，而连这也只是为了继承父业聚敛财富，

为了要凭残存的魄力运用于政界、做个保守党内阁部长什么的。而尼科斯的确是个很棒的男人，一个直率的人，略带几分狂野则更显示出他的刚毅。如果一个女孩子为地中海民族复兴而激动不已，她又怎会去在乎那份狂野？如果这就是复兴二字的全部意义所在，那么该欢呼复兴万岁！

几夜来希娅曾问过一次："你也会出于对我的爱而去杀人吗？"

尼科斯咬了咬嘴唇，说他首先会杀了她，马上又接着说："然后就杀了我自己。"

"除此外你一定还想杀死你的情敌，是吧？"希娅猜测道。

尼科斯心想：这样看来，她已站在那个幽灵的一边，在这个幽灵的作祟下，连她也开始鄙弃我了。但他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一起来到伦敦，希娅的父母在家为尼科斯准备了一间客房，又邀请他在去马德里之前和他们一起多住些日子。

以前在晚上，希娅芬芳温馨的体香总是让尼科斯心猿意马，而现在俩人分开住了，他住在她父亲的客房里，她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此时，尼科斯又陷入沉思之中，想着那些匿名信、那个匿名人，还有希娅的"回信"。接着又开始以她的名义臆想着那些回信中的字句。他写的回信文思流畅，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晚上，在另一间房子里，希娅也正想着那个特工，心中的痛楚不断加剧，远甚于从前。如果你还活着，她要对他说，就来吧，你迟早得来到我身边；如果你已死了，也该给

我个暗示，你不能就这样折磨我。

但特工和上帝一样只给他们的心腹以启示，同时，他们都很残忍，有时也很抑郁。但无论如何，他们始终都是一言不发。

到伦敦后的第三天傍晚，希娅、她父母还有尼科斯都坐在起居室里喝着茶。在北国，夏夜总是姗姗迟来。临街的窗子开着，楼底下街道上人流车流熙熙攘攘，正是下班高峰期，人们正急着往家里赶。

车辆行人拥挤忙碌的嘈杂声中突然惊起一声枪响，紧接着便是第二枪。四个人听到急刹车声，还有从街面上传来的尖叫声，过了不久又听到警车的警笛声。

他们赶紧放下茶杯，站起身来朝窗外望去。

在街对面那家咖啡屋门口站着两个警察，他们正尽力拦住涌动的人流，不准人们进入店门，另有两名警察走了进去。一辆救护车好不容易才挤过人群停在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司机和他的助手，俩人抬了一副担架也进了咖啡屋。很快他们就抬出了一具用毯子遮掩着的尸体。

希娅全身都剧烈地狂抖起来，竟因此而卧床不起。她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家人只好请来一位医生，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她这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她还是不想出房间，而且说什么也不让人进去看她，只让他们把晨报拿到她床上去。

尼科斯也买了份报纸，报上登着一个男子的照片，唇上和颌下都有胡须。尼科斯一眼就认出他来。为了确认一下，他抓起一支铅笔，在那双眼睛的眼眶上画了两个黑圈，就像墨镜一样，然后又久久地审视着那张照片。这回可是确凿无

疑了。

希娅病了好一段时间，高烧不退，神志不清，但最后还是恢复过来了。尼科斯推迟了回马德里的归程，与她一家人又多呆了一周。她父母相信他在希娅身边或许可以使她更快康复。

她下床的第一天就和尼科斯一起出去散步了。他们在附近一座公园里散步，然后在煦暖的阳光下静静地坐在公园长椅上。过了一会儿，希娅说有点儿冷，两个人便起身回家。

他们走过当地药店时，希娅进去买了些药。当她走出来时，她挽着尼科斯的手臂，微笑着说："现在该回家了。我好累，该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一回到家，尼科斯就跟着她上了楼，来到她房间。他关上门，然后转过身朝着她，身体倚着墙，柔声说："希娅，我不想活在一个没有你的世界里。把那些药片给我。"他朝她上衣口袋努了努嘴："快给我，希娅。"

她虚弱地一笑，就像撒了谎的小女孩被戳穿时挨了责备一样，掏出药包，递给他。他抓过药包，一把塞进自己的口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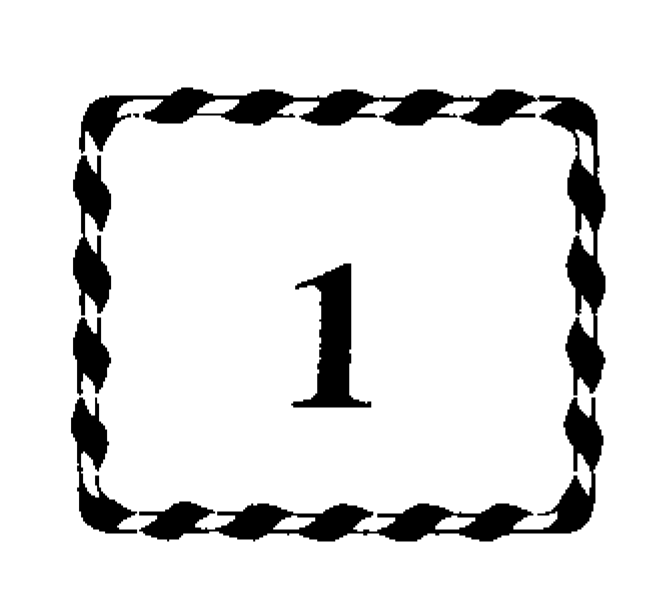
"我会再买的。"她嗫嚅着。

"希娅，已死了两个人难道还不够吗？一定要变成四个人吗？"

她猛地扑到他怀里，伏在他胸口抽泣不止。尼科斯右手爱抚着她的秀发，左手扶着她，使她不至于瘫倒，他就这么紧紧地、紧紧地拥抱着她。等到她的抽泣渐渐平息下来，他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给她盖上毯子。然后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床边，静静地注视着那张美丽而凄婉的脸。

第二天他离开伦敦去了马德里。他答应她说，到她叫他再来伦敦时他才会再来。但他坚持说要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当天晚上，她父亲接了尼科斯的第一个电话，说希娅很好，好几个小时以前，她就已经上床睡觉去了。

第四章　亚历山大·阿浦拉莫夫



1921年冬季的一天，一个不动产代理商从特拉维夫来到海滩边平原上的南部居住区，买了六十英亩的葡萄和杏树种植园。他与那些各有打算的地主们洽谈买地事宜，那些人急于将地卖出去，这让他有些怀疑，但由于他想要买的那块地远离定居点，覆盖在一座低矮而与世隔绝的山岗上，他也就如愿以偿了。

定居点委员会想知道买主的姓名，但仅弄清这位买主是犹太人，别的就一概不得而知了。直到合同都签过以后，人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是看到一辆辆马车从南边采石场方向跑过来，在山顶上卸下分割好的建房石料。很快就搭起了大棚，到冬季快过去的时候，建筑工人们就来了，在山上破土动工。远远地，从定居点就能看到一座宽敞的建筑拔地而起，建

到了第二层，屋顶用大红的马赛克瓷砖盖顶，将整个房顶涂上一层粉红的灰泥。道路也清理出来了，从山上一直延伸到庄园的边上，路的尽头与通过定居点的那条道路连到一起。最后让农夫们大吃一惊的是，那些阿拉伯工人竟将庄园周围近四十亩的葡萄树和杏树连根拔起，树干堆成堆，然后付之一炬。建房、清路、拔树的工作持续了近六个月。翌年夏日的一天，又来了马车，满载着大木箱和家具。那天下午，一辆黑色轿车也开上了山。

车里除了司机，还坐着一位身材矮小、谢顶的男人，约摸六十岁，表情冷峻，蓄着短短的、修剪齐整的灰胡须；他的身边是一位年轻女子，身材高挑，二十来岁。这个女人已经怀有身孕。

定居点里很快就知道，这对夫妇还带来了从耶路撒冷来的阿拉伯厨师、从雅法来的阿拉伯司机，还有一个从特拉维夫来的年轻犹太女人。这个女人是雇来为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做保姆的接生婆。

夏季将逝的时节，一名男婴降生到山上的这座房子里。

一直到葡萄酒厂的经理被请到这座新房子作客后，人们才知道山上那位老人讲俄语，跟妻子却讲德语。在酒厂经理看来，那少妇看起来完全像个电影明星，反正她很美，而且身材比她那年迈的丈夫高得多。她走在房子里的神态就像是个女王，不出一点声响；为客人倒上咖啡时，又总是面带微笑。只是人们弄不清他们为什么要在巴勒斯坦的这么个定居点建幢房子，更不明白那男人既然能建起这样一座宫殿，并且能将它装点得富丽堂皇，那他一定是个大阔佬，这就更令人费解。且不说别的，酒厂经理被请了去，其实是要他讲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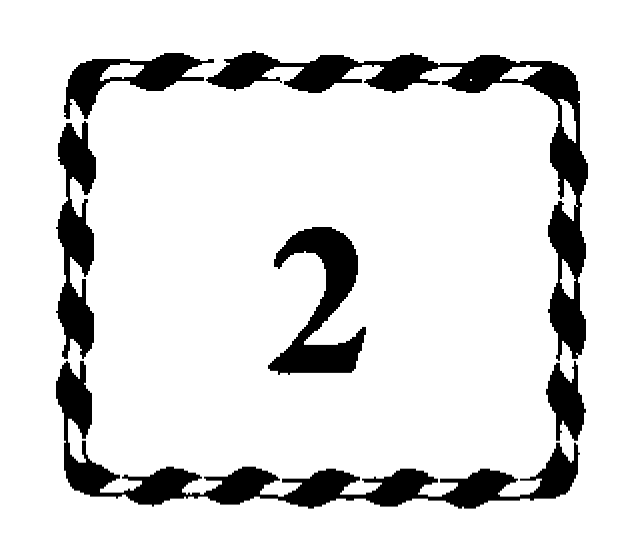
关于这里的葡萄酒业的情况、合作社成员的状况和购买化肥、劳动工具还有雇用工人的价钱。在那四十亩已被清理出的山地上，这位百万富翁开始开发经营桔园。他认为很多人都会竞相仿效的。

四年过去了，住在山上的那户人家的神秘面纱仍然没被揭开。那座大宅子现在已是四周桔树环抱，甜美的柑桔很快就要挂满枝头了，从定居点望去，人们只能看到那红红的屋顶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枝叶丛中，像一面鲜红的旗帜，从一大片浓绿的欢腾雀跃中蹿向蓝色的天空；而迎着居住区这边山坡上种的那些葡萄树和杏树，则像是防御部队的营地，将外面的世界和那座大房子断然隔开。

老人和他年轻的妻子极少抛头露面，人们只偶尔在他们乘车去特拉维夫的路上瞥见他们一眼。只有那个阿拉伯厨师几乎天天出现在定居点，买些农民自产的牛奶呀，鸡呀，蛋呀，蔬菜之类的东西。过了些时候，甚至连这个厨师也极少来了，因为那山上的庄园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养鸡场、菜园，还养了牛和羊。在东面山坡下，开了一眼井，装了发动机，远远地传出富有节奏的“突突”响声，似乎在宣告它的存在。这样一来，这位百万富翁再也用不着因为用了中央水井的水而向定居点委员会交纳什么水费了。然而，恰是这一点却加重了农户们对他的怨恨——这是人们对那种不愿与他们接触交往的人产生的一种隐约的、潜藏不露的怨恨。

有时候，那位阿拉伯司机会把一些客人载到大房子里，夜里再送他们回去。在楼上靠近房顶的窗户里，油灯总是一直亮到深夜。断断续续的音乐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好奇的人们都说从没听过这种音乐：小提琴和钢琴声混杂在一起，一

个比一个奏得更响。



阿布拉姆·亚历山德维奇·阿浦拉莫夫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木材、玉米商，在乌克兰的第聂伯河地区设有多处仓库和分店。他从小由住在家里的家庭教师教大；他学过法语，数学出类拔萃。由于他自己主动要求，又因为他母亲天天都在弹琴，他也学会了弹钢琴。尽管这通常是女孩子学的东西，他父母却并没拒绝他的请求，因为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又是他母亲的心肝宝贝儿。十几岁的时候，他在哈尔科夫理工学院学习了三年，并获得林业学位，为的是为接手家里的生意打好理论基础。他后来确实经商近二十年，但他父亲死后一年，他母亲也去世了。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像鸟儿一样伸展翅膀，飞向外面的自由世界了。那个自由世界不在俄国。他感到俄国既令人窒息又令人伤感，到处是泥泞或尘土飞扬的小路，世间的一切——马车，灵魂，还有欲望——都会不可思议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沦、沉沦，悲哀地叹息一声便从大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很久以来，他对这种生活就已充满厌倦。

他给为他生了两个女儿的俄国女人留下一笔钱，却没提一句他们的婚姻关系，只是掏出一块散发着法国香水味的上等细亚麻布手绢为她擦干泪水，又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回刚掏出来的衣兜里。

那是二十世纪的第二年，阿布拉姆·亚历山德维奇那时四十岁。他去了瑞士，将财产安排妥当，又去了巴黎。他那时仍健壮如牛；他懂得如何品尝法国菜的精致美味；有一次

还去看了场演出，四十个女郎和着掌声和乐队的欢叫声扭动着大腿。然而他觉得自己不宜久居巴黎，因为他心里仍渴望看看整个西方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在俄国的四十年使他相信，只有现在他才算真正开始生活，无怪乎他如此急切，迫不及待想看遍这个世界能向他展现的一切。他要去的下一站是德国。在德国的慕尼黑，他碰上一笔大买卖。六十辆装满火车货厢的马车在运往俄国的途中被卡住了，原因是这批货的主人因破产被当局抓了起来。阿布拉姆买下了这些货物，并将之继续送抵目的地。这件事使他意识到，在德国一周就能赚到在俄国得六个月才能赚得到的钱。西方世界就这样实现了他的全部梦想。德国看来很值得一看，特别是慕尼黑，这里可以欣赏各种精彩的音乐会、完美的歌剧，还可以和不错的音乐家联袂演奏三重奏或四重奏，他在其中演奏钢琴；他邀请这些演奏家到豪华的宾馆套间，请他们吃各种美味佳肴，又拉他们去看演出，他们也就不会再挑剔他钢琴弹的如何，甚至无论他选什么曲子，他们都乐意演奏。阿布拉姆告诉小提琴手和大提琴手，音乐甚至比生意更能给他带来快乐。他们对此当然毫不怀疑。他会少弹几个音符，甚至乱了节拍，但他弹得情绪激昂，脸颊通红，满头汗水直淌。演奏家们都说，他以前没好好练习实为憾事，如果他当初对音乐投入更多精力，他现在该是一位大钢琴家了。阿布拉姆对这番话深信不疑，但他对自己的基本功已经相当满意了，他不想一生从事音乐，只求音乐不被排斥出他的生活之外。他爱音乐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当他发现如果想以和从前一样的效率继续做生意就必须把柏林作为他的基地时，他费了好大劲，终于让那个小提琴

手和大提琴手答应下来，如果他给他们送去火车票，他们一定到柏林继续他们在慕尼黑那样的合奏。他还保证，如果他们要演奏四重奏的话，可以找来第二小提琴手和一位中提琴手。

他在柏林长期租下一套公寓，房间里挂上曼泽尔、塞甘提尼和赫德勒的油画，看起来像是整个柏林都被他买了下来，还有他热爱的森林和树木。当他的两个朋友来到柏林，他们发现阿布拉姆真是应有尽有，住着舒适的公寓，还有一位迷人的女仆对他们殷勤款待，无微不至。她头上带着镶有花边的小帽，雪白的围裙搭在她那丰满的臀上。

闲话不说，他们马上进入正题。一开始，阿布拉姆先和小提琴手合奏一曲《克鲁采尔奏鸣曲》，休息片刻，吃了点儿点心之后，又开始演奏舒伯特的两个钢琴三重奏，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这些都合奏完了才开始吃正餐。饭后他们一同进了城，去找些男人们的消遣。

阿布拉姆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健康很正规。他时而也会琢磨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还缺少些什么或不够完美，但他又总是将这事拖了下来。他知道自己老年定是富足殷实，额头渐稀的头发使他的表情更添几分刚毅。他的头上褪出一溜光秃圆滑的脑壳，看上去正像是渐渐被磨损的冲头，古时军队突围时用以钻打城墙的那种冲头。

他在柏林住了约十二年。当他意识到要爆发战争时，便将其所有财富转移到瑞士，卖掉了手头上所有会很快贬值的货币。1914 年，他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来到苏黎士，花钱买了一个居住证，还买了一幢坐落在去温特图尔路上的房子。那年他五十二岁，但仍矍铄健壮。可他心里明白，是该想想

前途、逃离欧洲这场瘟疫的时候了。他要在苏黎士静等这场风暴过去，然后再决定做什么。他在那之前就已开始考虑巴勒斯坦了。西方在走下坡路，赫茨尔，那位匈牙利博士在他那个时代就曾说过很明智的话，虽然他也有些过于孩子气的幻想，但那只是因为他是名小说家，又是一名富于激情的记者。不管怎样，巴勒斯坦值得一看，战争一结束，他就要去看一看。

但战争结束时，阿布拉姆·阿浦拉莫夫却完全沉醉于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事。他——正像人们说的那样——恋爱了。这可不是幼稚的爱情，而是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他还打算娶她做合法的妻子。她在慕尼黑爱乐乐团拉小提琴。他曾坐在音乐厅里看到她许多次，在相互交往之前，他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研究她一番。

1918 年，她年约十八岁，而他五十六岁，这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他如果能表现得聪明、谨慎，这些困难就不难克服。

英姬波·万·海斯是个身材高挑的美人儿，在乐团里拉琴可根本用不着长这么美。他打听以后才知道，原来她小时候学小提琴，完全是出于爱好，从来没打算以拉琴为生，但战争使她全家倾家荡产。太走运了，阿浦拉莫夫对自己说，简直和当初到德国遇到那笔车厢生意时一样走运。

那以后，他就清楚该怎么做了。起初他想把脸上的胡子全刮掉，因为它们已经花白了。但照着镜子，他转念一想，如果真把它们剃光，可就得不偿失了。因此，他只将胡须修剪整齐。那把长须造成的犹太人模样顿时一扫而光，看上去倒挺像饱受西方熏陶的斯拉夫人，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想的。

下一步他就开始行动了。

他把那些到他房里演奏的音乐家作为中间人，将她诱到自己家中一起演奏重奏曲，然后是去湖上饭店的餐厅就餐。他认为作为第一步，做这些已足够了。她看到了他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而且也一定会注意到这一顿的餐费足够她挣几个月的。第二步就是要在场间休息时去后台作简短的拜访，告诉她他认为她在乐团做个第二小提琴手实在是屈才，为什么不放弃这个职业？她笑了笑说她别无选择，再说她也喜欢拉琴。拉琴嘛，他说，在乐团之外去做会更好，比如就像他那样，他一辈子只把弹琴作为消遣。她又笑了笑，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阿浦拉莫夫先生那么富有。他惊讶地扬起浓黑的眉毛，认定这年轻的女士一定是在夸大其词，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如果她愿意，没有她得不到的。他向她道了晚安，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从第二排的座位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并且看到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那次见面后，他又隔了两个星期才第三次出现在她面前。

自此以后，英姬波·万·海斯和阿布拉姆·阿浦拉莫夫时常到城里或湖对岸滩边的小餐馆一起吃饭。她发现他讲起话来很让人着迷，见多识广。几个月后，当她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时（她父亲那时就只剩了一条腿、一只戴着单片眼镜的右眼和一个女儿，其余一无所有——阿浦拉莫夫看到他的那一刻就这样想，他原先打听来的消息倒是挺可靠的），她说阿浦拉莫夫不仅资助音乐，本人也是个钢琴家。她父亲显然比阿浦拉莫夫还小几岁，多少了解了一点儿关于他女儿这位上了年纪的求婚者的情况，因此对他既殷勤又友好，还说世道真是变了，以前被珍视的东西现在已面目全非，我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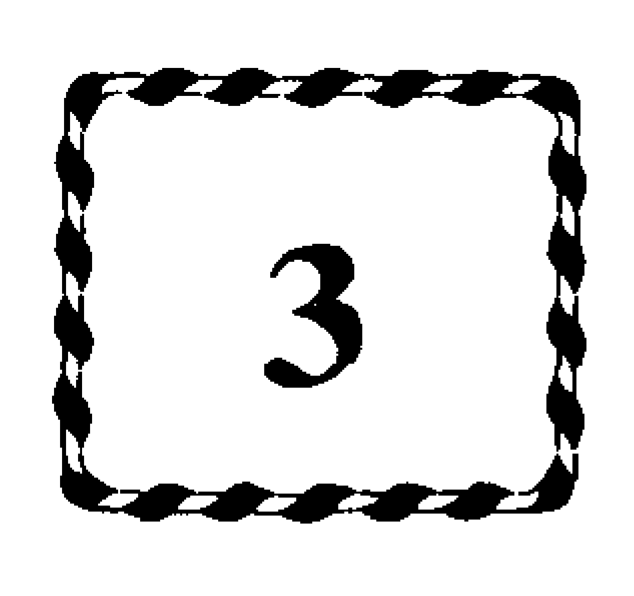
在迈向一个崭新的纪元，一个也许会更加自由、更加美好的新纪元。当然谁也不敢确信，我们只能期望如此。

阿浦拉莫夫和康特·万·海斯又单独见了一次面，进行了一次男人之间的交谈。他们在湖边宾馆的阳台上坐了好几个钟头，消除了两人间所有该消除的隔阂。阿浦拉莫夫天性喜欢趁热打铁，很快便谈成了这笔交易，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笔交易。

1920年底，他娶英姬波为妻，一起去巴勒斯坦作短暂的观光。

1921年，他们又去了一次巴勒斯坦，这次是去建造房子。她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像他们这样的夫妻最好还是去沙漠，去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在那些如他们一样刚刚开始新生、不谙世故、彼此陌生的人群中生活。两人一起发誓，他们将用音乐来填补他们对一心热爱但已逐渐衰落的欧洲的思念之情。

英姬波的父亲得到了通往温特图尔路上的那幢豪宅。“如果想回来，你们永远都受欢迎。”当他们同他告别时，他这样告诉这对新人。



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降生了。当助产婆将这个裹在襁褓里的小家伙举到他父亲面前时，阿布拉姆·亚历山德维奇将一只又短又粗的手指伸到婴儿的手掌里，婴儿的小手便紧紧地抓着它。

“他有大提琴家一般的手指，英姬，”他对妻子说，“我们家很快就可以演奏三重奏了。”

刚生完孩子的妻子对丈夫笑了笑，但马上又痛哭不止。

“你可别给他吃玻璃呀，”她哭叫着，“他会受伤、会出血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英姬波的精神紊乱症更加严重。她会数小时一声不响，紧闭着双眼却仍泪流不止，口中胡言乱语，就算在高兴的时候也会这样。医生劝阿布拉姆·亚历山德维奇别着急，说这完全是一种产后现象，过一段就会好的。但即使这些症状消退后，英姬波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在房里静静地走来走去，面带微笑，操持家务，照管厨房和仆人，给孩子喂奶——她丈夫心头的恐惧仍难以消退。这件事使他感到，这好像是在暗示他，这一生都对他微笑的财富正在背叛他。他那浓黑的眉毛下的一双眼睛总是注意着妻子的一举一动，试图发觉以前忽略的任何蛛丝马迹。英姬波心里很怕他这双紧盯不放的眼睛，所以总是走得比以前更慢，更平静，好像在说：我并不想隐瞒什么，正相反，我要走得更慢，好让你看清你想看的一切。

过了些日子，丈夫同意忘掉妻子产后发生的一切，他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

亚历山大五岁时，他能讲四种混杂在一起的语言：俄语，他父亲从图书室中精心挑出民间故事读给他听；德语，是他父亲对母亲讲的语言；希伯来语，是他从保姆那学来的；还有阿拉伯语，是从女仆、厨师和司机那听来的。

父母给他买了一把小型大提琴，还请了一位音乐老师，每星期从特拉维夫来上两次课。亚历山大喜欢那把大提琴，把它当玩具似地拉着玩儿，而这个玩具也确能表现出他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音乐天赋。除了大提琴，他对别的玩具也同

样入迷。父亲的手枪和父亲打兔子、狐狸、山鹑时手枪发出的清脆的枪声和他的大提琴一样让他着迷。这些枪声能让小动物们蹿到空中，然后又“扑通”扎到地上，最后抽搐几下，就变得像泥土一样无声无息。看着这些辉煌的成绩，小亚历山大总是钦佩地望着父亲，父亲就此认定，父子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他还有一匹马。母亲常陪着他，两人一起在由葡萄藤清理出来的小路上并排骑着它，绕着庄园跑。阿拉伯司机教他如何游泳、如何向池中跳水——池水是为灌溉果园用的。每次他抓到鸽子，厨师就会给他一枚硬币以示奖赏，但条件是他必须亲手抓到而且别把它弄死。

到摘杏的季节，几十名阿拉伯妇女会坐在园子里，剥掉黄杏的干皮，丢进箱子里，她们的孩子们在周围又跑又闹。亚历山大就去找两三个他喜欢的小孩儿，一起跑到果园，去掏鼹鼠窝；如果发现野兔，便紧追上去直至不见踪影。有一次他们踩碎了一条黑蛇的脑袋，将它长长的身子用棍子挑着，去吓唬那些女工，女工们被吓得连连尖叫，抱头鼠蹿。

他父亲给他讲些西边山脚下那片定居点里居民的情况。他知道了他们那些人“头脑简单”，无知，用手抓饭，也不洗手。他们很不幸，他父亲说，不该责怪他们，可也不该和他们混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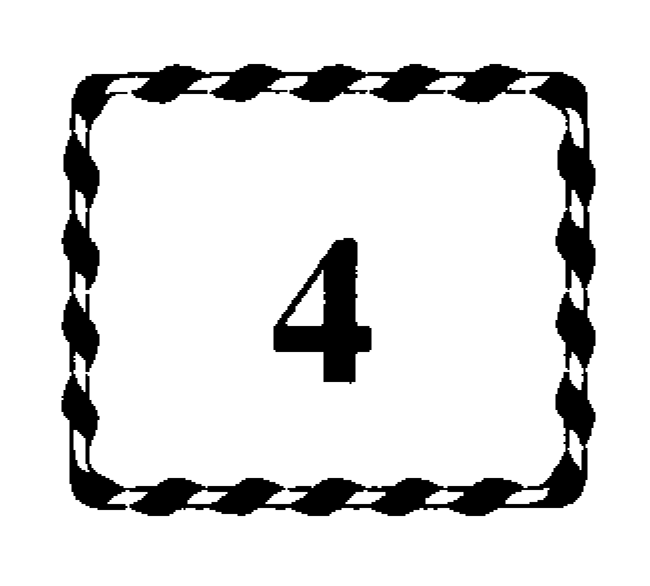
他母亲告诉他，那些人中也许有好人，可他们内心充满妒嫉，非常危险。厨子则说他们是骗子，卖东西总是缺斤短两；他们是“财迷”，是“吃屎货”。

只有保姆偷偷地告诉他，等他长大了，上学了，他就会结识很多像他一样的好孩子，他会有很多朋友。保姆的话既

让他充满好奇，又令他感到费解。

与此同时，他一直都呆在山岗上这座房子里，还经常穿着蓝白相间的海军装，大方领背在脑后，坐在餐桌边和两三个从城里来的陌生人一起吃饭。他们一周几次到这儿来和父亲、母亲一起演奏音乐。

这种时候，亚历山大通常会回到自己的房间，父母让他把门开着，这样他可以尽情欣赏音乐，直至他进入梦乡。他总是两眼直盯着对面的墙壁，聆听着从起居室传来的美妙的音乐。对面墙壁上有一幅蚀刻像，那是从巴黎寄来的一件礼物，上面刻着一个牛面人身的怪物，跪在角斗场上，已是垂死之状；一个坐在场边的女人伸出手去，似乎想要触摸它将死的头颅。那伸出的手还差一点点，却没能够上那只硕大的头颅，亚历山大深信，如果那只手能摸到它的头的话，那垂死的生灵一定会得救的。他等待着，等待着或许会发生奇迹，等待着那只手最终摸到那只头颅。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亚历山大却已慢慢闭上了双眼。当他闭上眼睛时，他感觉就像旁观者一样看到自己如何穿透了音乐境界的第一圈，在那儿逗留了一小会儿；然后他穿透了第二圈，离中心越来越近；最终他会穿透第三圈——然后立即进入梦乡。听着音乐而保持清醒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你是谁，这样做都是很危险、而且不可能做到的；就算是成年人也一样。当时的他就已经很明白这一点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亚历山大六岁了，看起来不得不把他送到定居点上的学校去读书。他父母接受教育的那种方式并不适用于他。他们也曾想过请一些有水平的家庭教师和他们住在一起，可是这个国家尽管气候宜人、花果飘香，国民却是愚昧落后，毫无见识；况且如果真请家庭教师的话，开支也是不小。

他穿着熨烫平整的海军服被带到学校。保姆把他领到老师那儿，看着他被安排在第二排中间一个不错的位置上，紧挨着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女孩坐下，这才离开。

亚历山大看也不看他的同桌。从他坐在位子上的那一刻起直到下课铃响，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老师身上移开，甚至连眼皮也不眨。最后，弄得老师都不想再看着那个方向讲课，因为他的目光让老师感到既刺眼，又烦人，看了会分散注意力。

课间休息时，亚历山大一溜小跑离开教室，来到园子里一棵桉树下，背靠着树干，看着面前乱糟糟的景象。一群高年级的男孩朝他围拢过来。他们有八九岁，吹着口哨，说笑着朝这边走过来。忽然，其中一个男孩对他说："你妈是个异族人，你也是异族人，你这臭阔佬。"

亚历山大跳过去，对着他胸口就是一拳。这群孩子立刻把他围起来拳打脚踢，从背后踢他，扯他的海军服，拽他的头发，使劲抓他。亚历山大奋力抵抗，而且还把他们中的一个打翻在地。那男孩撞在一块石头上，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这帮孩子马上退后几步。亚历山大直愣愣地站在他们面前，两腿叉开，双拳紧握。

孩子们盯着他，他的衣服被撕破了，血从脸颊上流下来，腿上被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孩子们希望能看到他最终忍不住哭出来，然而他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两眼直直地盯着他们，那副眼神就像上课时盯着老师一样：没有泪水，甚至没有痛恨和气愤，只有好奇和别的什么，让那些孩子们感到恐惧。

他的一双大眼睛瞪得比平时更圆，就这么一直瞪着，眼皮一眨也不眨。他的眼睛融合了他父亲的褐色和母亲的绿色，又黑又亮，从瞳孔到眼角一道儿碧绿一道儿金黄，眼珠子一动不动，甚至晃也不晃。

一个人只有在暮色中追猎果园里的兔子时才会看到这样的目光，而在他的目光与这样的目光相接时，那只兔子就会转头撞向他，这时他面对的不再是一只野兔，而是一只幼狮。这个人一定会夺命而逃。这就是为什么那群孩子稍站了片刻就四散而逃的原因。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什么，甚至不懂为什么拔腿就跑。

亚历山大转身走出校门，回家去了。

他父亲召来了校长，要求他一定要严惩打人的那帮“少年犯”。校长走了之后，他父亲问他第二天还愿不愿去学校。他母亲刚想劝阻，阿浦拉莫夫示意她先别说话。她闭上嘴唇，脸上又浮现出恬静的微笑。

“当然要去，”亚历山大说，“他们要是敢再来，我非杀了他们不可。”

“这才是我的儿子，”他父亲说，“永远不会屈服。”

第二天，亚历山大又回到班上上课。他还坐在原来的位子上，身旁还是昨天那个同桌，他还是没瞧她一眼。他一坐

下来又开始紧盯着老师，直到下课铃响才把目光从老师身上挪开。

课间，他又跑到园子里背靠着那棵桉树，没有哪个孩子再来靠近他。那一天没有，以后很多天也一直没有。

几个月后，过完了逾越节① 的一天，当大课间的铃声响时，他才第一次把头转向他的同桌，对她说道："拿着吧。我妈妈把它送给你作为礼物。"说着，他把一包大苹果蛋糕递给她。他妈妈之所以要给她礼物，是因为亚历山大提到他的同桌是个好女孩，学习很专心，而且头上没有虱子。



亚历山大在学校第二年的夏末，阿拉伯人袭击了犹太人的定居点。在希伯伦，大约五十个犹太神学院的学生惨遭屠杀；而在雅法，几个企图逃往特拉维夫的犹太人也死于非命。在犹太人定居点，无论是在河床上，还是在果园里，到处都有屠杀事件发生。

山上的庄园第一次破例允许犹太人定居点上的生人进来。哈加纳军事指挥部通知阿布拉姆·阿浦拉莫夫，他们将不得不在山上修筑一个防御工事，要派六个人长期坚守，直到阿拉伯人停止进攻。他答应了，而且还说他也有枪，随时准备和他们一起打防卫战。

那个阿拉伯女仆被她丈夫叫回村子里去了，而司机和厨子则留了下来。英姬波还叮嘱厨师把热菜热饭给那些人送到哨位上去。

---

① 逾越节：犹太人宗教节日，庆祝其祖先在埃及为奴后获释。

在东面山顶上已经堆起了层层沙袋，围成个半圆形。沙袋后面铺了三张床垫子，六个人中三人睡觉，另三个人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夏夜很温暖，阿浦拉莫夫可以不必请他们进屋睡觉。但英姬波提醒她丈夫，如果事态一直持续到冬天，他们得腾一个房间给那些人住。

定居点里有四个人中了埋伏被杀了，两周后，又一个人被杀，好几个受伤。阿浦拉莫夫从山上望着送葬的人流，感慨地说："这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无能为力，这是个未开化的国度。"

到晚上，尽管特拉维夫的音乐家们无法赶来，他们仍继续演奏音乐。冬天来临时，不论是这片定居点还是整个国家，生活都开始恢复正常。

亚历山大回到学校，继续第三年的学业。这时他得知同桌的父亲就是被害者之一。课间的时候，他走到她面前，跟她说，等他长大了一定会为她父亲讨回血债，请她相信他。他又不放心地问她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她保证说她相信他的每一句话。

亚历山大把他朋友的遭遇讲给父母听，并问他们对此将做何反应。英姬波和阿布拉姆对视了一下，半天没有出声。可是亚历山大一定要他们答复。

"依你看呢?"他父亲问他。

"我想让你们去找她妈妈，给她些钱买吃的。"亚历山大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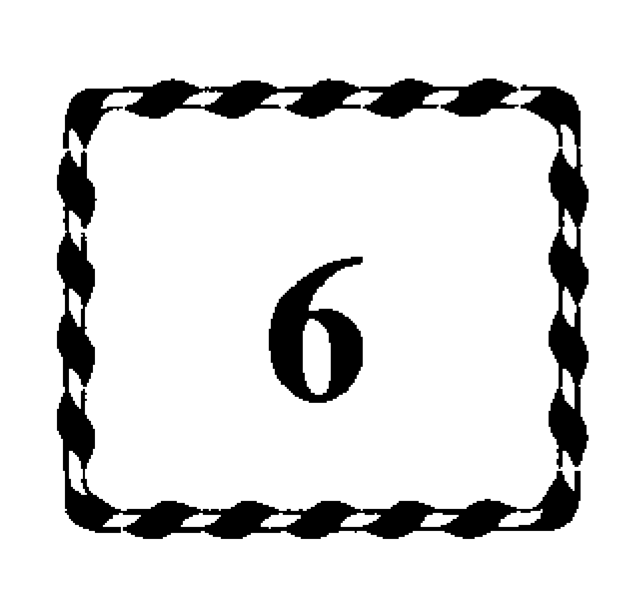
"你怎么会想到她家没钱呢?"

"因为她爸爸死了，没人挣钱养家了。"

“说的不错，我们会去的。”他父亲说。当天他就和司机一起去了那个寡妇的家里。这位母亲先是吃了一惊，继而热泪盈眶，不住地表示感谢。她说她从来没想到他是这样好心肠的人，可她真的不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定居点委员会已经给了她抚恤金，而且，孩子的大伯会关照她们的生活的。

阿布拉姆回到家里，把事情的经过讲给妻子和儿子听。他心底里很奇怪儿子的想法是从哪来的，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同情心。他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一生中还未曾主动帮助过别人。不错，他曾在几年前把钱塞到一个俄国女人的手里，可那时他只是把这当作是为获取某种快乐和服务而应付的报酬。他从未欠过别人钱，当然，要是没有什么正经事的话也不会轻易送钱给别人。阿浦拉莫夫仔细看着儿子，抚摩着他的脑袋，然后搂紧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行了，”他说，“我们已经按你说的去做了。”



他们吃了一顿特别的晚餐来庆祝他的十三岁生日，之后，他们合奏了一曲经常排练的三重奏。亚历山大这天获得许可，可以邀请任何人来共进晚餐，只要不招来满屋子的调皮捣蛋鬼就行了。

亚历山大只想请一个同学，那就是她。当父母问他是不是把她妈妈一起请来时，他说这没必要。

她来得很准时，而且带给他一本比阿利克的诗集作为礼物。他把她介绍给父母。她叫丽娅，是个丰满而秀气的女孩子。她一说话就脸红，而且看到什么都会很吃惊。席间，她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当她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作为惟一的

观众好奇地观看三位演奏者表演时，她屏住呼吸，紧闭着嘴唇。直到合奏结束，她才从沙发上挪下来，贴近英姬波的耳朵说她要上厕所。她回到屋子的时候，阿浦拉莫夫问她对他们的演奏有何评价。

“阿历奏的歌曲最好听，”她说道，“他演奏得恰到好处。”

“阿历？”阿浦拉莫夫笑道，“你叫他阿历吗？”

“他们都这么叫我，我也就不太在乎了。”亚历山大解释道。

他陪着她一起坐他家的汽车送她回家。路上他解释说，自己其实还没有达到演奏这种音乐的水平，只是他父亲坚持说他能行。他相信长大以后一定能演奏得更完美。他长大后，要做一名世界级的提琴家。丽娅夸他说他已经演奏得相当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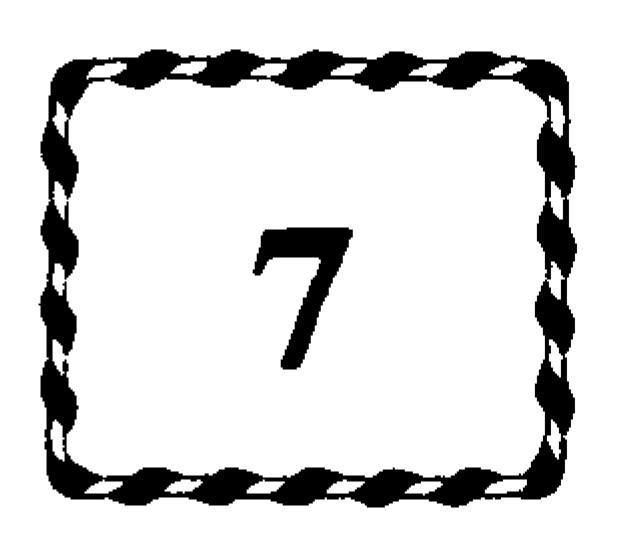
他陪她下了车，走在她家门口最近的小路上，他看着她说：“我想我现在该吻你一下，来庆祝我的生日。”

他们俩紧紧地把嘴唇贴在一起，互相亲吻，然后立刻又分开了。

他回到车上时，司机告诉他，刚才的那一幕被他看到了，他认为他做得不妥当，如果他父亲知道了，会很生气的。亚历山大回答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礼节上有很大差别。况且他已经打算长大后要娶这个女孩为妻，还要替她父亲讨回血债。

“你怎么知道是谁杀了他呢？”司机质疑道。

“我会弄清楚的，”亚历山大保证说，“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小学的最后一年，亚历山大已经比班上其他孩子高出约一头了。现在他独自一人坐在一张双人长凳上，旁边却没人坐。自从他和丽娅接吻之后，他就挪到了这张桌子上。不过课间时，他还是和丽娅呆在一起，在他们俩自己的角落里。没有别的哪个男生同丽娅说话，只有女生们有权接近她。大家都知道，阿历已经“买”下了她，因为他是个百万富翁，而丽娅对此倒并不在意。她只是在等那一天到来，那一天她会服从他的所有意志，她会感到无比幸福，而且别无所求。

那年，亚历山大读了很多父亲图书室的书，有俄语的、德语的和希伯来语的。他还偷偷地写日记，记满了自己各种各样的想法。那年，他还对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四本书都做了笔记。

大托尔斯泰所著的《克鲁采尔奏鸣曲》是本很有意思的书，因为他向读者阐述了婚姻生活是极其危险的，甚至音乐也很危险。可我相信这是可以克服的。我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我仍相信这是可以克服的。不管怎么说，这位作家还是很懂音乐的。

普希金的《莫扎特和萨里埃利》证实了如果一个人有罪的话，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或者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相信普希金说得对。

克莱斯特的《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告诉我，如果你想做得公正，并且对你的敌人复仇的话，你得记住要

有个限度。不可能仅仅为了几匹马却去杀几百个人。这方面我想了很多，因为起先我曾下定决心，当我为丽娅父亲之死复仇时一定要杀十个阿拉伯人才算了结。现在看来，我要找到真凶，杀掉他一个人就行了。否则的话，在科尔哈斯身上发生的事也会降临到我头上。我指的是他犯的错误。

至今我看过的书中，最有趣的属塞万提斯所著的《堂·吉诃德》。之所以说它有趣，首先是因为它令人觉得很滑稽。当我读到他对牧羊的人们发表演讲和他奄奄一息等处时，我禁不住哭了出来；而当我读到另外一些部分的描写时，我又禁不住放声大笑。我认为这本书包容了每个人的经历，甚至包括我父亲和我自己。你有时是堂·吉诃德，有时是桑卓·潘赞，有时又兼而有之。这种观点非常深刻，我认为作者是完全正确的。他是我至今所感受到的最有才气的作家，这一点连爸爸也赞同。妈妈很喜欢歌德的作品，我也读过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本书挺不错的。不过我实在读不下去《浮士德》，因为书中讲了好多哲学问题，还有书中的韵律也让我头疼。

1936年逾越节期间，阿拉伯人再次进攻犹太人定居点。小山右侧的山坡上又一次堆满了沙袋，这回，驻守在那里的年轻人有十几个。或许是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或许是因为事过境迁，这帮人变得越来越随便。他们把工具棚下那块地清了出来，从园子里拖来几块厚木板，搭了一张吃饭用的长桌；他们还擅自动用铁锹和铁镐，连招呼也不打；甚至还在

水池里游泳。阿浦拉莫夫对此没多说什么，而亚历山大有一天早晨却来到园子里，找到一个头儿模样的人告诉他谁要想到水池里游泳，得先在园子里的水龙头下洗个澡；他还提到别用面包片或其他食物去喂马。

“好吧，孩子，”头儿模样的人说，“你不介意把这只沙袋装满吧。”

亚历山大回敬说自己还有功课要做，等做完了再说。说完转过身，回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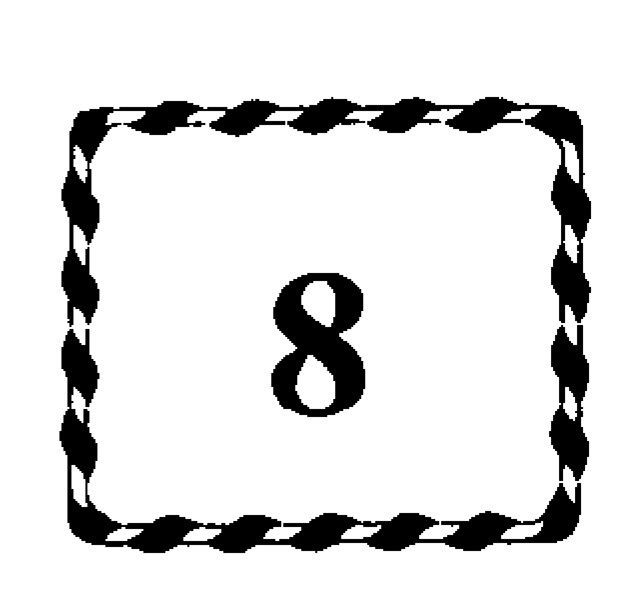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家里来了两位特拉维夫来的大提琴和中提琴演奏家。晚饭后，他们合奏了一些双大提琴四重奏。悠扬的乐曲声穿过窗子传到院子里，而空中还回荡着几声微弱的爆炸声和东面远处传来的枪响。两位音乐家演奏时互相对视了一下，阿浦拉莫夫坐在椅子上示意他们继续拉下去。当他们演奏到第二乐章的高潮部分时（在亚历山大看来，这是他在那些日子中所听到的最哀伤凄婉的曲子），英姬波放下琴弓，琴从她手中滑落到地上。她说道：“够了，我再也拉不下去了，我要回家。”说着竟泪如泉涌。

她丈夫和儿子小心地把她从椅子上扶起来，送回她的房间。这已不是她第一次显示出精神错乱的预兆了。她经常在床上一躺就是老半天，不吃不喝，一连几天都沉默不语。然后逐渐恢复正常，却还是懒得说话，脸上的微笑渐渐变得有些吓人，看上去倒更像一种无言的哭泣。

客人们都回到房间，亚历山大也听话地上床睡觉了，七十四岁的阿浦拉莫夫独自坐在三十六岁的英姬波的床边，握住她的手，轻声耳语着劝她入睡，让她慢慢平静下来，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很快他们就会去欧洲旅行，她会再一次

快乐、健康起来的。他听着她的呼吸越来越平稳，越来越均匀，心里想着那无可逃脱的结局已渐渐降临，想到自己正在与生命的那一部分永诀——那些支撑生命的理想他极力追忆却已无处可寻。仿佛阿布拉姆·亚历山德维奇·阿浦拉莫夫根本不曾存在，存在的只是真空中飘零四散的碎屑：一条宽广的小河，浑浊的河水飘浮着排排木筏；母亲慈爱的面容浮现在眼前，感谢妈妈带给我的一切，让我今天能坐在钢琴旁弹奏曲子；一间昏暗的木屋，里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盖着绿色的天鹅绒布，一个俄罗斯女人端上茶，两个小女孩乖乖地躲在墙角，敬畏地看着他，不敢去碰他带给她们的糖果。然后是一团漆黑，这时他听到一辆货车驶向远方的隆响和窗子下传上来的交谈声，那是院子里那些年轻人的声音。这些陌生人闯进他的庄园，他却无力保护自己，更赶不走他们。

这些年轻人的说话声也传到了亚历山大的耳朵里，因为他躺着却没睡着。如果当时他知道父亲不会知道、也不会生气的话，他早就跳下床，从那些年轻人手中夺过枪，跑到山东侧那个河谷里，瞄准那些阿拉伯人把他们一个个全打死，才不管他从《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中学到了什么。他会在黑夜中扑向他们，毫不留情地杀掉他们，先枪毙再宰割，铲除干净附在他们身上的所有罪恶。



小学最后一年的时光已近尾声。母亲在家中卧床不起，所以额外雇了一名保姆来照看她。父亲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研究，成天趴在分类帐簿或书本上，晚上就到空荡荡的客厅里，坐在钢琴前，从一支曲子串弹到另

一支曲子，有时又只弹伴奏曲，还不时停下来聆听什么。只有父子二人一起吃饭，他们面对面坐在桌子的两头，眼睛随着女仆进进出出而瞧来观去。

暑假快结束时，亚历山大去找丽娅，告诉她他就要去远方的一所农校了。他母亲的医生建议说这样对他会有好处。丽娅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整个定居点的人早已知道阿浦拉莫夫的儿子要走了，他的母亲已经疯了。女孩伸出双手，似乎在恳求他去抓住她的手，可亚历山大只是直直地坐在位子上，两眼直盯着她的双眼。

“我会等你的，”丽娅说，“哪怕是等到永远。”

“永远?”亚历山大说，也许在嘲笑她，也许在沉思，“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都是短暂的。”

假期结束了，他们把亚历山大的行李装上车，然后父亲开车送他到北面离家约一百二十公里以外的一所农校。在校园里闲逛的老生们都以为陪亚历山大同来的是他祖父，后来他们得知那是他父亲时，他们多少都有些不愿接近他，因为他们感到不屑。他来之前，他就已经在这些孩子中留下了坏印象，因为他父母非常有钱，竟打算在学校给儿子单独开一个房间，只是学校没同意。同样，当他们看到他随身带的行李时，更觉得荒唐可笑——一件硕大无比的乐器，装在一只大黑盒子里；还有一台带有唱片的留声机。

亚历山大把大提琴放到他的床下。为了能放进去，他得先用砖头把床铺的四个脚垫起来；他把唱机放到床头的小书桌上，这样一来连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了。由于他的床比别人高出一截，这更让别人把他当成一名狂妄之徒。亚历山大忙完之后，心中十分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尴尬局面：从现在

起，他要成天面对三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男孩，如果不想让自己的提琴和唱机受到什么损坏的话，他就不能招惹他们，甚至还得贿赂他们一下；而且，如果他不想给父亲添乱的话，他最好死了回家这条心。

亚历山大平生第一次不得不做他不喜欢做的掉价儿的事情，而在他决定将这场丢面子的闹剧演到底之前，他暗暗下定决心，以后等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定要宣泄憎恨，好好报复他们。他不知道该恨谁，报复谁，而这种迷迷茫茫、不知道该把自己的愤怒向谁发泄的感觉更令他郁闷不快。

就这样他开始了四年新生活，他咬紧牙关，愤怒地发誓，不管出现什么事情都要忍着。

亚历山大当晚发现其实另三个男孩也都是初次见面，不由松了一口气。对此他如果不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话，一开始就该猜到了。他介绍说自己叫阿历，然后得知他的几个室友叫纳曼、艾里和尤里。尤里和艾里从乡下来，而纳曼来自特拉维夫，他之所以来学农业是因为他妈妈是个社会主义者，她想让自己的儿子自食其力。尤里是从亚历山大家附近的定居点来的，他反驳说通过经营农业比经商更容易成为资本家。艾里则认为从事农业很辛苦，但有耕耘就有收获。轮到亚历山大时，他说他父亲有个农场，可是他自己想干些别的，不过还没有最终决定该干什么。

“你要这玩艺儿做什么用呢?”艾里指着床下的大提琴问道，“就因为它，你都要住到二层去了。”

亚历山大解释说他喜欢拉大提琴。

“那这个呢?”尤里指着放唱机，好奇地问：“这个也能拉吗?”

“也能。”亚历山大简短地回答，没再说下去。他暗想，和这个傻瓜说这几句就够了，但他马上记起自己曾下过的决心，又继续说道：“如果你们谁想借我的机子听唱片的话，尽可随意，没问题。”

纳曼说他家里有些唱片，如果可能他会在第一个假期以后带一些过来。他说着说着脸就红了。

亚历山大从包里掏出一盒巧克力来分给大家吃。

“这些巧克力是进口货，”艾里说，“就是这些东西把我们国家的经济给搞垮了，这些外国货！”不过他边说着边拿起一块送到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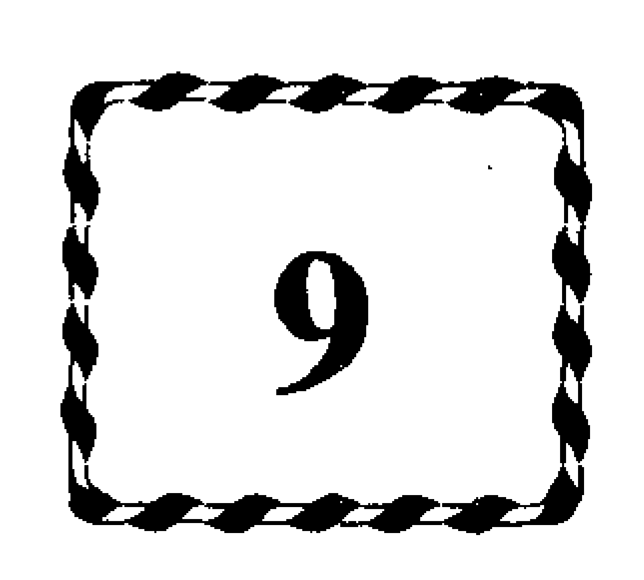
“那就不要吃了，”特拉维夫来的纳曼说，“没人逼你吃。”说着，他脸又红了。亚历山大心里暗暗给他加了一分。他知道纳曼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难为情才脸红的，因为对他来说在生人面前说话实在难为情，可能他也正苦于被迫与陌生人住在一起。或许我可以考虑考虑跟他交往。

尤里吃了一块，说了声谢谢就没再说别的。他吃巧克力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就像牲口一样。纳曼起先不想吃，但亚历山大一直劝他，所以他还是取了一块放进嘴里，头却微微转向墙那边，似乎在做什么值得谦虚的事。亚历山大心想，看来他或许可以交往呢。

临睡前，艾里问亚历山大有没有烟，亚历山大说没有，艾里于是转过头，面朝着墙壁，很快便进入梦乡。尤里向室友们道了声晚安，把毯子一拉，蒙头便睡。纳曼开始喃喃自语起来，但一会儿就停了下来，闭上眼静静躺着。但很明显他并没睡着。亚历山大背着墙侧卧着，面朝着屋里，这样，夜里一有动静，他只需睁开眼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动他

的东西。

他一边想着也许一夜都睡不着了，一边却渐渐沉沉睡去，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一阵铃响把众人催醒过来。亚历山大睁开眼，看着众人忙这忙那，开始了农校里第一天的生活。当他终于认定这一切并不是恶梦，而是真真切切的新生活时，他赶紧一跃而起，冲了个澡。他一边在地上踱来踱去，一边在心里想：家里人现在在干什么呢？



农校里的生活十分单调，早六点铃响起床，晚十点熄灯睡觉，天天如此。这么着过了约一个月，亚历山大不禁感慨，好像从他记事起，生活便一直是这般平淡枯燥。又过了几个月，他不仅机械地遵守着作息时间，而且开始机械地与人交往。白天在农场里劳动，再加上忙别的，他每晚都觉得无比疲乏，这样一来，他竟无暇追忆过去，也无暇憧憬未来。只有他父亲的来信能让他偶尔回忆起过去，但那些信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一遍遍地说他母亲病情并无好转，说他父亲的工作一切照旧，说希望他用功学习，末了便总是祝他身体健康。所以那些信渐渐地也无法打动他的心了。

只不过他父亲的字迹有了些变化，起初时清楚工整而且流畅，到后来变得有些潦草，有时甚至无法辨认。

纳曼从家里带来一些唱片，然后借用亚历山大的留声机来放唱片，别的男同学偶尔也会借用。但每逢周六，别的男孩都在体育锻炼或在附近闲逛时，他总是独自一人留在宿舍里，静静地聆听他自己带在身边的那些唱片；有时还会拿起

提琴拉上几段，但总觉得原先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渐渐地荡然无存了。

逾越节临近时，他父亲突然来到农校，令他大吃一惊。他的胡须比以前更长了，脸也更加消瘦，原先还算结实的腹部已变得松弛无力，被皮带一勒便鼓了出来，几乎都要挡住他俯视的视线。

他父亲当然是专程来看他的，不过同时也告诉他假期里不要回家了。他特地带来一大笔钱，足够亚历山大在城里住进旅馆过上整个假期的花销。他说，他母亲的境况太糟糕了，他不想让他看见她那副样子；她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一有好转就会告诉他，到时再让他回家看望。

亚历山大没有提出异议。父子俩在学校食堂里喝着茶，一起坐了约一个小时。亚历山大问父亲为什么要亲自开车来，从家到农校的车程可是又长又累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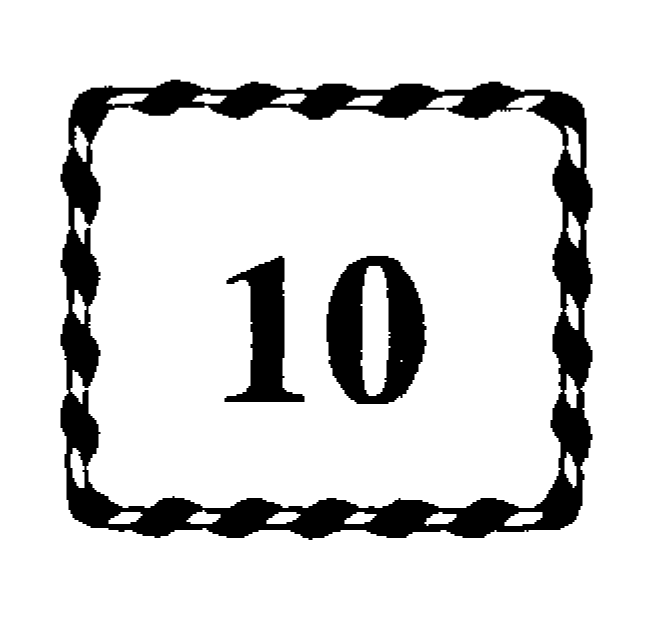
"我把司机给解雇了，"他父亲说，"我还要司机干什么？"

接着两人互相吻别，父亲又走了。

自那以后，家信越来越少。但临近学年末时，家里意外地来了一封长信，一开始还是说他母亲并无好转；他父亲还是在忙这忙那，但已决定要去一趟欧洲，他已经把他母亲嘱托给一个能干的保姆去照料，此外还有医生会定期来诊治。他之所以要出外走一趟，是因为这样或许能对病人有些益处，再说他也觉得应该在有生之年出去游一游。亚历山大已经不小了，明白人都是有生老病死的；而且他父亲这样做其实是抱有一丝奢望的，指望在旅行归来时能看见奇迹发生，奢望着他母亲或许能有所好转。这样一来，他在那个假期里就没必要呆在家里。他所需的花销，他父亲已托银行代转。

等第二年父子再聚时，或许就可以平静淡然地谈论这一切。

亚历山大申请假期留校，校方批准了。这样他便可以整个假期都呆在学校里。若要买吃的，他可以到看门人那儿去。那个看门人一年到头都住在校内。



亚历山大又可以静静地一个人独居一室了。原来住着的人都走了，腾出了一方自由的小天地。他又操起琴，重新努力地练习，希望能取得神速的进步；每天他都听留声机，还写了许多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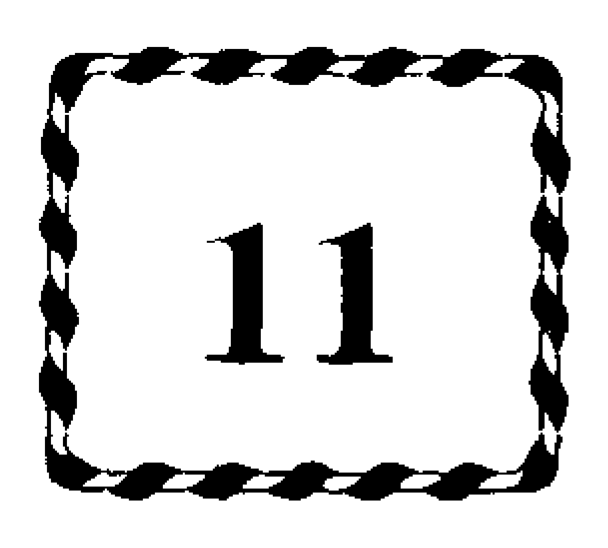
附近地区又响起了枪声。阿拉伯人已宣布起义——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现在他们既朝我们开枪，也朝英军开枪。这里，每晚都能听到从阿拉伯人那个方向不断传来的枪声。他们的部族名叫泽白。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叛乱。他们并不值得冒这个险，因为这儿是他们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农场。我想这些枪声是那些从吉尔堡过来的团伙打的。

我每天都刻苦练琴，多听音乐。我开始对莫扎特的音乐有了些兴趣。以前我并没有十分在意他的音乐，但现在我逐渐觉得他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位音乐家。

显然，我妈妈是没希望了，年迈的老父也已老得不成样子。以前他在我心目中是多么高大的一副慈父形象，但上回我忽然发现他其实已经老了。我已经十五岁了，我应该睁大眼睛自己去看待这个世界。事实上我别无选择，就算我号啕大哭也是于事无补的。

最近我仔细琢磨了音乐的三个境界。当我一边看着乐谱一边轻轻地哼唱，或在钢琴上试曲时，我就算是进入了音乐的第一境界——我懂了这些音符，于是便能进入第一境界。当我静心聆听着美妙的乐曲，或勉强能准确地演奏乐曲时，我进入了第二境界。但仔细琢磨起来，为什么要有音乐？音乐就像语言，但作曲家是用音符来表达自我，而不用任何文字。这就像哑巴一样，用手势与人交谈而又希望别人能懂他的意思。作曲家希望别人能理解、领会他，却也清楚只有那些知道该如何去诠释他的人才可能领会那些符号及音符间流露的心声。作曲家描绘的世界是个实实在在现实的辉煌的殿堂。就像我的房间是实实在在的、我的思考是实实在在的一样，这座殿堂也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作曲家所私有的，是隐秘的。他的原则就是要守护这座殿堂，不许糊糊涂涂的陌生人随便进入。但他是很乐意让别人进入他的殿堂的，问题在于他肯让谁进入。我想只有那些能登临他音乐的第三境界的人才配进入这一光辉的殿堂。如果某个听者有慧心、有能力闯入音乐的中央殿堂，那这意味着这个听者与作曲家本人多少有几分相似、心灵相通。这当然不是说这个听者就因此变成作曲家，而是说他能够领会某种精髓，有资格进入。他的进入不会造成干扰，不会添乱。但依我看，这个中央殿堂不仅隐秘，而且危险。殿堂里是个如此美丽、如此神圣的世界，你一进入就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你怎么可能欣赏领略着这份登峰造极、惊魂夺魄的胜景而还能好好活着？第二，你怎么可能愿意从这个世界抽身回到那庸俗无趣的现实

世界？我现在或许还无能力进入，至少不可能一个人单独进入。但如果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进入，那么那个殿堂、那个世界便不再隐秘，这整个一切都要毁于一旦。再说，我能和谁一块儿进入呢？



假期已过了十天左右，这一天，他正坐在房里看着书，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是农场主的老婆推门走了进来。

“我知道阿浦拉莫夫先生从不与人交往，难道您不觉得孤独吗？”她一边说着，一边将一双手放在她的大腿上。

她双脚叉立，说话时一副风骚下贱的模样，脸上挤出谄媚的笑意，眼中微微发光——那双眼睛的神情就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时被当场逮住一样，连笑容也显得那么干涩僵硬。这番情景让他马上意识到好几件事。第一，他知道她想要干什么，虽然他从未干过那种事；第二，他本该告诉她让她见鬼去，因为她竟敢自以为是地贸然私闯他独享的空间；第三，他希望她不要转身便走。如果她真的转身过去，他一定会冲过去一把抓住她。但她并没有转身而去，过了一小会儿，她走到门边锁上门，把两人关在了屋里，然后猛地扑向他，狂乱地剥掉他的衣服。

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背叛自己一直固守着的价值观。她的脸蛋并不漂亮，头发也不干净，一双丰硕的乳房上粘着几根坚硬的发茬，大腿上的肉放肆地乱颤，全身上下每一寸都透着淫荡，身上还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油汗臭味，想必

已好久没洗过澡了。不过，他还是被她扯到身边，就像暴风雨中飘摇零落的一捆干稻草一样。云雨之中，他不断狠狠地捏打着她那一身湿漉漉、油腻溜滑的皮肉。

事毕，他从她身上爬起来，坐在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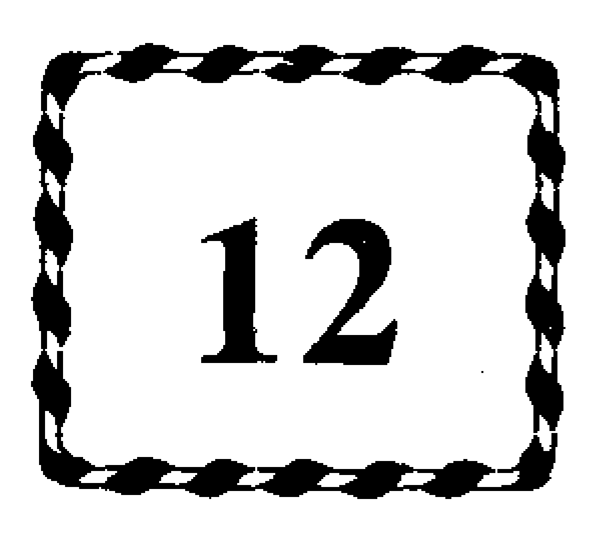
“快穿好衣服，给我马上滚！你丈夫会杀了你的。”

她慢腾腾抓起衣裤。他看着她把肥硕的大腿伸入裤衩，那条裤衩简直就和麻布袋一般肥大。

“小宝贝，”她说道，脸上洋溢着几分满足，“我会常来这儿的，因为咱俩真的很合适。”他真想冲过去给她两下子。

“以后不准叫我‘小宝贝’！听到了吗？”他怒吼道。

他的一双大眼睛里甚至没有怒意，但有一股暗红的执着的火焰，这使她心里不禁有些害怕，只好赶忙穿好外衣，然后匆匆走了。



一整夜，夜空里不断回荡着枪炮声。早在暑假开始之前、学校里还住满了学生时，纪律约束就十分严。学生们私下里都在训练如何使用武器，但一到夜里一律不准外出。农田里，他们在警戒部队的保护下干活。现在，亚历山大是一个人独处，所以他经常偷偷在傍晚时分溜出农场，在附近蹓跶。他觉得要向自己证明那些潜藏的刽子手们是不敢拿他怎么样的，更不可能影响到他的意志、灵魂。有一回，他从一个枪库中弄到一把左轮手枪，但打不开保险栓，只好空手而归。

有一个晚上，他正站在农场边上审视着干涸的河床那一边一直延伸到阿拉伯人营房的那面山坡。这时，在他耳旁烧

焦的灌木丛边，从犁翻过的地畦里突然爬出一个人来——这是一个年约二十的阿拉伯人，与他相隔约四米，两人对峙着。两人静静地互望了一会儿，那个阿拉伯人先开口说话，带着蔑视与仇恨，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亚历山大是婊子养的，这回死定了，再也活不过多久了，所以他要先把他鸡奸，然后再杀死埋进地里。这个阿拉伯人咧嘴一笑，叫亚历山大走过去。

"犹太佬，我在这等了你三天了！我向上帝发誓，我要鸡奸你，然后像杀狗一样宰了你。婊子养的，过来呀，你是跑不掉的。"

亚历山大下定决心不还口。他仔细看着对手，看看他的对手是否带了武器。但看起来这个人赤手空拳，衣衫褴褛，似乎什么也没带。亚历山大向前一步，那人也向前一步。当两人只隔两米左右时，亚历山大弯腰抓起一把泥土，猛地撒向那个阿拉伯人，然后跳上前去，还像先前一样猫着腰。乘那人眼不见物的刹那，亚历山大冲过去用头狠狠地撞向那人的腹部。

那阿拉伯人仰面摔在地上，然后拽住亚历山大的头发，两人便在泥里滚来滚去，互相揪着衣服厮打起来。亚历山大忽然发现那人一直在伸右手想去拔皮带上别的一把匕首，却一直没拔出来。亚历山大赶忙停下扭打，照准那人的小腹全力一击。这一击果然奏效，那人痛得连声呼叫，哀号着呻吟起来。亚历山大跳过去骑在他身上，一双手死死扼住他的脖子。他知道这回总算赢定了。

亚历山大俯下腰，双手死死往下压，他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和指甲扎入对手脖子上的肌肉里，竟能触到鼓胀鼓胀的动

脉。他的手继续加劲，不久便听到一声轻微的咽气声。这时，他突然觉察到一股气味，而先前竟一直没觉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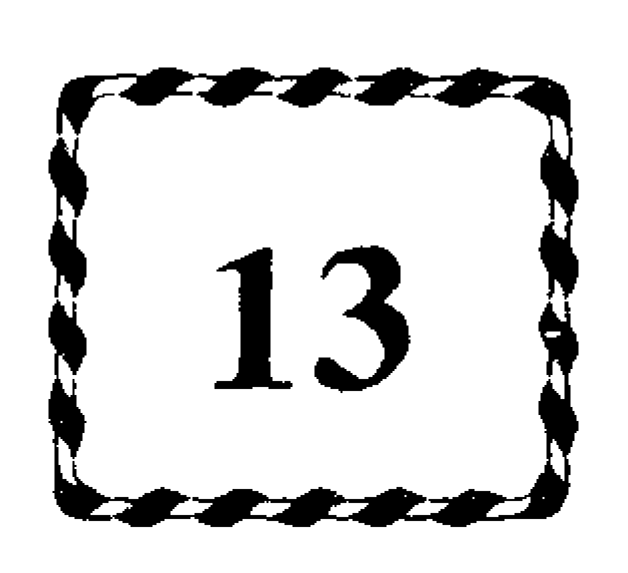
这股气味是从那人的衣服上、身上、头发丛里散发出来的。这是阿拉伯人以粪作燃料的火炉里冒出的烟所特有的气味。记得他童年时，每当太阳下山后，正是那些阿拉伯人收工回家烤面包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庭院里便充斥着这种怪味。他还曾经背着父母收下那些阿拉伯人递给他的热乎乎的皮塔饼呢！他狼吞虎咽地吃完后才发现满脸都是沙粒。

亚历山大看着眼前这个家伙：眼睛鼓胀，面色黝黑，死灰的皮肤上渐渐地连一丝血色也没有了，他的整个腰身已被压得陷入泥中，身体不停地抽搐着，仿佛在哀告求饶。亚历山大仍坐在那人身上，心里知道自己做的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现在，只有那股怪味依旧，其余便是一片死寂。这死寂在片刻间蓦地弥漫开，笼罩着四周。沉沉死寂之中，从远处传来几声犬吠，还有几声隐约模糊的牛羊叫声，似乎还夹杂着几声鸟叫。亚历山大松开手，这时他的手却突然一阵痉挛。他赶忙抖抖手，把手指一个一个地掰直、弯曲，直到恢复灵活如初。他这时还坐在那死人身上，伸手把他对手脸上的泥沙抹去，把他的眼睛合上，然后凝视着那张脸，既陌生又熟悉的一张脸。他站起身来，趔趔趄趄、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来到工具棚，找到一把铁锹。他把尸体拖到树丛中，挖了个坑，埋了进去，又小心翼翼地在表面新泥上盖上干泥。为了掩盖行踪、迷惑别人，亚历山大顺着注满了水的灌溉渠趟了好几百米，来到农场外边的马路上，从那儿折回到农场大院里。

回到屋后，他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然后上床，一直

躺到天亮。五点半时，他已来到外边马路上，搭上开往海法的第一班早班车。他已经在校办室里留了个留言条，说他要回家去看望生病的母亲。

亚历山大人坐在汽车上，脑子里却在不停地猜想着现在学校里会发生些什么事。阿拉伯人一定已经报警说那人已失踪；警察一定已带着猎犬来到农场，尸体一定已被发现，农场主马上就要被捕受审；农场主一定很容易找得到不在场的证据；而由于在学校里除亚历山大外再没有别人了，那农场主一定会想到亚历山大的仓惶出走与这起杀人案有关系。



他一手拎着包一手提着琴回到家，走进庭院时便看见墙壁阴影处支起了一个凉棚，凉棚下是一张床，保姆正站在床边倒茶。他母亲倚着垫高的枕头躺在床上。他看见她脸的侧面，只见她面容枯槁，颧骨高耸，已完全不是记忆中那张脸，只有一双大眼睛依稀还是先前的模样。他走到床边，看着母亲，却总是接触不到她的目光。她的一双眼只是直愣愣地向前看，两只手软软地耷拉着放在被单上。

“妈，”他用德语说道：“妈，我回来看你了。”

英姬波转过脸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没答话。

“你一个人跑去苏黎士，却把我撂在这儿……快去收拾好行李，他们在等着我咧……马上就要排练了，你却还在这儿胡闹……快，快去收拾好行李……我早准备好了。”

亚历山大发现不远处工具棚边一个犹太工头和他的两个手下正惊奇地朝这边看。而他一抬头去看他们，他们就赶紧

继续忙他们手中的活，把脸都转向果园那边。

“妈，”他说道：“你一定要好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去旅游。”

“那人在哪儿？”她忽然惊恐万分，喃喃地说道：“不能让他知道，阿历……什么也别让他知道……现在就咱们两人，赶紧离开这儿……得乘他还没回来。”

保姆过来告诉他，说她偶尔会好些，能静静地看看书，也吃得下东西，甚至还会对人微笑。但大部分时间就是现在这副样子。医生倒还在尽力想办法。

亚历山大走进屋子里，发现桌椅家具全都盖上了白布罩，虽然屋外是酷暑炎炎，但屋子里却飘荡着一股阴森森的霉味。他父亲的书房上了锁。很明显，老父亲去欧洲时已带走了所有钥匙，他或许要到秋天时才会回来。在亚历山大自己的房间里，他床上的寝具已全都不见了，桌上搁了一个空花瓶，地毯被翻卷起来放在书桌底下。窗外是果园灌溉用的蓄水池，传来一阵突突的马达声。

他回到院子里，他母亲躺在凉棚下，这时已是闭着双眼。保姆问他想什么时候吃饭，又问他打算在家呆多久。他回答说他会一直呆在家，直到秋天的新学期开学。

他沿着山坡往山下走，来到丽娅的家。丽娅看见他忽然出现在面前时，简直吃惊极了。他没有拥抱她，而且在说话时显出一副平淡的样子，仿佛两人相别其实就在昨天一样。她忍不住要流下泪来。他挽起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

“走吧，咱们去散散步吧。”他说道。

他暗自惊异，这一年来丽娅身上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他的惊异。一年前分别时看到的那个小姑

娘现在已经分明是个成熟的少女了，她的身体有了全新的变化，变得跟那个农场主的老婆有些相似，但自然比她可爱千万倍。

他们沿着他家西面的小山坡散着步，不知不觉走进他家果园里。地上铺着钢管，是用来引水灌溉用的，其中一段离地而起横在半空，足有他们那么高。亚历山大爬上钢管，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探着步子前进，就像马戏团走钢丝一样。丽娅在地上紧挨着他并排向前走。

“习惯了就很容易的，要不要试试?”他问道。

丽娅并不想试，所以只是窘窘地一笑。她心里其实更想让他下来，和她手拉手、肩并肩慢慢地散步，但看来他是一定要这么玩闹下去，直到隆起的那截钢管到了尽头平伏下去，他才又回到地面上。他停了一会儿，看着松软的泥地上那截黑黑长长的圆管子，踢了一脚，然后说：“你该知道我实现了以前的诺言。我已经为你父亲报了血仇……就在昨天晚上。所以我才要跑来告诉你。”

丽娅不敢发问，只是等着他说下去，但亚历山大停下话头，一言不发。两人在树丛中静静地走着，沿着山坡往上走。

这时他又说道：“我不能把细节说给你听。但相信我，我真地做到了。现在我要呆在镇里，一直到暑假结束，因为我要躲避警察。”

她听到这儿害怕极了，赶忙劝他还是躲到她家去好些，因为警察一定不会去那儿搜查的。亚历山大回答说他的行动十分谨慎，甚至可以说得上天衣无缝，警察是无法追踪到这儿的。

回到他家，他让保姆做饭，然后俩人在厨房里共进晚餐。他一边吃着饭，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他这位童年时的女朋友身上的每一处变化。

她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红着脸微笑着说：“阿历，你的变化可真大……现在你真是太英俊了，比以前更英俊了。我刚才在想，你要是知道这一点，一定会很高兴，是吗?”

“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诺言。我现在谁也不欠了。”他说道。

这一瞬间他下定决心终生不娶。女人都会干些什么？那个农场主老婆的所作所为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他仔细端详着她的眼睛，想知道她是否懂他说的这话的意思，但结果却让他满心疲惫、满心失望——那双明眸中风情万种：有乞求、有深爱，还有温驯。她为什么不为自己活着？她为什么不发火、不推门而去？如果她真的那么做了，第二天他一定会再去找她。但她并没有发火，而只是静静地坐在他对面。她的胸脯一上一下轻轻地颤动着，手指不住地抓挠着桌布，但神情中流露出的脉脉深情使他感到不堪重负。

“我昨晚一夜没合眼，我送你回家，然后我要睡个觉。”亚历山大说。

她马上说不必送了，他应该好好地休息休息，第二天再来找他。她站起身，走到他身边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就走了出去。他看着她一身单薄的夏装，看着她那双大腿优美的曲线，目送她远去，然后长长地打了个哈欠，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每天早上，亚历山大都守在母亲身旁。他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憔悴下去，或许哪一天就会从他眼前逝去。陪过母亲后，他要在果园里好好散散步，然后才会想起要拉琴。他走进图书室，抽出那些两三年前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书，重又读了一遍。午饭后，他又要努力陪母亲说话，有时竟也能从她口中听到他的名字；而后是睡觉。他每次总是抓起一本书躺到床上，不一会儿便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夜幕低垂。这时丽娅会上山来，带着一罐她母亲做的加糖的红撒巴拉汤，两人便坐在阳台上聊起来。丽娅打算中学毕业后报考师范类大学。亚历山大却还未决定该干哪行，不过起码是不做提琴手的，尽管平时以此自娱。他或许会去海法工学院读机械，或许要做个船长。要不是被父亲的意愿所左右，他一定会马上登船扬帆，远航到哪个遥远的国度去。

晚饭后，两人上楼来到他的房间，然后锁上门。早在他回到家的第二天，她就告诉他，说她是他的妻子，从现在起直到永恒的未来，永远都是。至于他现在一点儿也不想结婚，那又有什么关系？在他长大成男子汉后一定会领悟到“生活的真谛”，一定会改变主意的。她愿意等，她不会去爱别的男人，这个决心是不会动摇的。亚历山大说要是那样她会不堪重负的，因为在他看来，他不懂该如何去“真心真意地爱一个人”，他只想在这个世界上无牵无挂地漂荡，一点儿也不想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他要像小鸟一样自由。至于朋友嘛，他早就有了两位至交——音乐和书籍。他还劝丽娅最好乘现在还早，好好想想清楚，给自己找个“好男人”。的确，他很喜欢她，但“那只不过是个巧合”，一切都没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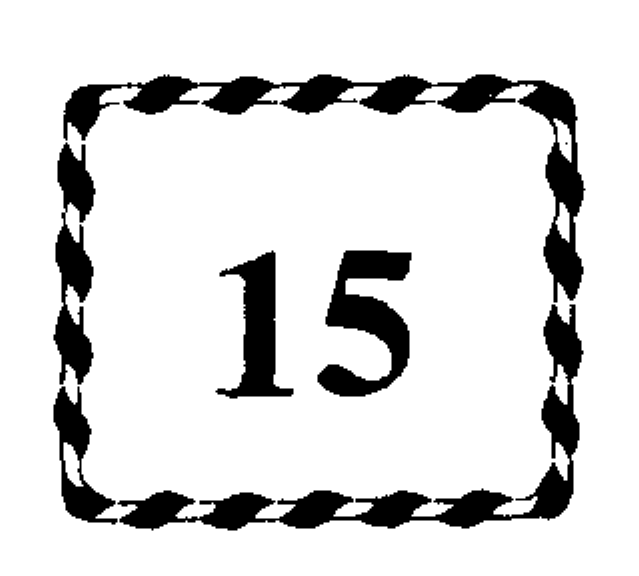
儿，而一个人是不能依赖这样的巧合过日子的。

她反复说，她相信将来一定会有别的解决办法，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他们俩了，不管他是否能察觉，她都属于他，他也属于她。说着这些，她就毫不犹豫地紧紧拥抱着他，爱抚着他的脸，深情地亲吻着他，激情荡漾，全身颤抖不已。当他伸手要去掀她的裙子时，她则说要等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时再让他那样，现在却还不行，请他不要去脱她的衣服，因为她是真心真意专注地爱着他的，将来一定是他的人，到那时也不为迟。于是两人说好，他们躺在床上时就合衣而卧，但为了防止弄皱她的衣服，被她母亲看出什么端倪，她要把穿来的衣服脱掉，换上亚历山大从他母亲衣柜里拿来的一条花边衬裙——当然，亚历山大得把脸背过去面向墙壁。于是两人就这样一起躺下，他穿一件衬衫和一条夏装短裤，她穿着那条衬裙。这件衬裙她穿着真是太大了，而且是全透明的，但这就构筑了一道屏障，隔开了现在和将来——将来解除"禁令"、一切都会不同的那一天。

她躺在他怀里，满心喜悦，如痴如醉，浑身抖动。她闭着双眼，在他身上狂吻着、抚摸着。亚历山大的双手在那件衬裙上来回抚摸，当他触到某些部位时，丽娅就会往后躲避，轻轻抓起他的手吻一吻，请他原谅不能让他如愿。她的确是一心一意想给他幸福快乐和款款深爱，但不能过早突破那道屏障。她的眼睛总是闭着，而他却是始终睁着双眼，有时，她身体的不停抖动使他回想起那夜在农场里殊死搏斗时的情景；但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注视着她的面孔，直到他发现躺在他身旁的不再是丽娅，而是另一个不相识的女孩儿，带出一幕幕影影绰绰而又似曾相识的幻像。

他似乎看见他正在环游四方，途经某处森林，这时突然从森林中迎面走来那个不相识的女孩儿；又似乎在某个夜里，在他父亲曾提起的某座城市中，他从音乐会或从某个餐厅观看完歌舞表演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却突然在某个街角又撞见她；又似乎是在苏黎士，要么在慕尼黑……在一幕幕奇怪的场景下，他总是与那个女孩儿巧合邂逅。但他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吃惊，因为他似已等了她好久好久，她的出现正是他长久以来的渴盼，而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

那些漫无边际的怪诞思绪渐渐平息下来，他所看见的又是躺在他怀中的丽娅。这个姑娘曾是他父母家人曾警告他不要接触的人。而过去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已变得如此遥远，不可追忆，他几乎要怒吼出声，而躺在怀中的丽娅正是这份怒意的矛头所向。可事实上她并没什么错，她没做错任何事，只不过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种象征，成了他所遭受的种种不快与委屈的象征。



暑假还有几天就要结束时，他父亲终于回到家里。父亲毕竟老了，说话时喉咙里总是嘎嘎作响；胡子老长老长，几乎全白了。亚历山大以前一直把父亲看成是一个粗犷的俄罗斯汉子，就像以前在俄国诗选插图中见过的那些地主一样。现在他发现父亲竟有几分像个犹太教教士，脸上一副沧桑伤怀的神情，却又说不清是积愤难平、还是令人敬畏的悲天悯人。他拥抱着亚历山大，好一会儿也不问儿子为什么早就告诉过他不要回家，却还是回了家。他独自走进英姬波的房间，直呆到夜幕降临。夜里，父子俩坐在

饭桌旁，父亲开口说道："瞧，我这不是回来了……"

几天后，亚历山大回到学校。

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一直盘问他为什么要仓促回家。但亚历山大一口咬定说，他只是要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

没过几天，大家伙纷纷谈论起农场里埋的那具阿拉伯人的尸体，谈论起农场主的被捕。那个农场主否认和这件事有任何关联，后来便被释放了。几周后，大家相信一定是亚历山大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他成了众学生中的英雄。他的舍友艾里直截了当地夸他："干得漂亮！"尤里则催他把这件事的详尽细节描述一遍，就像往常朋友之间那样。这时，纳曼解围说，有些事就算对朋友也是不能乱讲的。听到这句话，亚历山大决定过几天一定把一切情形说给纳曼听。

第二年年底时，这些孩子们一班一班地被编入军队，大家手持《圣经》和步枪，郑重宣誓加入哈加纳组织。亚历山大被任命为分队长。紧接着的那个假期里，他被遣往海法的一个犹太聚居区进行破坏活动。任务完成后，他回家呆了两天。母亲的病情并无转机，父亲老是在自言自语，偶尔还挥一挥手，就像在驱赶苍蝇。亚历山大呆在家里的那晚，丽娅来到他房里，穿上他母亲的那套衬裙。亚历山大告诉她，他已决定要做一名军人，到犹太人宣布建国时，他将会成为一名将军。

第三学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艘艘难民船从欧洲涌向巴勒斯坦，一路上尽力躲避、突破封锁线，但英军还是发现了他们，朝他们开火，船上的乘客全被押到集中营。有一艘船上的难民竟在海法港发生集体自杀，另有一艘被一枚炮弹击中，难民们死于非命。哈加纳组织号召其成员

抵抗英军，同时也要积极参加英军对希特勒的抗击。

“这样是行不通的。”亚历山大告诉纳曼，“他们应该坚决一些，要么同英军作战，要么就是加入英军，同希特勒作战。”

听到这句话，纳曼答道：“我们要抵抗英军，权当没希特勒这号人，同时也要抵抗希特勒，权当那些英国佬是友非敌。这是我们一位领导人说的。”

“噢，你可以告诉那位领导人，那样做还不如我们全都躲进疯人院里去！在我看来，这一切再简单不过了，我会同英军作战。”

亚历山大很快就被发现介入地下分裂组织的活动，被逐出学校。

约两年半后，当隆美尔率军杀向埃及、巴勒斯坦时，亚历山大重新加入哈加纳。他被编入一个尖刀小分队，执行军官们（其中就有纳曼）的作战命令，在加利利活动，以图“阻击德军，使澳大利亚军队有时间向叙利亚撤退”。亚历山大从纳曼口中得知尤里已在一次炸桥行动中丧生，艾里也在那次行动中失去了双腿。

当隆美尔在西部大沙漠中被击退后，亚历山大请假回到家里。一到家，他就发现他父亲身穿着一件毛织长袍正坐在钢琴边，但没弹。亚历山大询问母亲身体如何，父亲只是平静地说她已明显好多了。然而这时，她其实已经自杀了。她私下攒起一些药物，然后一口气全吞了下去。

他父亲说完那句话，便抬起左手在长长的一排琴键上从左到右扫了一遍，最后用右手在最低音键上狠狠地敲了下去，然后合上钢琴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瞧，就像这

个样子。”他抬起头看着亚历山大，又接着说：“就像这个样子。亲爱的，现在你失去了母亲，不久你又会失去父亲的。你几岁了？二十一？唉，我像你这般年纪时已经从理工学院毕业了。而你呢？想想吧，亲爱的萨沙，好好想一想吧。”

那晚，丽娅来到亚历山大的房间里，不再想穿他母亲的裙装。她一丝不挂地和他躺在床上，说从现在起她既要做他的母亲、又要做他的妻子。“你可以哭出来，阿历，像你这样的男子汉也可以为母亲而哭泣的。别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喂，抱紧我，好好哭一顿吧。”

亚历山大说道：“只有女人才掉眼泪。她们老是哭哭啼啼，甚至觉得那样很有趣。男人则不同，只为别的一些事情落泪。”

“是些什么东西，阿历？”

“音乐和文学。你不懂的，也没必要懂。”

她并没有生气。事实上，听了这番话，她只觉得有些想笑，但鉴于当时情景是那么神圣，她控制住没笑出来。她把头伏在爱人那宽厚的胸膛上，把贞操献给了他。在她看来，他并没意识到那天晚上他该有多难过。



大战最后两年中，亚历山大执行了一次又一次任务。为了以后能进入工学院进修，他在间隙和闲暇中积极地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他学会了组装、拆卸地雷，开始发现自己其实挺喜欢学化学的。他一心想要发明一种新式武器，用于对付英军，甚至能把英国人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

他四处奔波，常住在地下组织在各地的联络站里，还不时加入连队在约旦沙漠和内盖夫等地来回穿梭。对于他来说，无休止的劳神费力和无尽的奔波疲惫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每每在成日的奔忙后，他却睡不着觉，而是坐在野战帐篷的入口处，点上一支烟，仰头凝望着黑夜的尽头。有时，他会觉得有几缕弦乐四重奏的乐声隐隐飘来，有时又觉得冥冥中有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正对着他，他甚至觉得这张面孔伸手可及；有时他又会想起他的提琴，竟说不清此时自己为什么没能坐在山岗上自己那间房子里拉琴作乐，却坐到马路边上来了。当他总算睡着时，心里想的便是丽娅。他下定决心，下一次见到她时一定要告诉她，她实在看错了人，好叫她永远永远忘记他。他一边睡，一边在心里责备自己：我真应该真诚地对待这个可怜的姑娘；我应该让这一切永远永远地结束。他就这样躺在地上，一觉睡到天亮；偶尔会再补睡一会儿，却总是猛地一颤便惊醒过来。

奔波劳顿之后，也常有时间回家。在家里，他总是蒙头睡上整整两天两夜，然后又回到部队中，回到奔波中，回到骚扰英军英警的一次次麻雀战中去。

二十四岁时，他开始在工学院就读。但刚开始的第一年，他的学习就被打断。他要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他要随地下组织的采购团到意大利去。干这些他可是行家，他谙知颠覆活动所需的各种物资，而且通晓多门语言，这使他在与军火商们的交易中作用显得极为突出。

1948年，二十六岁的他在化工方面的知识已十分渊博。这时，英军撤离了巴勒斯坦，紧接着又爆发了争取独立的战争。他毅然离开工学院，成了一名军官，服役于几周内迅速

募集的军队。



独立战争结束约三年了，亚历山大仍在军中服役。但这时，他仍是不断从一支连队调到另一支连队，频频被遣往欧洲去购买军火，1952年的大半时间里他都在辗转奔波。一次在伦敦时，他收到纳曼的一封电报，说他父亲已不久于人世了。(此时的纳曼已是参谋部的一名军官，是亚历山大的顶头上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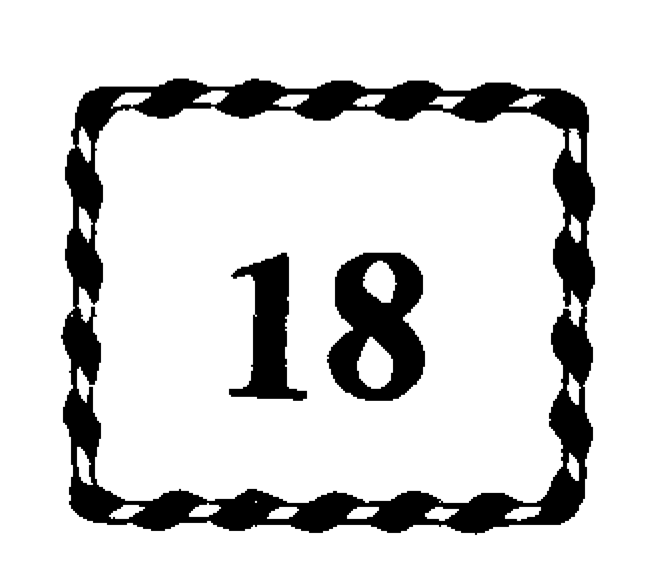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赶回家时，只见已年届九十的老阿浦拉莫夫正躺在卧室里那张双人床上，呼吸浊重，手却在轻轻地抚摩着一侧的另一只枕头，那正是原先英姬波用过的。

他真的爱她吗？亚历山大不禁自问。这时他心底竟忽然涌起一阵愉快的感觉，真是奇怪。他俯下身，吻了一下父亲的额头，手抚着他的脸庞，在他耳边轻声耳语，就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在那些日子里，父子俩沉浸在俄罗斯童话之中，他正要去睡觉，而他父亲合上膝上的书本，给他盖上毯子。他有时会轻声对父亲说："我爱你，爸爸！"他父亲总是微笑着把食指靠在唇上让他不要说话，然后就走出房间。

他真的爱她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亚历山大的血脉中应该也有那种温柔，而且这番温柔爱意应该在九十岁之前就能迸涌出来，找到爱的归宿。

他的手仍放在父亲又湿又冷的额头上。他不想移开，直至老人的最后一刻。那一刻间，他头脑中闪现出几个念头，这些念头虽然很怪诞，但却又很奇巧，因此他不加克制地继续想下去。亚历山大手上的血管中就淌着他母亲的血，他的

手抚着父亲，就等于送给了这个弥留的老人一份绝好的礼物——她的谅解，她的抚摸，还有他企图在身边那只空枕中探寻的东西——这时，枕头上的那只手慢慢地、慢慢地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了。



当亚历山大看到很久以来一直无人照料家产时，便离开军职，回到十六年前他十四岁时住的这所房子里。

亚历山大·阿浦拉莫夫继承家产时已是而立之年，而他先前从未在家经营过这些地产。接手后，他惊奇地发现，一个已届九十的老人生前竟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好与那些犹太工头、共产主义工人的关系，并使家族的柠檬生意安然渡过二战中的重重困境。但由于帐目繁琐，亚历山大对这些家产的经营状况无法了解，他只好勉强想了个办法：他解雇了所有工人，只雇了几个人临时看护树林，而他自己则坐在父亲的书房里，静候着从债权人、电力公司、化肥供应商、营销公司和合伙人那里将会雪片般飞来的帐单。这段时间里，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母亲童年时的像册，还有一厚摞文档，里面叠放着他父亲的森林学文凭，还有世纪初以来家族的买卖契约。他把图书室收拾整齐，把书籍和乐谱分开，按不同语言重新摆放；把一捆一捆的书抱到窗边，抖掉上面的尘土和蛛网。那个结实的大铁箱子，他把钥匙给丢了，只好从镇上请来一位锁匠把锁撬掉。在铁箱中，他意外发现了一小笔金币，有英国的、俄国的，还有奥地利的。箱中还有他无法辨认的记事本，还有他父母的结婚证。

这时，帐单陆续飞来。当他把这些帐目全加起来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想让他那些地产的运作经营有可靠的保障，就必须卖掉总数六十英亩地产中的十英亩。

镇子一直延伸到山的西面，还像他孩提时一样；但在东面，新房不断拔地而起，里面住着从也门、匈牙利、北非来的移民。亚历山大决定卖掉东面山坡上的十英亩地，这样，他家和老镇隔着的这一层屏障就不会受影响。

丽娅独自一人住在她母亲留下的房子里，在他们童年时就读的那所小学里任教，好几个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在校内会议上提出要辞退她，说她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个“坏榜样”，因为她与山岗上那幢豪宅的新主人——那个军官无夫妻之名，却行夫妻之实。但家长们总是为她辩白，因为这些农户相信，过不多久，这位女教师就会成为那座至今无人能亲近的深宅大院的女主人。

当亚历山大搞清楚他的地产的处境时，他告诉了丽娅，他决定卖掉东面山坡上的十英亩地。亚历山大口里叼着烟斗，丽娅透过缭绕的烟雾，注视着他那双眼睛，心里能猜知他在下决心出卖那些被视为珍宝的土地时心里是何等痛苦。丽娅知道一旦被迫打破那道屏蔽，亚历山大一定会终生抱憾，无法坦然度日。那么，除了她还有谁能分担他心中的千愁万苦？

“阿历，我倒有个主意。”她的心狂跳不已，就像他们初吻时一样。“你千万别卖掉任何一块地……其实，可以把我那幢房子，连同周围的地都卖了。毕竟，我也无能为力，不会经营这么一块农场，我渐渐地管不住那些佃农了。既然如此，不如一卖了之。”

三十岁的丽娅亲自抉择了自己的命运。亚历山大知道她风华正茂，大自然已赋予她很多很多，不会再有什么恩赐了。他不禁想起以前在军中接触的那些女人——曾钻进他军帐与他偷欢的小秘书；曾伴他奔忙于欧洲、一起住进旅店的女人；还有他战友们成熟而饥渴的妻子，因倾倒于他的年轻力壮，纷纷向他投怀送抱。他总是带着一种不露声色的厌烦，礼貌地等着她们快快走开，回到该回的地方去。他现在仔细想来，忽然发现那些女人竟是如此卑贱，不值一提。而只有丽娅不会让他觉得受烦扰，因为每当和她在一起时，从她走近身边的那一刻起，那个一直在他身边游荡的、隐形的梦中人就会从隐身之处现出形来，走近他，然后又退缩回去，并向他许诺一定还会再出现。

那年深冬，亚历山大和丽娅结了婚。

19

照估计，要恢复山坡上的这份产业还得花不少时间，因此亚历山大向纳曼递交了一份申请报告，想成为军方坦克、飞机发动机零部件的供应商。他在国外的关系网十分广泛，而且十分可靠，作为助理国防部长的纳曼应该不会拒绝他，只不过还要进行一次例行的审查。亚历山大的档案被提到三个人手中：一位社会学家，一位会计师，还有一位是情报局的参谋。亚历山大要想遂愿，得先由这三人提交一份审查报告。

亚历山大，三十岁。父亲：阿布拉姆·阿浦拉莫夫；母亲：一位矢志不渝的德籍基督信徒。身

高：189厘米。运动员身材，棕褐色头发，眼睛淡褐色，无遗传病史。（其母1943年自杀身亡被排除了遗传因素，经医学鉴定为抑郁症所致，诱发于她与丈夫间三十六岁的年龄隔阂以及与周围社区相隔绝的孤独感。）军事履历：表现良好，少校军衔。教育状况：曾就读工科，但无学位。曾在地下组织呆了一年（1941—1942），但与组织意见相左。拥有农业资产价值一百五十万以色列镑，经营状况恶劣，但可望好转；拥有现金资产约一万八千以镑。一个月前刚与一个小学女教师结婚。妻子家庭背景：农户出身；其父曾加入哈加纳组织。性格沉稳；她的财产在婚前就全部售卖以偿还她丈夫的债务。

本人性格、举止、习惯：长相英俊，性格冷漠。不曾散布奇谈怪论以蛊惑人心，但经常撰写稳妥而切合实际的报告。据估测，完全能经受住严刑讯问。在1948年运动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镇静沉着，对患难战友奋不顾身，冒死相救，曾因在伊拉克苏丹要塞一役中救出一位重伤的战友而被授予勋章。

生性喜好独处，不爱交际。1937—1941年在一所农校就读时加入哈加纳，此外在青年运动中没有其他资历。有良好的领导才能。在军界无明显的野心。家资殷实，父母从小就教他要与人保持距离。衣着十分得体、考究。他近两年来穿的便服都是在受国防部差遣出国时顺便购买的。总体上流露

出一派自然的英国绅士风度，内心上需要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使他能对所肩负的使命绝对忠诚，但他总觉得必须内敛这种忠诚，以期保留一份带几分孩子气的灵活的自由。从他的正直、荣誉和忠诚来看，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他既有浪漫的情怀，又有敏锐的现实感和独到的精明，这两种秉性相互抗衡、相互制约。但这并不能使他的生活更美满，却使他十分胜任在情报部门工作，也适合于那些需要奉献精神、严守机密和过人的胆识的特殊岗位。

小结：适合于任何机要岗位。性格独特，决不会背叛；家资殷实，决不至于盗用公款，这些简直可算是完美无缺的组合。

此人资料，别无保留。

纳曼看完这份报告后，对副官说："不知怎么的，我总是十分讨厌那些心理学家。这回可好，看看这些白痴都写了些什么！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十四岁那年起就认识了亚历山大。我倒是写不出一份比这更面面俱到的报告，但我必须指出，这些白痴所遗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的忧郁、绝不贪生，甚至对死亡等闲视之。但愿结婚后的他能改变改变。总的说来，他可真是个可怜的家伙！"

最后达成决议，亚历山大可以持外币到三个国家去洽购武器及配件。于是亚历山大和丽娅两人乘飞机来到西欧。这是丽娅第一次出远门，亚历山大陪着她在伦敦整整花了三天时间买这买那。当她提着沉甸甸的衣物、鞋、手提包、香

水、茶叶和巧克力满载而归时，他就要外出开始做自己的生意了。他让她自己在城里逛逛，痛痛快快地玩儿玩儿。

20

旅行归来，亚历山大在特拉维夫租了两间房子，并把他的办公室设在那里。他先是好好款待了一下那个被找来照看办公室的人；以色列设在欧洲的大使馆的几名陆军武官是他从前要好的同事，回想起从前的交情，自然很是照顾他；他把财产方面的事务交给一个复员军官——从前在农业学校里的旧友去办。

开始，每天晚上他都要赶回家去睡，渐渐地他留在特拉维夫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此，丽娅并没说什么。后来，他又把大提琴和一些唱片带到办公室，其中一间简直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很少拉琴，但几乎每个不回家的晚上他都要聆听唱片中美妙的旋律。通常与生意上的伙伴间的洽谈都安排在旅馆和酒店，工作时间之外，他不在办公室里会见任何人。

在山上的家里，丽娅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买了把刷子和一些油漆。在短短两周内，她亲手油漆了画室、卧室、书房和书房的墙壁。屋子外面的墙壁还保持原状，因为那墙上微微泛红的色泽并没有褪去，还依旧保持着亮丽的清新，恰好与房子周围果园中蓊蓊郁郁的树木融为一体。果园里有的是石榴树、无花果树和巨大的葡萄藤。在明媚的夏日里，凉爽的树荫遮住了足有四分之一英亩大的田园。

女仆和她一块儿清理了残留在地板上的油漆，房间里焕然一新，闪耀着微微发蓝的白色光泽，这时丽娅又把注意力

转向了衣橱。她翻出英姬波的那件衬裙，就是它，透明的绣着花边的衬裙，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衣橱底部的一个硬纸盒里。在盒子里她已经预先放入了从花园里采来的百里香、桃金孃和茉沃剌那的枝叶。

他们的儿子在金色的秋季里呱呱落地了；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又有两个女儿降生到这个家庭。

亚历山大在婚姻的头三年里频繁地到欧洲出差。每一次归来，他都要给太太带裙子、汗衫、鞋和化妆品，而丽娅却让他不要再买了，因为这幢房子都快赶上服装仓库了，里面的衣服多得足够她享用后半生。每次旅行结束，他都会去山上待一段时间，然后去特拉维夫的办公室，而现在他宁愿多在办公室花上几周时间，很少在家里住了。

他们婚后第五年，丽娅恢复了学校的教职，之后不久，她又参加了文化委员会、军人福利委员会、当地的妇女运动组织和南部民歌合唱团。山上的财产状况越来越红火起来。现在同丽娅住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人，一个负责照料家务，一个负责照看孩子。

寂静的深夜，她一个人守在空旷冷清的大房子里，开始攻读教育学的学位；如果时间不算太晚的话，她会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听一听他的声音，告诉他孩子近况如何，今天他们都讲了什么话。如果天太晚了，她就不愿意再打电话了，以免让他觉得自己在监视他的行踪。她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千百次地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因为从没有人对她说过假话。亚历山大从没对她说过谎，而她也从不愿意做使他撒谎的事。

他们六岁的儿子被送到他父亲三十一年前所在的那所小

学，这孩子知道他妈妈就在旁边的一间教室里上课。因此，上课第一天，当那些八九岁大的孩子们质问他是否真有父亲，他父亲在哪儿的时候，他逃也似地扑向妈妈的怀抱以寻求庇护。

当儿子十岁的时候，学校的精神病医师建议把他转到一个离家较远的寄宿学校，原因是他父亲经常不定期地出差，而当他突然出现在孩子面前时，就会打乱这孩子的生活规律，使他变得手足无措而富有侵略性。在寄宿学校里，他会习惯于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这对他来说是极为有利的。相比之下，稳定的生活对他来说比母亲的呵护更为重要，因为仅有母亲的呵护是远远不够的。就这样，他被送往一所寄宿制学校，据说那里有一位经验丰富、技术先进的心理学专家。



亚历山大只做了三年的军火和军用备件供应商，之后他就对此感到了厌倦。山上的产业已经开始有收益了。令他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短短一段时间里所挣的钱可以供他逍遥地过上好几年了。接下来该做什么？如何对待他和妻子的两人世界？这些并不使他感到头疼，因为他早就安排了满满的旅行计划，又给自己添置了许多奢侈的物品，有时拉拉琴，听一听音乐会或听唱片；然而远离了音乐，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更糟的是，音乐给他带来的感触与其说是一种喜悦，不如说是一种折磨。

今天，我打算给最近这段经历划上个句号。我要卖掉公司，如果军队还欢迎我的话，我将重新做

个军人。我渴望比经商更多的紧张与忙碌。以前有时回家去住，有时又离家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生活在我心中留下了可耻的阴影。一个又一个夜晚，我知道自己该回家去住，可是我留了下来，如果我的工作全都是在国外的话，也许我就不会被这些问题困扰了。

我也将会更靠近父亲讲给我听的那几个城市，因为在其中的一个城市里，我会见到“她”的身影。看现在的情形，她几乎忍不住要向我大叫：“你要是再不伸出双臂拥抱我，我就要以牙还牙，不理你了。”

我所描述的音乐具有三种境界的理论并没显示出任何真实有效性。假使我向学术界提出这个理论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会嘲笑个不停；然而，在我的内心世界中，它丝毫没有丧失其真实性，我越来越发现，我的内心世界与母亲临死前那段时间所感悟的东西极其相似。千真万确，最近我已经穿透了音乐最里面的一圈，而且在那里我并不是孤单一人。那女孩，披着深铜色长发，长着深棕色眼睛的女孩，正在第三圈中等我；我无法知道——一次又一次，我始终不知道——我如何从那里回归现实，恢复清醒和理智的。

总之，我已决定卖掉公司回军队去。如果他们不接纳我，我将另谋出路。

亚历山大变卖了公司，并向国防部申明自己希望作一名

情报部门的正式军官，理由是他的经验和多种语言功底适合在国外工作。况且从利益角度看，他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又不对经商和赚钱感兴趣。

起先他被派到面向阿拉伯国家的部门工作，1956年，当以色列又一次与邻国发生战争的时候，他由于审讯犯人和收集情报有功而受到表彰嘉奖。令他迷惑不解的是，每次与阿拉伯犯人或阿拉伯军人的密探接触之前，心中总是涌起一种强烈的渴望。在每一次会面中——在审讯室的气氛中或是在笼罩着田野和河谷的黑暗中——空中总是盘旋着那个贝都因青年的身影，那个和他曾在加利利的种植园附近搏斗过的人。似乎那个年轻人活转了过来，那场遭遇战似乎也要重演一遍。如果情况改变的话，谁知道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被他调查的阿拉伯人没有粗鲁地威胁说要干掉他或强暴他，然而他很清楚一旦他们有机会，他们会很乐意这么做的；当他和他们交谈而没有施刑之时，他可以察觉出埋藏在他们心中的恐惧、羞耻感以及绝望。这种恐惧会侵入他们的肌体，引起一阵可怕的痉挛。恐惧和至死不渝之间其实只有极微弱的差别。有了至死不渝的决心，即使相距遥远彼此互不相识，人们也能够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万众一心。

这些阿拉伯人，就因为落入我手中而被铐上枷锁，施以酷刑，忍受非人的折磨。他们难道不是曾在我家地里耕作的劳力；难道不是和我一起追逐野兔的阿拉伯人；难道不是阿拉伯母亲偷偷把我拉进棚子里，在我脸上布满热吻；难道不是阿拉伯妇女们最早告诉六岁时的我，说我长得很俊，当心被她们拐走，而现在我用电灯

炙烤她们的儿子们，用心灵的折磨来回报在我儿时她们所带给我的母亲般的慈爱？

我并不是在道歉，因为阿拉伯人现在极度仇视我们，而我只是在尽我的所能。然而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和一个阿拉伯人的交情被我回报给了十个美国的、英国的或法国的朋友。同一个欧洲人在一起，我们喝威士忌，谈生意，并一致认为以色列实际上是欧洲向东的延伸；而同一个阿拉伯人在一起，我会又一次回想起在庄园的泥土里打滚，闻烧羊粪的味道，拣起百里香嚼在口中，撒着欢儿跑向地平线找寻自己的童年的情景，那时的我或许也是在找寻生命的意义——而现在的生活几乎漫无目的——就在我度过童年时光的那座山上。



大约一年以后，亚历山大被派往国外工作，自此他在那儿工作了大约十二年，每年只回以色列几次，而且都是在工作需要的时候。回国的日子中有一部分是在他任职的部门中度过的，余下的在山上的家中度过。在其中一次回国暂住的日子里他听说了精神病专家建议他把儿子送出读书的事情。

我父亲年老的时候也是这样把我送到寄宿学校的，那时他遭受着严重的打击并感到绝望，他的妻子在他臂弯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六个年头。可是现

在我妻子除了由于孤寂，或在恐惧和愤怒面前才咬紧嘴唇，以免叫出声来外，其他一切正常。而在这种情形下我却要对我的儿子做同样的事情；我肯定是疯了，在这豪奢无度的疯狂之下隐藏着我这样一个父亲，会忍心让自己的儿子远离家园，被别人束缚住手脚做牺牲品。我无法使历史车轮倒转，即使我能做到，又能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当有一天我儿子听到别人讲“你父亲自己想死，所以他不知道怎样活下去”这样的话时是否会露出一丝笑容。如果他很明智的话，他会这样说：“如果我父亲如你所说，为什么他不在生我之前就离开这个世界呢？”

有时，在他滞留以色列期间，他被指派帮助审讯一些嫌疑分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一名希腊男子被带到他面前，据说他是研究地中海历史的博士。这人被怀疑同一个援助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的传教士有来往。这是毫无根据的。而在这次谈话中，亚历山大头脑中挤满了久远的回忆——几分喜悦，几分忧愁——都是因为这个希腊男子谈起了地中海人民的复兴，以及古老文明会很快复苏；他还提到晚上要去听莫扎特四重奏，这简直使亚历山大一阵冲动，几乎要摘下审讯时必带的墨镜和毫无意义的假胡须，甚至差一点儿脱口而出：“来吧，我们一道去听音乐会，路上多给我讲讲有关地中海复兴的事情。”然而，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用威胁的言辞恫吓这个希腊人，警告他如果再不坦白他和那传教士之间的真正关系，他们会报复那传教士；只有在他们分手时，亚历山大才不顾约束和限制，同他刚刚审讯过的人握了

握手。墨镜和伪装使他可以比较自由地袒露心中的想法，稍稍放松一下自己。

那段时间，亚历山大忙于来回的旅行和探家。一会儿是在欧洲的办公室里听唱片，一会儿是看望对自己的热情拥抱越来越惧怕的两个女儿，以及变得越来越陌生，虽然身材依然丰满，但表情却严肃冷漠、一脸疲惫的妻子。是妻子操持着这个家，这个年久的大宅子，而这宅子现在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发泄仇恨的对象了。无论女主人如何盛情邀请她在不同组织结交的朋友到这里召开会议，也没有人乐意来。



1967年以色列军队占领了整个约旦河西岸，包括耶路撒冷古城。尽管那一年忙于出国办理业务，亚历山大还是尽可能地在以色列多呆些日子。有时他会去占领区，从那里到阿拉伯人的村子里去看一看。每当这时候，他眼前的时光就像停滞了一样。他常在小村庄的咖啡屋里和当地人无拘无束地攀谈，互相讲述一些阿拉伯传奇和寓言，有些故事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有些则是淫秽色情的。同这些阿拉伯人交谈没有任何困难，他心中也很感激他们，是他们帮他找回了自己早已丢失、而且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

他那身带着异国情调且看上去显得很高雅的服装，使他很引人注目。他在耶路撒冷走街穿巷，不时同身边经过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传教士交谈，有时坐在卖纪念品的铺子里和老板喝杯咖啡，晚上就在修道院旅馆里租一个房间。他觉察出，阿拉伯人总是拿不准他是以色列人还是外国游客。正因

为如此，他总是小心地用随身携带的外国护照在旅馆里登记，还告诉别人说，自己年轻时曾在一所欧洲大学里学习阿拉伯语，还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那段时间来过这里。这个毫无恶意的小把戏竟然使他感觉跨越了时空，跨过所有他想从记忆中抹掉的日子，走进了他在山上家中的庭院，回到了他下山去以色列定居点之前的那段时光；也使他回忆起那些让他心碎的件件往事，从他给室友们分发巧克力到他不光彩的对待丽娅的态度。那些被亚历山大作为交谈对象的人们对他的忽然到来惊恐不安，而他对这些人却心存感激。

他不时地把钱塞给淌着鼻涕的小孩子，把自己从商店被迫买来的铜制和银制饰品摘下来，塞到进城卖蔬菜和水果的农妇手里。他们总是满怀感激地追着他，将一串串的葡萄塞到他手里，吻着他的手，嘴里还不住地祝福他。他继续在那些穹形的屋檐下走着，手里拿着一串葡萄，可是心中却和他们一样既充满敬畏又带有警觉。

他心里很清楚，当天晚上或是一两天内，他就要回到特拉维夫，成为这场刚刚打过的征服战和加重这一耻辱行径的一分子。然而，在各个被占领土上的闲逛与在特拉维夫的军职之间有一道他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竟允许这两者泾渭分明地存在着，而且让它们如此存在下去对他来说并不费劲。长久以来，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鸿沟的存在，只不过现在它显得更清晰，更加不可逾越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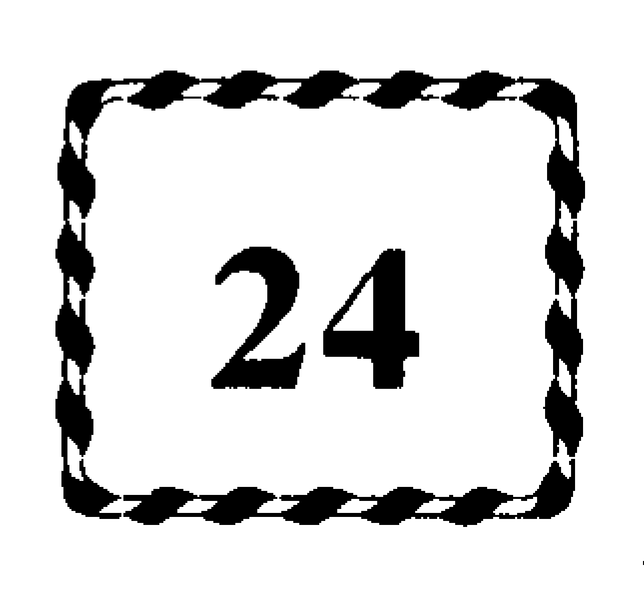
我是谁？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已经很容易回答了。从前曾属于我的个人经历现在成了大家共同的经历。以前，我是惟一一个和阿拉伯人在河床上殊死搏斗，为了

胜利不计后果的以色列男孩。而现在呢，所有的以色列男孩都在做这样的傻事。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清楚这一点，但大家都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他们既获得了胜利，又遭受了失败。他们拼命厮杀、互相暗算，而现在呢，受害者和获胜者都会渴望对方，然而历史不容倒退，因为一方已经被另一方杀害了。确切地说，是双方都被杀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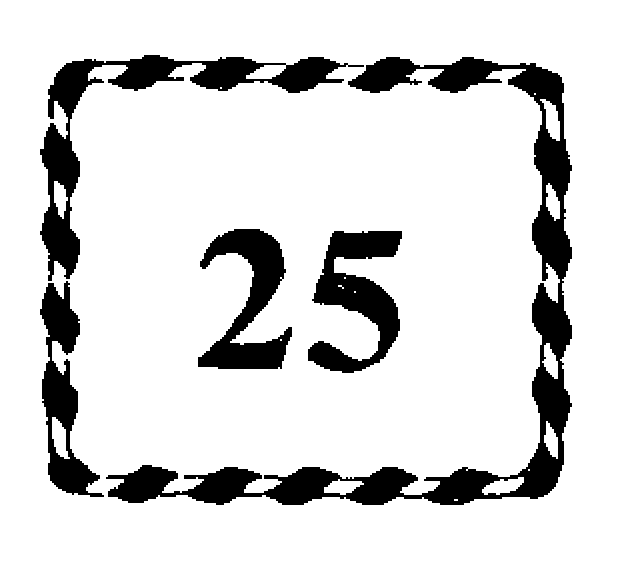
在死去的人们死而复活之前，一辈辈的人仍要遭受这样的命运。只是在这几天，当我能够重温往昔——实际上仍像在梦中一样——我感到自己好像得到了新生。可这只是幻觉。我要回去取代那个被我杀死的男子，死去的本该是我。因为我既是一个过去的人，也是个未来的人——但不是现在的人。将来，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可能他们不会穿着从伦敦买来的衣服；他们可能戴着塔布什帽，或者头上围着阿拉伯头巾，扣着绳箍；他们不说俄语、德语，也许讲的是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利凡特人将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他们有着灰色的双眸，乌黑发亮的头发，讲话时喜欢做手势，激动的时候还会大喊大叫，而这一血脉将从我这儿传下去。我是第一代，不管我喜欢还是不喜欢。然而就在这种时候，我却出于对未来的考虑，接受了上级的提拔——就几个星期前的事。

很快，他就不得不去欧洲工作了。一年后，当他再次回到以色列时，他的兴致已经消退了；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早就没有了最初的慌乱和手足无措，他们开始在大街小巷，

在村子里，向大批的犹太游客投掷手榴弹，在市中心埋下地雷；未来和过去一起躲到了它们的隐蔽之处，在充满硝烟的现实中打量着自己的荒凉与孤寂。只有那些有远见的人才会偶尔回顾一下过去或展望未来，而这些人的数量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一天，就是他四十一岁生日的那天，他将租来的车停在被雨水泡得湿漉漉的、位于伦敦郊外的广场上，换乘巴士进了城。当他一屁股跌坐在他来到的第一个空座位上后，便闭上眼睛，心情忧郁地思考如何过他的生日。汽车在下一站一停车，就将他颠醒了，这时，他看到两个姑娘在他前面的空座上坐了下来。左边的姑娘头发呈红棕色——闪着金光的深红棕色。她柔滑的秀发用一条黑丝绒发带拢在颈背后，并将发带打成一个十字形的蝴蝶结。那条丝绒发带，也像她的秀发一样，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一股只有在未经人手触摸过的物体上才能感受得到的纯洁的清新之气。如此精心打此发结的人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四十一岁的男人在心中老犯琢磨。因此，他要等她转脸对着她的朋友时瞧一瞧。及至她转身对着她的朋友，他看清她的面庞时，他张开嘴巴，几乎叫出了声。这一声是不是已经脱口叫了出来呢？好在不管怎么说，车上的乘客并没有发现。



从亚历山大得知那女孩儿的名字和地址那天起，他就开始用打字机给她写匿名信。过了一段时间，他建议她把回信送到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那个邮局的邮件待送部。他告诉她署名用“法朗兹·卡夫卡”。

她的回信简明扼要，略显好奇和惊讶。她回信的原因是出于礼貌和不谙世事，而在她的信中却丝毫没有要发生什么奇迹的预兆。还有几个月她就要中学毕业了。亚历山大时常独坐在她家对面的咖啡屋里，透过窗户玻璃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有一两次他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还故意和她走了个对面，可是她并没有注意过他。不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他都不停地给她写信。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年。终于，她的信使他梦想成真。她已经能清楚地在心中勾勒出他的性格，并且确实很喜欢自己幻想中的这个形象。自从第一封信开始，亚历山大就送给她一些莫扎特作品的唱片。他的猜想是对的；她很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在亚历山大看来，他们之间的纽带已从无到有，越来越真实可信，并且基础牢固。

在他们通信的第四个年头，希娅大学毕业之后，亚历山大得知，她要和一个名叫基·阿的英国男孩结婚了。亚历山大不只一次地在希娅家对面那间咖啡屋里见到这对年轻人。有时亚历山大会坐得稍远些，倾听他们片刻的谈话。基·阿有一辆极其标致的兰波瑰尼牌轿车。就在他们要举行婚礼的一个月前，亚历山大想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办法。他在咖啡屋里碰到基·阿，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且告诉他自己正要买一辆兰波瑰尼牌轿车，不知道基·阿能不能借他开一会儿。基·阿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有一张年轻人的脸，柔滑的头发搭在他那苍白而光滑、又带点儿女孩子气的前额上。他手指很长，也很灵巧，眼睛像清澈湛蓝的湖水。他那身打扮活像个证券经纪人。而他的言谈举止完全合乎昂贵的公立学校的行为规范。他讲话带有牛津口音，矫揉造作，鼻音很重。亚历山大实在看不出希娅为什么竟愿意嫁给他。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责怪希娅。在努力理解和揣摩了希娅信中字里行间的意思后，他开始相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应该受到责怪的是自己，如今亚历山大明白了要不是自己既不向她求婚，也不与她见面，希娅就不会如此感到绝望，甚而至于抗议。想到这些，他于是决定要想办法把希娅从她自己和那个无法给她幸福的年轻人手中拯救出来。

亚历山大和基·阿在公路上跑了一阵子，来到一个酒吧。到那儿之后，亚历山大问他能不能看看车子的引擎，他一边查看发动机，一边调松了几个线路的接合处，使它的连接程度刚好够跑几百米的路程，过了这个距离，车子就会自动松动并发生事故，这是一种早已被验证过的有效的办法。

在亚历山大俯身查看引擎的几秒钟里，各种想法在他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但他都很快否定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知道基·阿的死期将至而加速了大脑思维；相反，他一点都不可怜这个年轻人，在他眼里，基·阿愚蠢至极，根本不懂如何去爱希娅。使他重新考虑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他总是清醒地认识到他将永远都不可能与希娅相见，向希娅正式介绍自己。尽管他有时相信年龄的差异并不能阻碍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他很明白事态将如何发展：一旦情报局知道他在伦敦有个情妇，并准备为她而抛弃妻子和家园，他就会被立即召回，而

且永远不会再允许到海外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他只有一种选择，惟一的一种——那就是把一切都留给丽娅和孩子，离开以色列。而这种做法会切断他和情报局之间的所有联系，即使他想在欧洲谋一个供销商的职位，以色列方面也会断然拒绝的；他将不得不去做他从未想到要去做的事——一切从头开始，就像他父亲当年在比他大二十岁时所做的那样，只是他并不像父亲那样精力充沛。很长时间以来他按照自己的习惯，靠着已有的财产生活，没有这两样东西，他只能两手空空去见希娅。那时候，他所拥有的就只有过去的经历了，这经历有点像安得斯将军队伍里的一个波兰军官，他住在伦敦，心里恋着一个英国妞，满脑子罗曼蒂克，终日泡在墨顿的俱乐部里，把时间耗费在推杯换盏之中。

亚历山大一边检查着兰波瑰尼轿车的内件，一边在心里想，我干掉这个傻瓜有什么意义呢？

亚历山大手忙脚乱地把刚刚拧松的螺丝拧紧；突然之间他觉得双膝发软，想躲得远远的。既然他已经把基·阿当成自己生命中的一个牺牲品，他就忍不住想看看他的脸，他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要马上进城去，因为他有个约会已经迟到了，所以他想叫辆出租车赶去。

他俩在酒馆里分了手。基·阿开车进城去了。出租车过了十五分钟才来。亚历山大乘出租车走到半路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前面的路已经被警察、救护车和其他受阻车辆拦住了，前方出了车祸。

一辆白色的兰波瑰尼轿车静静地躺在排水沟里，亚历山大从不远处张望，他看到路旁有一滩血，担架上基·阿的尸体正被抬上救护车。我并没有犯罪，亚历山大自言自语道，

我没干，是这个蠢货自己不会开车。是他发疯似地开快车进城才出了事。希娅正等着他，他肯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26

希娅受聘于一所位于肯特的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基·阿死后，她给亚历山大的信中的语气显得温情脉脉。如果他想从中发现什么的话——他确实非常想——他可以在信中发现一种渴望，一种热切的期盼。希娅和亚历山大正处在同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他们只有心灵的交融，没有肉体的接触。至少对希娅来说是这样，而亚历山大则愿意亲吻她的封封来信，然后紧闭双眼。

他赶到肯特，在旅馆里找了个房间，余下的时间他常去希娅所在的那所大学里闲逛。有一天他还看到希娅独自一人在一片榆树林里散步。

这以后他去了马德里谈生意。然而，当他正在咖啡馆里等一个代理商时，两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立刻被送往医院；然后又被送回以色列，之后几个月内他又恢复了健康。然而由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在国外呆下去了。他据理力争，说如果没有他的经验和关系网，那份工作会搞得一塌糊涂。他自己建议动一个整容手术，可是上司一口回绝了。

这样看来，很显然他无法再去欧洲了，单就工作而言，他今后将无法从事地下工作了。上级要求他写一份保证书，申明如果他要到国外去做私人旅行的话，他必须带上胡须，以便伪装。

此后，他在给希娅的信中隐瞒了实情。

我已经有十个月没给你写信了……十个月前，他们向我开了两枪。两枪皆中……我们有医术高超的医生，他们为我缝合了伤口，但从我职业的角度讲，我的身份已经暴露……而为了能继续从事我的工作，我就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永远改变我以前的面容，……现在我能答应你几年以前的请求了。此信中的照片是我约一年前的模样。

本月最后一天我会去你的家乡，你可以经邮局将信转给我。和以前一样，你在那天下午五时仍是呆在省城的大学里。

他打电话给一个在伦敦的朋友，请他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取一封信，并把它寄到特拉维夫。希娅在回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人儿，你也许是我惟一亲爱的人：

七年过去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你的面容，而现在的你却已面目全非。你可曾理智地想过，正如别人讲的那样，你让我受了多大的痛苦。

你现在换了张面孔，但我确信他们不会动你的眼睛——你不会让他们毁掉你的眼睛的——我便能通过你的双眼辨认出哪位是你。求你再次在街上与我擦肩而过吧，就像你说你多次做过的那样。我会叫住你，让你相信我真能毫不犹豫地认出你。我会趁你不备扑到你的怀里……

像豹子的猎物一样，我是属于你的，

希娅

他反反复复地把她的信读了几遍，头一次察觉到他和希娅相见是可以办到的。这样的话，现在已经是最后摊牌的时候了，而随着最终的胜利，接踵而来的也许会使他彻底失败。他一点都不怀疑希娅最终会扑向自己的怀抱，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或许他除了轻挑的样子之外，不会带给希娅别的什么了。这个舞曲中——他已经准备好了要跳的——他将踉踉跄跄地跳到终了。

就在他准备与他的天使相会并最终被这致命的拥抱挤碎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他带上新做的胡须，奔赴欧洲，在出示护照的时候，他犯了一生中的第一个错误，出示了随身所带的三个护照中不该用的一个。就这样，他被带去接受审问，然后是搜身，结果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支上了膛的左轮手枪，他马上被监禁起来。



在狱中，他耐心等待着审讯，期望早点被英国驱逐出境，然后，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与希娅会面上。他深信自己从第三国回到英国并无多大困难，无非是换一个护照，把胡子弄短或弄长点儿罢了。在狱中这几个月几乎成为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

希娅呢，因为被他信中的话搞得忐忑不安，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有什么地方不对，请原谅我，原谅我接下来要提的这件可怕的事，我只想问问而已，况且是你把我引到这个问题上来的。

我一直在琢磨你对我洞察能力的赞赏。你夸我把你的眼神分析得很在行，同时，你又说感到幸运的是我没因此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

告诉我，请老实告诉我，因为我总是虔诚地相信你信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告诉我，你是不是和基·阿的死有关？

亚历山大没有接到这封信，自然也无法从监狱给希娅写信。当时光逝去，希娅没有收到他任何回音的时候，她又继续写道：

不幸的人，我可怜的受尽煎熬的人：

我情愿永远不把这封信放到信箱里，只要你给我来信。六个月很快过去了，你为什么仍杳无音信？请你不要消失，我求你。让我了解你内心在想些什么，也许我能跟你走；也许我会离开你，把你的信撕个粉碎。你不该这样对待我，我不是什么办公室，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将要度过她第二十六个春秋的女人，你为什么要我付出如此多的代价？

我从不怀疑你的爱，但这种爱对我太不公平。我倒像是你的遗孀。你无权去死，也无权保持沉默，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

这封信最终也没有到达他手中，当他从监狱出来，被驱逐出境时，他下定决心，要为这最后一次旅程准备好一切必要事宜，在他最终站到希娅面前以前不再写信。不过在这之前，首先要把胡子刮掉。

一个月之后，他从都柏林飞往英国，立刻同伦敦的老部下联系上了，他把自己从银行里拿到的和抛售股票所得的钱都带来了。而且因为他永远也不回去了，以前的工作更用不着再费什么神。他编了一个极为逼真的故事讲给老部下听，并请他帮忙收集关于希娅小姐的有关信息，他告诉老部下希娅在肯特一所大学教西班牙语。大约两周后，他收到了下面的一份汇报：

> 你打听的那个美人儿住在 6 号宿舍区 14 号房间。就在不久前她还是孑然一身，同事们都喜欢她，她是一位好教员。大约一个月之前，她和一个马德里来的讲师之间萌发了一场旋风式的罗曼史。男的名叫尼科斯·特里安达，大致的情况是他们两个都深深坠入情网。马德里来的这个访问学者大约有三十八岁，相貌堂堂。您的这个女教员的父母在伦敦很富有。阿历，如果这就是你想找的有关她的情况的话，祝你成功。不过，说老实话，你来的不是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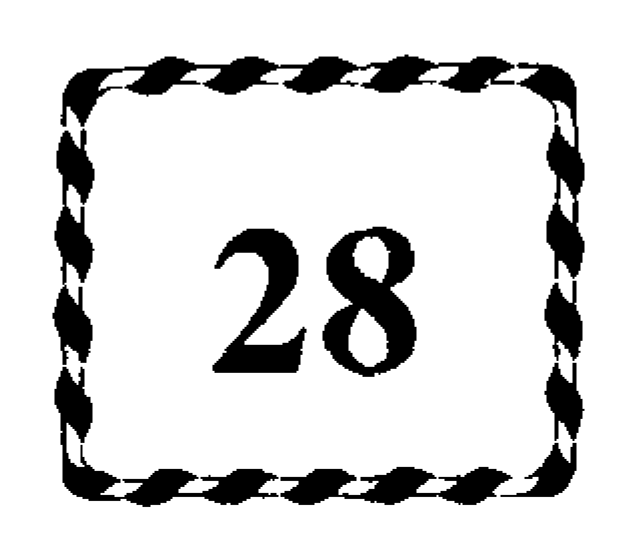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赶到肯特，因为他对校园很熟悉，所以当天直奔办公室去找尼科斯·特利安达。别人告诉他，他现在不在校园里。但是他们给了亚历山大一个电话号码，亚历山大就地在办公室里挂了个电话，约他第二天中午在镇中心一家餐

厅里吃饭。他说他很想得到一份去马德里大学的研究名额。

在离开办公室的路上，他在走廊里看见了希娅，她正向两个学生走去——这一男一女——腋下夹着一个文件袋，脸侧对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慌忙躲进园子里，并从那儿回到旅馆。

> 我没有改变我的任何决定。（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把身后的桥全都烧掉了，前方的路无限宽，我将勇往直前。我知道监狱里几个月的快乐时光和八年间另一种快乐的感觉已经过去了。
>
> 现在是我为快乐和幸福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尼科斯·特利安达，毫无疑问就是十二年前我审讯过的那个希腊家伙。我那时该干掉他，而不是现在。如果我那时把基·阿的兰波瑰尼车上的螺丝拧紧了的话，现在我会看到一个离了婚的希娅，她会一如既往地跟我走，或许欲望会更强烈。明天我就会见到特利安达，可是我还没想过该拿他怎么办。这种把戏只能做一次，不应该再来第二次，特别是在就要成功之即却失败了，或者压根就没成功的时候就更不能再玩这手儿了。

这事儿其实到这里该画上个圆满的句号了，可亚历山大·阿浦拉莫夫却在这时候跌了个大跟头。



亚历山大比约好的时间提早十分钟走进餐馆，靠在墙角的椅子上等待尼科斯的出现。他第一眼看到尼科斯时，他肯定这就是那位曾因与耶路撒冷旧城一个传教士有联系而受到讯问的那名男子。

亚历山大介绍说自己叫吉奥·米兰，并为自己在他休假日打扰他而抱歉。亚历山大自称是从某个熟人那里得知他这位来自马德里大学的讲师的，所以就忍不住相邀，打算与他结识一下。

吉奥·米兰先生还说他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古代腓尼基商贸之路的研究，因为他得在西班牙和北非沿海一带逗留六个月，不知道能否有机会得到马德里的资助。

尼科斯·特里安达很好奇地盯着米兰先生的脸，而亚历山大早有觉察。然而特里安达并没认出他来，而是满腔热情地说，这个课题使他感到很亲切，尽管他在经济研究方面并无造诣，但只要是和地中海这个美妙、神奇的地域有关的，都能激起他的兴趣。

而后，亚历山大听到了十二年前一直渴望从特里安达那里听到的东西，而现在，这些已经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致了。在他眼中，特里安达是个性格开朗、讨人喜欢的人，凡事喜欢刨根问底，带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好奇心，而且总是兴高采烈。亚历山大一直没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又一次对自己说几年前就该把他干掉，而现在他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提了个建议，说他们两人很有必要再见一面。尽管他无望在马德里获得资助，可是他们有这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可谈。或许特里安达会同意再会一次面？他的车坐着很舒

服，他俩可以在下午开着车到附近的海滩去——尽管那里不是两人所热爱的地中海海滨，可那至少是在海滩，他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找个小酒馆一起好好聊聊。

特里安达说他很乐意这么做，只是这个学年马上要结束了，过不了几天他就要永远离开这儿了；事实上，他笑着继续说道，他要和另一个人一起走，这个人也许会改变他今后的生活。米兰先生作为一个男人，当然清楚他指的是什么，对他歉意地婉言谢绝邀请也没生气。尽管学校所给的基金很可怜，可如果米兰先生愿意自费去西班牙的话，他们一定会再次相见的。“这是我的名片，”特里安达说，“如果你来找我，我会非常高兴的。”

然后他们就分手了。晚上，尼科斯向希娅讲起今天碰到一个人与他有相同的梦想，甚至那人的外表都表现出一种古地中海人特有的风范；他蓄着雅典人一样的大胡子，有赫丘利般魁伟的身材。希娅说她肯定在学校的走廊里见过此人，当时她也注意到了他的身材和胡子。但她并不认为他有赫丘利那般健壮，因为他离开走廊时，踉踉跄跄的，差点儿摔倒在门口。希娅那时想，这个人可真是一副老态。

亚历山大回到了伦敦。当希娅和尼科斯抵达伦敦的当天，他看到他们从车中走出来，径直走向她父母的房子。亚历山大当时正坐在她家对面的咖啡厅里他时常坐的那个座位上，也就是已故的基·阿家楼下。

接下来的三天他都坐在那里。午后希娅家的窗户总是开着，透过窗子他几次看到她母亲的身影在屋里走来走去，绕着饭桌忙个不停。他还看见希娅和尼科斯手挽着手走出家门，每天至少两次。有一回他想尾随在他们身后，心里很怕

被尼科斯发觉。但他的功夫白费了，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走了。大约三小时后，他们又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亚历山大看到在楼门口，希娅踮起脚尖，仰起头吻了他的唇，然后两人并肩走进屋里。

他口袋里有支左轮手枪，上好了子弹，还装上了消音器。他坐在咖啡厅里一个临街不远的位置上，外面行人的衣服常会擦着这小店的玻璃窗，而这时他会抓起面前的杯子轻轻呷一口，然后任凭自己陷入无边的遐想。他记得契诃夫这样描述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一出戏的第一幕出现一把左轮枪的话，它一定会在第三幕时打响。"好吧，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亲爱的安东·巴浦洛维奇，亚历山大嘟囔着。一把左轮枪可能在第一幕出现，而且走火，可它仍然会是一场很值得上演的剧目，一场悲喜剧，它从各个方面讲都完美无缺，值得那些文思巧妙的作家去大书特书。

他就这样让思绪任意驰骋。当他感到再也没什么别的可想时，思绪才回到现实中来，开始想他和希娅的事。他忽然想到和他们见面前应该写最后一封信给她——应该就在今天，最迟也不能超过两天——他要赶在尼科斯把她带走、一切变得无法挽回之前写。他们需要有一份证明材料，来证实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在她亲眼见到他之前，她还只是通过信件了解他，因为到那时候——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们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或许他还该给丽娅和孩子们写封信，但这事得先往后推推，他要先给希娅写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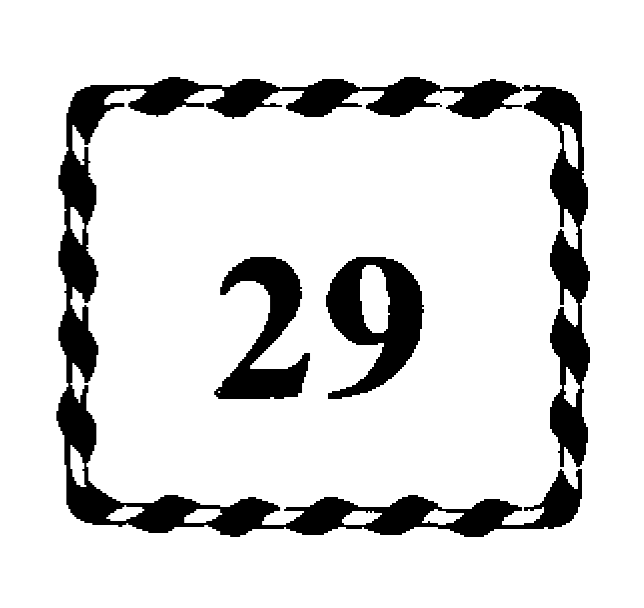
我内心从没怪罪过你，而现在我们终于就要见面了。也许你将属于我，只属于我，而不属于先前可怜的

基·阿，也永远不会属于现在这个得意扬扬的特里安达。我相信我们会见面的，而且不会等很久。你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错事，一次也没有，我纯洁可爱的小天使。是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该受责备的应该是我。我总是犹犹豫豫，总是武断地我行我素。我是个胆小鬼，一个可悲而又可鄙的懦夫。那个在没遇到你之前就已知道你的存在的人，理应伴你一生，长相厮守。可是我在半途中却懈怠了，歇了一会儿，我在路上留下了痕迹，我害了那个从六岁起在学校板凳上就与我命运相系的女人；我有一个儿子，他要是听到我的死讯一定会欢呼雀跃，还有两个女儿，她们也不喜欢我回去打乱她们孤儿般的生活。在特工亚历山大·阿浦拉莫夫的档案里将会这么写道：他的下场足以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简直就是个叛逆。在我那座山岗上的房子里，当我的死讯传到时，丽娅会从抽屉中翻出我残缺的日记，她会去读，但她不会懂上面写的是什么；然后她会找出衣柜底层的纸盒子，找出珍藏了十几年的衬裙，找到里面夹带着的、她自己从园子里采来的香草；然后她会把我母亲的花边衬裙贴到胸前，自以为在充满浪漫爱情的青春时代曾归属于我和这个家。但她怎么也想不到，在英姬波、阿布拉姆和亚历山大各自划出的自我保护的圈子中，根本没有她的一席之地。他们就这么围护着自己，直至生命终结，悲惨地死去，就像天上孤独的寒星，没有人发现他们，更没有人想接近他们。

但你和我，希娅，我们已走出了这片可怕的阴影，不管以前我们怎样，因为我们相会在我儿时被迫离家和

寻找归家途中所划出的内层圈子中。在这第三层圈中，在音乐精髓所在处，在恒久而惟一的圣子面前，我们融为一体，在光芒中燃烧。这光芒绝非肉欲点燃，相反，是我们的爱将我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爱远远地超出了人的自爱。

令人悲伤的是，我永远无法知道当一个人走出这层圈子而且发现你就在他身旁时，他会是何感觉。我只能这么猜测：当他深情地注视着你的双眼，并用他的双手抚摸你的脸颊时，他肯定能感觉到他们能找出回到最内层圆圈的路，他可以通过这条路自由出入那个圈，直到自己死去。死后他将永远呆在那里，也许不是孤单一人。如果你在我身边，这一切是完全有可能的。希娅，现在你真的和我在一起，这便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就在亚历山大坐在希娅家对面的咖啡屋里守候的第三天，一年前曾在马德里朝他开了两枪的那个人也来到这个咖啡屋，因为他知道在这儿一定找得到亚历山大。他手里捏着一张亚历山大带着假胡须的照片。

这个人朝亚历山大走去，朝他开了枪。

希娅、她父母和尼科斯正坐在起居室里喝着茶。他们一听见枪响，立即放下茶杯，站起身来朝窗外望去。

第一枪击中了亚历山大的胸部，穿透了肺，他抬起头张开嘴大口喘气。时间仿佛凝固了。亚历山大看着自己的身体，他仿佛是竞技场上的角斗士，受了致命的重伤，好像被

施了魔法一样，他开始慢慢地变成一头又大又蠢的怪兽，长着野牛或雄鹿一样的大脑袋，但肩以下又仍是人身；接下来，就像儿时家中墙上所挂的那幅毕加索的蚀刻画《沃拉德·休特》中画的一样，他看到希娅从阳台上探出身子，仿佛要触摸他垂死的头颅。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时间凝固了，他看见希娅正站在窗边，她的手在空中飘荡，缓缓地飘过街道，飘过响着喇叭的汽车，穿过惊慌失措的人群；她那洁白的手，五指叉开，像鸽子的翅膀——就是他曾抓给阿拉伯厨师的鸽子中的某一只——掠过长空，越来越近，马上就要触到他的前额，与他融为一体。

这时第二发子弹射了过来，打穿了那只冰清玉洁的、马上就能摸到他前额的手。亚历山大祈求她原谅，他，再也挺不住了……

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停在咖啡屋门口，司机和助手抬下一副担架，挤进店里，过了一会儿，他们抬出了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第二天，希娅看到了报上登的照片，尼科斯也看到了。他恳求她一定要活下去，要走了她从药店买来的药。希娅让他回马德里，不叫他就先别回来。他不得不答应了，他坚持要每天打电话过来的权利。

当晚，她父亲接了第一个电话，告诉他希娅很好，她已经在床上睡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过一天再打来电话时，电话那头的铃声响了很久很久，却始终没人来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当代以色列名家名用选　米诺托之恋
作者＝（以色列）塔木兹（Ｔａｍｍｕｚ，Ｂ．）著　郑雅兰译
页数＝１５５
ＳＳ号＝１０４４９１７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８月第１版